

目 录

第 九 辑

一九八四年五月

回 忆 录

山东省立聊城师范学校党的活动

和学生运动……………李志成 整理 (4)

山东省第三师范学校

建党情况的回忆……………孙荫棠 (18)

临清乡师党的活动概况……………赵广善 整理 (23)

我在临清师范学校

革命活动的片断回忆……………孙一鹏 (40)

八乡师党的活动概况……………张乐天 整理 (44)

范县简易乡师党的发展和学生

运动……………莘县县委党史办公室整理 (48)

抗战初期鲁西北几个县举办政治军事训练班

简况……………陈坤林 整理 (60)

鲁西北的革命熔炉——政干校……………许法 邓槐余 (62)

附：山东省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政治

干部学校第三届招生广告 (注)

政干校七月野行军……………冯 瑛 (73)

团结战斗的鲁西北特委党员训练班……………王天虹 (77)

关于筑先学院的回忆……………刘希鹤 (80)

在筑先抗战学院工作情况……………臧君宇 (83)

鲁西——冀鲁豫筑先抗战学院

- 部分教职员名单…………… (85)
- 阳谷中学沿革简介……………郑芷华 整理 (88)
- 鲁西革命青年的摇篮——冀鲁豫
- 抗日第四中学情况概述……………李志成 整理 (97)
- 抗大式的冀鲁豫边区第四中学……………杨志高 (105)
- 忆张海平校长……………杨志高 (112)
- 抗日卫东中学的战斗生活
- 回忆……………林远 胡雷 (118)
- 附：一、卫东中学一、二年级教职员名单
- 二、一九四二年建校时名单
- 战斗的一年——献给抗日卫东中学的学生
- 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林远 (143)
- 冀鲁豫建国学院述略……阳谷县教育志编写组整理 (147)
- 附：一、行署决定成立建国学院
- 二、冀鲁豫建国学院招生广告
- 原冀鲁豫区阳谷县四十年代教育史实……………冯之琨 (155)
- 泰运书店梗概……………王毅然 (171)
- 原冀鲁豫区阳谷县四十年代新文化史实……冯之琨 (173)
- 我参加民间艺术宣传工作的情况……………张兴泉 (180)
- 入校须知……………赵儒昌 供稿 (185)

鲁西北报刊

忆鲁西北《抗战日报》——抗战期间

华北第一个铅印日报始末·····	翟向东 (192)
《山东人》——抗战头年聊城第一份	
抗日油印小报·····	孙思白 (204)
抗日战争前期我区创办的部分报刊·····	陈坤林整理 (210)
鲁西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斗号角——《抗战日报》	
——记中共鲁西北地委机关报	
《抗战日报》·····	刘立平 梁毅民 张肇村 (213)

专 题 资 料

聊城地区抗日战争前的学生运动	
概况·····	吕保明 整理 (222)
阿东地方党组织情况概述	
(草稿)·····	东阿县委党史办 (236)
附：中共阿东地区党组织和政权机构沿革一览表	
后记·····	(270)

山东省立聊城师范学校 党的活动和学生运动

李志成 整理

一、学校概况

山东省立聊城师范学校创办于清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它的前身是东昌府考院（今聊城师专校址）。一九〇四年根据山东巡抚饬定：“各府、直隶州创办简易师范学堂，兼办师范传习所，皆由各地原校士馆（即考院）改充”。据此，是年聊城南门里的东昌府考院即改为聊城简易师范学堂，一九〇八年又改名为聊城初级师范学堂。一九一一年推翻满清政府后因国体改变，原来的学堂一律称学校，官立改为国立或省立，于是，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聊城初级师范学堂正式改名山东省立聊城师范学校。一九一四年八月（民国三年），全国的师范院校进行了一次大调整，省立聊城师范学校在全省根据建校时间按数字排列命名为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一九三三年暑假后，全省各师范学校废数字排列，冠以所在地名，于是又称山东省立聊城师范学校。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该校大部分师生奉省教育厅指示，徒步分批迁往曲阜师范学校，至此，山东省立聊城师范学校遂告停办。

山东省立聊城师范学校是一所以培养高、初小教师为目标的中等师范学校。一九三三年以前，分为前期师范和后期

师范，学制各为三年，前师培养目标为初级小学教师，后师培养目标为高级小学教师。一九三三年暑假后撤销前师，只保留后师，招收初中毕业生入学。

学校开设的科目根据教育部关于师范学校课程设置规定，计有国文（另设文学课）、数学（包括几何、代数、算术）、物理、化学、地理、历史、教育学概论、小学教材教授法、音乐、体育（包括田径、武术）、图画、劳作等共十几门。

学校归省教育厅直属领导，校长由省厅委任，除校长外，下设训育（亦称训导）、教务、事务等三个处。训育处的职责是统治师生的政治思想，设训育主任一人，男女训育员各一人；教务处负责教学事务工作，设教务主任一人，教务员一人；事务处负责后勤总务，设事务主任一人，事务员一人。学校的教职员任用均由校长在每年暑假开学之前发出聘书聘用。旧时派系关系复杂，所以每换一届校长，学校教职员的成分也有较大变化。由于该校是当时的省立学校，也是鲁西北的最高学府，所以师资水平很好，教师多为大学毕业，其中有的是留学生。

该校学生主要来源于鲁西北各县，学校中有校方统一组建的学生组织——学生会，此外，还有各县学生自发组织的“同乡会”等。

二、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由于“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思想的传播，学校中的革命思想不断发展。

最初，学生中的进步思潮主要通过自发组织和创办“读书会”和创办进步文艺刊物来宣传新思想。当时在一部分进步学生中传阅的进步书刊有《新青年》、《新潮》；党的刊物《十月》、《红旗》、《苏俄赤卫队》；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社会发展史》；苏联小说《铁流》、《母亲》；鲁迅及郭沫若等人的文艺作品等等。这些都为激发学生革命思潮起了推动作用，也为以后学校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共产党组织是1927年春开始筹建的。在此之前，由于南方革命浪潮的影响，当时省立聊城三师和省立聊城二中的几十名革命学生即奔赴南方，投奔革命，他们有的进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有的考入黄埔军校。大革命失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回到鲁西北，成为党的骨干力量。与此同时，学校内的一些进步学生也受了济南进步学生的影响，为学校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开展了一系列酝酿筹划工作。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学校校刊主编张廷焕（又名张文蔚）去济南开会，结识了省立济南第一师范学生李思孝，张廷焕接受了李思孝的共产主义宣传，当时他们两人均是国民党员，从此，二人即成了跨党的人。张廷焕跨党后答应回校建立共产党组织。这年寒假，李思孝回夏津县珠泉屯村老家度假，又向本村学生刘维鲁和同族李成连（字建华）宣传共产主义，这两人亦是省立三师学生，他们也答应回校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一九二七年春季开学后，张廷焕、李建华等即开始筹建党的组织，并由李建华介绍其表侄刘荫昌（现名晋驼）参加了共青团，由刘荫昌负责在校内建立团组

织。

当时在校内只有国民党的组织，但也不公开，人数约数十人，以“训训部”的组织出现，多是一些阔少和纨绔子弟结伙而成。共产党的组织活动更是秘密的，也无明确的组织名称，负责建党建团的人即有权发展批准党员、团员。党团组织吸收成员虽未明文规定，但也有为大家公认的几项条件：第一，好好学习，但又不是书呆子；第二，喜好课外活动的文学青年；第三，原始基础条件是个人友情和亲属关系，因这类人员彼此了解，便于开展工作；第四，注意吸收接受新思想的青年和赞成共产主义的学生。

一九二七年春，学校的党团组织已经发展到三十多人，并召开了一次全体参加的党组织成立大会。会议是夜深人静时在学校后院的餐厅里举行的。会议开始，模仿国民党悼念孙中山的方式，开会程序第一项是静默三分钟，后来就悼念李大钊。会上有张廷焕讲了话，没有党旗，也没有宣誓，压低声音，唱了事先教会的国际歌。会前，由李建华起草了成立宣言，其中结尾两句是：“试看今日之中国，竟是谁家的天下！”宣言用油印，每人发一张，并对外进行散发。

一九二七年下学期，省立聊城三师的党团活动达到高潮，党团员发展到五十人左右，团员略多一些。当时曾在古楼北傅状元府举行过一次政治形势报告会。会上有南方回来的申仲铭作过一次分析南京、武汉国民党政府形势的报告。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鲁西县委书记张干民，委员王寅生、赵以政等以及三师和省立聊城二中的党团员李建华、晋驼、王筱湖、申怡之等人。以后，在校内外党组织的领导支持

下，三师党团员和进步学生与校内进行秘密活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一九二八年春，张廷焕、许先登（后叛变）、宋占一等地下党领导人被调离学校，蒋介石军队节节北进，形势日趋不利，党的活动困难越来越大，校内的党团员大部分转入校外活动，有的转入农村，有的当了小学教员。后来，亦有部分党团员写了“退党、退团”声明，校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党团活动便告结束。一九二九年，有些党团员曾回三师读书，但因国民党统治森严，未能形成有组织的活动。

省立第三师范党组织活动的又一次高潮是在一九三二年秋天以后，当时由平原县中考入三师的刘子蔚（刘书林）等人，根据上级指示，在校内建立“中共鲁西总支委员会”，联系鲁西高唐、恩县、武城、寿张、阳谷、聊城、堂邑等几个县的党团员，同时领导省立聊城二中、临清十一中、寿张第八乡师等学校地下党组织，这时期三师党组织逐渐成为鲁西党的领导核心。

“中共鲁西总支委员会”的任务是，主要是在各中等学校发展党员，凡属地方党组织的党员，都由地方支部领导。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的两年内，三师校内发展了三十多个党员，其中后来又担任校内地下党领导人的有申云浦、陈景文、盛北光、王连级、郭庆云、宋秋潭、钱杰东、任汝舟、李飞等人。

“中共鲁西总支委员会”的主要活动方式是，通过办“读书会”秘密交结进步学生，发展党员，壮大组织，与校内外反动势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三三年暑假后，省立聊城第三师范改为省立聊城师范。一九三四年，刘子蔚毕业，指定由申云浦、陈景文负责，党组织继续发展。不久，校内地下党组织由“鲁西总支委员会”改为“聊城特支委员会”，一九三四年暑假后，“特支”负责人先后为申云浦、盛北光、王连级、钱杰东、郭庆云、宋秋潭、李飞、任汝舟等同志。这期间党组织继续有领导的活动并不断发展，发展的党员有周乐亭、解长年、贾敦方、杨绪明、耿韦等。

一九三三年，由于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陈衡舟，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先后叛变，致使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九三五年上半年，省立聊城师范学校反动当局为了对进步学生的迫害和防范，将该校地下党负责人申云浦、王连级等先后开除或强迫离校，但是，聊师党组织并未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一九三四年暑假期间，“特支”曾派王连级、宋秋潭去济南，以报考韩复榘所谓的“统计训练班”为名，秘密参加济南市委（因省委遭到破坏）举办的党员训练班，后因济南市委改变决定，便由徐运北、赵健民分别与王连级、宋秋潭联系，后又有陈景山与宋秋潭单独接头布置任务，回来继续开展活动。为了指导鲁西北党的工作，赵健民于一九三四年秋天和一九三五年清明前后曾两次来聊师与王连级、宋秋潭接头联系，对“特支”的工作进行指导。此后，范昭炎到聊师与宋秋潭保持联系。由于上级党的指导，使聊师“特支”的工作一直坚持活动并不断发展，当时的聊师党组织不仅领导了校内的进步学生运动，而且领导了鲁西几个县的地下党组织，因此说“聊师管鲁西”。

三、进步学生的革命运动

山东省立聊城师范学校是抗战前鲁西北的最高学府，也是当时鲁西北革命运动的活跃中心。从“五四”运动的爆发到抗日战争烽火的兴起，这里一直燃烧着熊熊的革命烈火。

（一）“五四”时期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当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传到鲁西北后，三师爱国学生即迅速投入运动，短时间内便组织了省立聊城二中和几处高级小学的学生联合商民三千多人，在三师学生刘伦卿、二中学生李学曾等学生代表的领导下，组成了“聊城学生联合会”，并分别组成宣传队、纠察队、调查队、募捐队及国货商场等几种组织，统归“学联”领导。发出了“以实际行动反对卖国贼”，“拒绝对德和约”，“废除二十一条”，“绝不让日本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等口号，同时揭发了卖国政府媚外投降，袒护卖国贼、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行。“学联”的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群众纷纷举行集会，会场群情激昂，广大群众愤怒唾骂日本政府和卖国贼，高呼 and 张贴“誓死保卫青岛”，“严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口号和标语，不少学生咬破手指痛哭流涕地用血写了“良心救国”的大字，学生代表上台讲演，慷慨陈词，鼓动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全民抵制日货。在学生运动影响下，商民也起来与学生组成“学商联合会”，积极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东昌从五月二十一日就开始积极抵制日货，六月一日聊城商界千余人在东关集会、二十多人登台演说，并商定抵制日货办法。

为了唤起民众反对日本亡我的阴谋，三师进步学生分组派往各县进行讲演、散发传单，并撰写了《泣告全国父老抵制日货宣言书》遍载鲁西各报刊。还经常到聊城四乡向农民进行宣传，学校设立国货贩卖部，全力推销国货，禁绝穿洋布、坐洋车、用洋货。学生广泛募捐，成立了国货商场，广销国货。商场门口高悬横匾：“勿忘国耻”、“抵制日货”。在学生的影响下，乡间农民也大批涌入城里加入反日爱国运动。

（二）“九·一八”后的爱国运动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东北三省相继沦陷；消息传来，三师大部分师生无比愤慨。校院内三五成群的学生聚集一起，议论纷纷，对日寇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深恶痛绝，为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忧心忡忡，全校学生无心读书；有的提出要投笔从戎，奔赴华北前线；有的主张配合北平、天津、上海学生的爱国举动，到南京向蒋介石政府请愿；也有的觉得书念不成了，干脆回家务农。面对当时校内各种思潮，在校内的地下党员同志及时组织和领导了这场爱国学生运动。

在地下党和进步职员、学生带动下，首先掀起了一场向校方要求赴南京请愿的斗争。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一天的上午，全校师生自发停课，大部分学生集合在大操场上，声讨日寇侵华暴行，并向校方提出去南京请愿的强烈要求，要求校方同意选派代表组成“省立聊城第三师范学生请愿团”。刘子蔚等人在会上发表抗日演说。大会开始后，刘子蔚等人便站在板凳上高声演讲起来，他的演讲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很

多人高声喊道：“书林讲得对，不抗日我们国家就要完了！”“日本人打到家门口，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中华男儿能坐视不管吗？”“我们要向北平、天津、上海的学生学习，到南京政府请愿去！”这时，有人喊道：“走啊，找校长去！让他批准我们去南京！”正在这时，校长周拔夫和训育主任朱依仙等人气喘吁吁地赶来，他们都是国民党分子，对学生爱国斗争非常敌视。周拔夫先假装和气地说：“老夫来迟一步，请大家原谅。老夫虽不才，爱国心还是有的，可是，抗日救国是政府的事，我看政府一定会有退兵之韬略”。

“见了日本人光跑还跑不迭呢，还有个屁韬略！”人群中有人斥责说，立刻引起一场哄笑。周拔夫装作没听见，继续说：“学生吗，发愤读书才为正本。听说大家要去南京请愿，我看就没有必要了吧！啊！我看，大家安心读书就是抗日。再说，目前学校经费紧张，无力负担大家去南京的路费，我劝大家还是安心读书吧！”这时，人群中有人质问：

“既然校方不同意负担经费，那我们自己想办法去南京，一定要求政府抗日！”周拔夫脸色大变，训斥道：“那也不行，北平、天津、上海的学生去了都不顶用，你们去了，那么个大南京还能显着你们吗？真是岂有此理！去了又顶什么用呢！我宣布，从今天起，凡我校的学生，都要安心读书，努力求学。下午请训育主任查课点名，有无故旷课者，要严加追究！好了，散会，大家回去吧！”说完调头回办公室去了。

会后，校方怕学生再大闹起来，便派教职员到各班去说教，进行软化和威吓。正在这时，省教育厅也被济南、青岛

的学生运动吓破了胆，于是便下令“提前放寒假，学生一律回家”，三师学校当局也强迫学生立即离校回家，并向学生家长发出通知：“要监督其子弟，不可有越规行动。”

（三）张贴革命标语

一九三三年夏，三师地下党组织发动党员进行了一次张贴革命标语的活动。当时，中共山东省委派交通员李振山来三师传达省委指示，党组织把活动情况和准备贴标语的问题向他做了汇报，李振山听后非常赞成，并主动承担了写标语的任务。因为李是外地人，由他写标语不易被国民党当局查出笔迹。李在校外胡家茶馆的后院将标语写好，然后由党总支通知各党小组分头到指定地点领取标语。总支的三个成员每人负责几个小组，每组由三人组成，事先把打好的浆糊装在袜筒里，一人提着，另一人拿标语，第三人负责放哨警戒。贴标语时，由提浆糊者往墙上把浆糊筒一甩，拿标语者迅速把标语贴上去。十几个小组分片包干，一夜之间，聊城城里各主要路口，三师、二中以至驻聊城的国民党第三路军七十四师李汉章部二二〇旅李益智的旅部门前，全部贴满了标语。其内容主要有：“中国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同胞们，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解放而斗争！”“打倒卖国政府！”“打倒蒋介石！”“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等等。

标语贴出后，震撼全城，敌人十分惊慌，校内大哗。此后二二〇旅每天夜晚都出动，还将三师包围封锁，盘查行人，重要路口都有警兵把守。学校当局也召开各班班长紧急会议，并宣布晚饭后不准学生外出游逛。校方原以为标语是

校外的人贴的，通过反复调查，才确认是校内学生贴的，方知校内有共产党活动，于是学校反动当局把共产党员大骂一通，对进步学生施加政治压力，但党组织非常严密；校方没抓住任何把柄。

贴标语的事件发生后，校内的国民党复兴社分子，利用机会制造政治谣言蜚语，造谣说：“昨晚二二〇旅旅部抓了一个c·P（共产党）分子，还装成是外来的，原来就是三师学生刘书林（即刘子蔭）。”党组织及时组织几个党员揭露他们的谣言，但从此以后，党员都更加提高了警惕，晚上与其他同学换床睡觉，腰里系了绳子，准备有紧急情况时可以随时跳墙逃走。

（四）发动水车工人罢工和开展辩论

一九三三年夏秋，党组织领导进步学生发动拉水车的工人进行过要求增加水费的罢工斗争。为发动水车工人起来罢工，党总支曾组织进步学生利用星期天和下午课后到西关水井上同水车工人交朋友，动员他们起来罢工。但是，由于用水的涉及到全城各个阶层，提高水费势必会影响到全城人民，又加上水车工人多是单干的贫民，不便组织，这活动进行了一个多月，并未发动起大的罢工。但是，由于学生的革命宣传，也扩大了党的影响，提高了市民的觉悟，揭露了反动势力。

在此同时，针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滥调，在校内学生中爆发了一场班级群众大辩论。党组织通过党员向广大学生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揭露蒋介石卖国投降、反共反革命政策的实质，同时通过大多数学生的言谈议

论，同反动势力展开辩论，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每当有人宣传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时，进步学生便群起而攻之，予以驳斥和揭露，把那些为蒋介石歌功颂德的人驳得张口结舌。这场辩论持续了几个月之久，一直扩大到教职工中去。

（五）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五年，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伪自治政府，宋哲元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亲日分子也在报纸上鼓吹华北五省“自治”，要把华北半壁山河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义愤，爱国抗日运动形成高潮，终于爆发了北平学生的“一二·九”运动。这年聊城师范的进步学生在地下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有计划地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揭露汉奸卖国罪行。学校当局为压制学生爱国活动，先后以“勒令退学”的方式，不公开挂牌地秘密开除了地下党的负责人申云浦、王连级等人。但这并没有扑灭爱国学生运动的烈火，申、王被开除后，又由盛北光负责领导聊师党组织，盛北光毕业后上级又委派李飞担任支部书记，继续领导校内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族先锋队”的工作。这期间并与鲁西北党的负责人徐运北取得联系，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了抗日救亡爱国斗争。

（六）驱逐反动校长冯光荣的斗争

一九三七年春，在我地方党的领导下，聊师进步学生展开了驱逐冯光荣的风潮。冯光荣系山东省国民党cc派教育厅长何思源的亲系，本人即是cc派骨干分子，是一个根本不懂教育的反共打手。一九三七年一月，何思源借故撤销了

原聊师校长孙芳时的职务，委任冯为校长，其目的是扩大国民党势力，控制聊城师范这块阵地。

聊师进步学生在共产党组织领导下，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校内活动非常活跃。原聊师校长孙芳时是一位无党派人士，他对校内的共产党活动并不干涉，因此党组织认为他可以继续留任。孙又是聊城县人，在聊师内有一定影响，他留任对争取教职员也有利。

冯光荣的直接后台是驻聊城的第六专署教育科长 cc 分子朱香亭，以他为首串连社会上的国民党员田谊民、杨跃伍、梁醒黄等结成一股反动势力。他们大肆宣扬“攘外必先安内”，“拥护三民主义，服从三民主义”等滥调。

一九三七年二月，冯光荣持着省教育厅的委任状到了聊城，他先在东门里旅馆和朱香亭见了面，在朱的怂恿下，壮着胆子来到聊师接任校长。校内党组织得到消息后立即组织进步师生集合到校门，待冯到校门时，校门已关闭，冯在校门外对师生说：“我奉省政府命令来接任校长，你们快开门！”历史教师汪伯岩等替学生在里面答道：“我们不欢迎你，你快滚！”冯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地回到旅馆和朱香亭商量对策。

学校进步师生委派汪伯岩到专署找到任视察员的同乡冉光远。见面后谈了冯要来聊师接任校长的情况，并请任在山东第六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革命者张维翰、牛连文、张廉方等联合冉光远支持驱逐冯光荣的斗争。经商量研究，认为聊城师范这块阵地应该占领，驱冯运动应该支持，不能让他把权抢走。

国民党专署教育科长朱香亭与冯光荣密谋后，也采取对策。他们背着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私自勾结公安局警察想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党组织获悉后，马上给省财政厅长王向荣的弟弟王致远（共产党员）打了紧急电报，让他在省里活动。王与聊城驻军二十九师八十七旅旅长荣光兴有私交，王请荣出面调停。荣即派了军队出面干预，才使国民党镇压学生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驱冯运动中，师生提出：“鲁西北教育应由鲁西北人来办，外人不能插手。”教员汪伯岩、许雨范、李子俊及专署视察员冉光远等二十余人采取一致立场，使风潮一直持续了几个月。最后由国民党省主席韩复榘给专员打电话执意由冯任聊师校长。另外我们想当前我们党的主要任务是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冯斗争已经取得一定胜利，可以暂停一下。就这样才平息了风潮。

注：本文系根据《山东省党史资料》，《聊城地区党史资料》，《光岳春秋》中刊载的有关回忆文章及原省立聊城三师（聊师）在聊城的部分学生座谈记录整理而成。其中必有讹误，敬希知情同志补正。

山东省第三师范

学校建党情况的回忆

(1926——1928)

孙 荫 棠

我叫孙荫棠，现年七十六岁，原临清县城西张堤村人，现住临西县先锋镇居民新村二一一号。一九二五年暑假，在聊城三师附属小学毕业，当年考入山东省第三师范学校，新制四级前师学习，一九二八年暑假，前师毕业后接着考入本校后师学习，于一九三一年暑假毕业，分在临清县西南关第一高级小学任教师。

一九二六年秋冬，三师新制一级学生、校刊负责人张廷焕（字文蔚，清平县马张村人）在济南开会时，经济南一师学生李思孝（夏津县珠泉屯村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廷焕、李成连（字建华、夏津县、珠泉屯村人，共产党员）等人，在这年底年初，在三师一、二、四、五年级内发展“cY”（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cP”（即中国共产党）。我在一九二七年初，由黄宗琼（临清县阎庄人，同班同学）介绍加入共青团。这时党团在一块活动，全校党团组织

名称叫什么不知道，班级设小组，四级只一个班，记得刘荫昌（夏津县人，现名晋驼）是个组长，刘在班级内很活跃，黄宗琮是个组长，我在黄宗琮这个组，受黄的领导。张廷焕、李成连、宋占一（堂邑县人、新制二级学生）等人是共产党员，他们三人是三师党团组织的负责人，全校有党团员近三十人，集体活动很少。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国民党汪精卫政府公开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分裂，北伐战争遭到破坏。这时，三师国民党、共产党公开辩论，在课堂、饭厅、操场等不同场合，我们指责、批评国民党叛变革命，屠杀人民，互相攻击不休，有时还打起架来。在这年秋天，为了让广大党团员知道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破坏国共合作真相，中共山东省委派张乐书到聊城，向三师的党团员专门讲解了这一问题，使我们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为纪念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三师的党团组织在这年下半年（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召开大会纪念和声讨反动派的罪行。

一九二七年秋末冬初，张干民（原名张存礼、临清县李圈村人，与我是老乡关系在家时就相识，住聊城县城里北门里付状元宅内，我曾提着篮子给他送饭，也送过其他东西。张处来往的人很多，在张住处开过会，不晓得张的职务，只知张当时是共产党员，专做党的工作的。这年下半年，三师党团组织有发展，工作比较活跃，全校共五个年级，各个年级都有党团员，党团员仍在一个小组活动。党员少，团员多，共有党团员三十人上下，全校党团组织名称不知道。领导人还是

张廷焕、李成连、宋占一等人。三师党团员的发展多是从老乡、老同学和关系较好的同学中发展起来的。管正范与李思孝是表兄弟关系，和李成连、刘荫昌等人又是老乡，宋占一、黄宗琼和张廷焕关系密切，黄宗琼与我关系不错，我和张凝（馆陶县马兰村人，现名鲁西良）又要好。因此说、当时三师党团员多是临清、夏津、清平、堂邑等县的学生。现记起一九二七年在三师加入共产党、共青团的同学有：新制一级张廷焕，是党员，二级李成连、宋占一二人是党员，团员有耿占魁（馆陶县人）、舒连景（堂邑县人）、郑聿修（邱县人），三年级团员有陈仲兴（夏津县人）等人。四级有团员没党员，刘荫昌（夏津县人，现名晋驼）、李启凤（夏津县人）、管正范（夏津县人）、林双太（茌平县人）、黄宗琼、李光荫（临清县李堂村人，现名李绍棠）、张凝、许先登（濮县人）、宋明奇（平原县人）、和我等十几人。五级团员有刘兰惠（邱县人，后改名为刘芳斋前在聊城卫校工作）、台振山（临清县台庄村人）、邵文仲（堂邑县人）、路兆征（邱县人）、宁小纯（堂邑县人）等六、七人。这年六、七月间，由济南一师、一中转入三师学习的学生中的团员有：汪连泉（字伯岩，临清县人）、沈廷渠（临清县，朱庄村人）、孙仰周（临清县张堤村人）、黄春生（临清县窑坡村人）等人。还有一个名叫孙兆明是共产党员，在聊城师范石印室见过面，他是专做党的工作的，常来三师。知道有一个赵以政是共产党、不知在哪里工作。

一九二七年冬末，一九二八年春初，我班同学、共青团员许先登参加了阳谷坡里暴动，一九二八年春天开学时许先登

没返校，后来听说许成了叛徒。就在这年春季未开学前，听说济南一师学生孟宪周等人在临清国民党部被捕。在三师读书的国民党员马朋来（临清县马寨村人）、孟达三（临清县马兰村人）、朱辅巨（临清县朱庄村人）等人也回到临清县国民党党部干起事来了。在开学时，我和张凝不敢回聊城三师，在家听消息，观动静，后来由孙东阁（族中的兄长，三师校长）来信叫我们返校，回校后得知国民党已派人进入学校。还得知刘兰惠、舒连景二人被聊城县公安局抓走，已坐班房十几天，经校方保出。这时也不见张廷焕、李成连、宋占一他们了，有的说张、宋调往东边工作，去那里，干什么不知道。我返校后，没见到刘荫昌。这时学校的国民党很活跃，国民党员对共产党、共青团员冷风热刺，尤其训育员介景和对我们党团员训斥、威吓是常事。介几乎每天晚上集合学生点名、查有无外出活动的，介还常讲刘兰惠、舒连景在公安局被扣期间如何受刑等问题来威吓。介看到或听到我们原党团员同学在一块说谈、玩时，就公开批评指责，或叫到他屋内恐吓，闹的同学非常紧张，人人自危，不敢越雷池一步。有一次我和李光荫在一起谈学习，被哈允灼告密，介将我俩大批、特批威胁一顿。一九二八年寒假，宁小纯、林双太在聊城县国民党党部被扣留一个假期做勤杂事，回来后，我问了一下，他们在那里干什么，介知道后就在朝会上，晚上点名时训斥，说我再胡闹，即送公安局，进行压制。就在这种内外压力下，再加我当时年龄小，阶级觉悟不高，我和回校学习的党团员一样向校方国民党负责人刘培育（字建高）介景和（训育员）等人履行了脱离共产党、共青团组织，专心

读书不问政治的手续。从此，至我一九三一年暑假毕业离开三师时，对三师共产党、共青团组织活动情况就不了解了。

另外：（1）一九二六年，宋××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为开展聊城党的工作，党派宋来到聊城，宋考入聊城省立二中读书来掩护开展工作，经他人介绍我和宋见面一、两次，时间不久，宋离开聊城，至于赴何地、干什么去了，不知道。

（2）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间，济南一中学生李子俊等人转入聊城省立二中学习。这部分学生中有共青团员，也有国民党员。李子俊是国民党员。

一九八四、八、二十八

临清乡师党的活动概况

中共临清市委党史办公室 赵广善

临（清）夏（津）馆（陶）清（平）邱（县）冠（县）联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创办于一九三一年秋。校址设临清城东门外原省立第二职业学校旧址，该校是由六县集资兴办的，故名六县联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简称临清联立乡师或临清乡师，（以下称“临清乡师”）。

起始，学校招收学生两班，（后并为一班），男女兼收。原定学生修业三年，后改为四年。课程设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公共卫生、教育概论、心理学、农业、三民主义以及体育、音乐、图画、手工诸科。

学校的创办人是孙宝贤（东阁）。他是鲁西北素负盛名的教育家。他办教育培养学生有明确的标准。学校两旁白墙上的几行大字：“学生要有革命精神，要有健康的体格，要有农工的劳动身手”，就体现了这一标准。另还有一首校歌，更是对其办学宗旨的最好注脚。

清渊古郡①，

卫河之滨，

联立乡师，

崭焉一新。

萃六县之英俊，

历四载之陶甄，

要有农工身手，
要有科学脑筋，
要有艺术兴趣，
要有革命精神。
努力，努力，
前进，前进，
发展乡村教育，
改良社会习惯，
吾侪切莫惮艰辛②。

（一）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与乡师 党支部的成立

考入临清乡师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来自六县农村小知识分子。其家境多较贫寒，升学无条件，就业无门路。他们不仅有强烈的求知欲望，而且心中也都埋藏着改变现实的强烈革命要求。

乡师建校不久，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同学们惊闻日寇侵占了沈阳，我东北三省沦陷，个个无不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一连数日乡师等校学生纷纷走向街头，呼口号、撒传单，举行游行示威。在校内，同学们还利用壁报、讲演会等形式，揭露和抨击日军的侵略罪行。乡师学生自治会的干部会同商联会的人员，还组成了“仇货检查团”，到临清西南关最繁华的大寺街一带查禁日货，十二月后，北平、天津、济南等城市的高、中等学校的学生纷纷去南京请愿。约

于次年一月初，乡师的黑若仙同学等也主动与省立临清十一中学的同学取得了联系，组成了赴南京请愿团，这批学生先乘汽车抵济，后又从济南换乘火车到达浦口，在那里遭受到蒋介石反动军警的弹压，后被迫返校③。

临清乡师一建校，抗日救亡运动就如此活跃，其中党的秘密领导是个重要原因。乡师的党组织也正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成长发展的。

乡师党组织的创建人是李恩荣同志。他，字耀光，后改名华光，原清平县（今属临清市）李圈村人。一九三〇年暑期，当时在临清省立第二职业学校读书的李恩荣，去恩城师范讲习所看望一位姓王的老乡，结识了在该所就读的党员郎风山，经郎的引见，又认识在平原中学读书的中共鲁北临时委员会书记刘子蔚，并由刘子蔚、郎风山二同志介绍，在平原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④。

李恩荣入党不久，原就读的临清省立二职奉命撤销，并命令将原在校学生分别并入临清乡师和临清省立十一中学，于是李恩荣便转入了乡师一级一班继续学习。

李恩荣在乡师读书期间，根据刘子蔚同志的指示，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不久即发展了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李朝杰（李苏）、高景赐、何金池（凤洲）、牛兰桥以及在林园小学教书的柴秀生等同志入党，并于一九三一年底，成立了乡师党支部。次年春，当时已转入聊城三师学习的刘子蔚同志专程来到临清乡师，与李恩荣、李朝杰、高景赐等会面，肯定了乡师党支部的工作，并进一步明确由李恩荣任书记，李朝杰为组织委员，高景赐为宣传委员。刘在乡

师逗留期间，还向他们谈了全国的形势和党所面临的任务，并向党支部布置了工作⑤。

乡师支部成立后，接受中共鲁北临时委员会书记刘子蔚同志的单线领导。时隔不久，由于叛徒出卖，供出了李恩荣是临清乡师党的负责人，为防止党组织遭受破坏，在乡师党组织和进步师生的掩护下，李恩荣主动离开学校，回到了家乡李圈继续从事党的工作。乡师党支部的工作遂由李朝杰同志负责。是年秋天，刘子蔚同志在聊城省立三师就任新成立的中共鲁西总支委员会书记，领导包括临清乡师、省立十一中在内的鲁西北各学校的党的地下活动，而把原由他领导的中共鲁北临时委员会的工作（包括恩城、平原、禹城、清平等县党的组织）交给了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老田同志负责⑥。此后省委的老田同志及三师的谢鑫鹤同志等，在李朝杰的“小学同学”名义的掩护下，也都曾来到临清乡师指导检查过工作⑦。

（二）开展“读书会”活动与 党组织的大发展

乡师党支部成立后，其主要任务是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宣传党的革命主张，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并在思想进步的同学中物色发展对象，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其中组织同学参加读书会活动，即是开展党的宣传工作的一种重要形式。

学生读书会名誉上是学生自治会领导下的一个课外学习

组织，实际上则是党的外围组织。当时的学生会正付主席何金池、高景赐均是党员，各班读书会的负责人如一级一班李朝杰，二级二班的马会泉（镜波）、孙玉俊（冠军）、朱冠富等也多系党员或党外积极分子。至于参加读书会的人数就很多了，如一级一班的丁原（原名马金城）、黑丽清（若仙）、李奎元、赵维昌（新民）、李振海（航桴）、赵健民、顾农（相声元）、祝朝臣，二级二班的史烈光（秉直）、阎兆亨、罗修身（霞光）、罗明身、宋加旺（子兴）、王天岭、靖书润（濡之）、刘慧溪（桂兰）等均系读书会的成员。会员除能读到一般书籍和诸如鲁迅的《呐喊》、《彷徨》，杨贤江（笔名李浩五）的《新教育大纲》，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大公报》记者曹谷泳的《苏俄视察记》以及郭沫若、矛盾、老舍等人的进步文艺作品外，一些同学还可看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以及《辩证法谈说》、《唯物主义入门》、《农民土地问题指南》、《艺术论》（该书名义上论艺术，实际上是介绍武装暴动经验）等马列主义著作。

上述一些书籍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其中的一部分来自校图书馆，另有一部分是由学生集资购买的或有藏书的同学主动拿出来供大家传看的，至于政治理论书籍，除少量来自党的上级部门，其余大部分是馆陶籍同学从家中带来的。因馆陶同学大部分来自本县的一高、二高和南拐渠高小，而进步教师李镜明（景臣）和王国华、田辛甫以及孙锦、甄择栖、裴志耕等就在此三所学校任教，他们大都是一九二六年底或一

九二七年初在河北大名七师入党的老党员，因闹学潮，在县里参加领导武装抢麦暴动被学校开除，并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到处飘流，后才到馆陶的几所学校任教的。如《辩证法谈说》、《唯物主义入门》等理论著作，大都是他们从大名带到馆陶的。正是在他们的革命影响下，如孙林盘（一鹏）、阎兆亨等早在一九三一年春，即入乡师之前就已经加入了共青团。入乡师学习后，孙林盘等还与李镜明老师等保持着通信联系⑧。

一九三四年初，经地下党的联系，乡师党领导的读书会与上海地下党的出版机关建立了联系，上级党的联络员并来临清乡师与李朝杰、孙林盘等见了面，定下了定期由上海邮寄书刊，并确定孙林盘署名代收⑨。在此前后，乡师学生王天岭、史秉直等还与临清的进步青年王瑞征、徐培仁等取得了联系，成立了“正大派报社图书巡回部”，一些进步文艺作品包括稍后出版的《大众生活》、《妇女生活》等，在这里也均有代售。

自然，邮寄和传看革命书刊，是要冒风险的，为了不惹人注目，邮寄中便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如改换封面包装等。有一次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文件和洛甫同志的报告，就是钉入《打狗劝夫》、《叹五更》一类小册子里寄来的⑩。

除了组织读书会活动外，学校还经常举办演讲会。演讲会的题目多由学生自选，其中大部分是与抗日救亡有关的一些重要课题。如赵健民就曾在一次演讲会上，针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形势，作过抨击蒋介石国民党卖国求荣政策的发言⑪。此外，还有办墙报（包括报道抗日救亡新闻消

息、登载时事评论和文艺作品等）、组织篮球队、话剧队等多种宣传活动形式。如由颜菊清等参加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一元钱》、《姊妹花》、《孔雀东南飞》等抗战剧目或反封建剧目，并在临清各界和农村的农民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通过读书会等活动的开展，不仅提高了党员的理论水平，也提高了同学们的思想觉悟，扩大了党的影响，并在进步学生中物色了一批发展对象，为党组织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参加读书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中，较早入党的有临清的孙冠军、赵维昌、马会泉，冠县的朱冠富等，仅馆陶籍的学生中，先后入党的就有孙林盘、靖濡之、张祥甫、孙作栋、陈自恭、王天岭等多人⑫。

临清乡师的学生多来自农村，与广大农民有着天然联系，他们便利用假期在各地农村做了很多抗日救亡工作，并发展了一批党员。尤其是前乡师党支部书记李恩荣，回到家乡后仍与乡师党组织保持着联系，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以李圈为中心的各村，就发展了一个有数十名党员的党组织。仅李圈一村，现在能忆起名字的就有李全仁、李继耀、李继珩、李文聪等二十一名党员⑬。

（三）两次闹学潮情况

由于临清乡师是由鲁西北六县集资兴办的，所以招收学生名额也是按各县摊款的多寡来确定的。凡考入乡师的学生，可享受校方发给的每人每月二元钱的助学金，不足部分由学

生自负。另，学生每学期还要交三元钱的学费。

一九三二年暑假前，六县教育科长在大寺西街临清教育局开会，提出了偏袒富裕学生，按济富不济贫原则发放助学金的议案。消息传出，乡师的绝大多数学生教职员工无不感到愤慨。乡师党支部决定，要趁此机会，发动全校师生开展一次对教育当局的说理斗争。这天晚上，乡师支部负责人李朝杰召集各县的贫苦学生开了会，并以一级一班为主，选出了七名代表，准备与校方和六县教育科长进行交涉。为了确保同学们的安全，党支部事先还组织了严密的纠察队，并由专人监视在西南关开会的六县教育科长的行动。孙东阁校长对此项决议也是不满的，曾两次到县教育局，向六县教育科长言明同学们的要求，但无济于事。于是学生便举行了罢课。校方遂搬来了临清县县长徐子尚和教育科长颜××出面调解，当学生们听他们所云，俱都是糖衣毒品，仍不罢休。是夜晚，他们又搬来了驻临第二路民团指挥赵仁泉部下的一个连长，妄图用高压手段，平息学生的罢课行动。同学们见状仍不示弱，党组织并暗中集合了众多的学生，聚到校长的门前，进行辩理。孙校长左右为难，最后说：我是决不会请军队逮捕学生的，你们自己去找六县教育科长交涉吧！后学生代表李××、赵维昌等便几次与各县教育科长当面交涉，但仍然无效。此次学潮持续了有一周时间。后六县教育科长惟恐罢课风潮继续扩大，遂一面答应采纳同学们的合理要求，遂又密令学校提前放假，致使这次学潮不了了之④。

一九三三年四月，乡师学生再次闹起了学潮。这次学潮是由学生自治会主席何金池、高景赐领导发动的。其主要原

因是由于二级二班学生对语文教师徐子明^⑮普遍不满所致。徐子明，东北人，此人思想陈腐乃至反动。还是在上年五月，济南一中曾因抗日救亡工作活跃，而遭受韩复榘派兵弹压了。针对此事件，徐子明便出了一个作文题——《对济南高中学潮的评论》，以测验同学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作为志气方刚的青年学生，对韩复榘派兵弹压学生事，自然俱都愤愤不平，借此机会，每个人按着自己的理解，均写了评述文章。内中有个阎兆亨同学，思路敏捷，稍加思索，也未打草稿，便在课堂上写好了一篇批判、抨击韩复榘的文章。徐子明一见，大为恼火，他把饱蘸墨汁的毛笔在阎的作文簿上一推，行行字迹便全给勾销了。徐子明这种霸道行为，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

这次学潮的直接导火线是由徐子明令学生靖书润罚站引起的。靖对于徐子明的体罚行为自然是反感的，便在课堂上与徐辩理，接着徐子明的“你不愿听我的课，就出去”的话头，靖书润首先冲出教室，随着阎兆亨、罗修身、罗明申等也冲出了教室。这样二级二班的学生就罢课了。这次学潮也得到一级一班同学的响应，他们在一级教室外的柱子上，贴有“打倒徐小鬼”、“徐小鬼滚出去”等标语，此次学潮停课有三、四天，后经孙东阁校长多方工作，学生才复了课。此后不久，徐子明也就离校了。为了庆祝这次学潮的胜利，不少学生还在一所医院附近照了相，以示纪念^⑯。

(四) 反对训育主任的斗争与敌人的大搜捕、组织的大破坏

乡师从创立到停办，训育主任四易其人。依次是玄大庸、马天庆、赵干堂^①、王少逸。四人中除马天庆外，其余三人均是反动家伙，内中尤以赵干堂最为顽劣。

赵干堂是国民党员，他是在学校发生第一次学潮后的第二年（一九三三年）开学时到校的。此人思想反动，为人专横、霸道，权欲很重。阎兆亨在学校的墙报上，曾以“一只手抓住重心”为题，作过一幅漫画，讽刺的就是他。赵干堂对学生限制很多，如不准学生开展课外活动，不准学生阅读进步书刊，每天晚上训话，从不间断。还经常对一些所谓“不规”学生进行训斥。在校他也兼课，但同学们对他的那些陈词滥调都不爱听，每当他一走出教室，同学们便以哄堂大吵的形式予以“欢送”。当他斥责同学时，其他同学也常以脚蹴地发出蹭蹭声响，表示抗议。有时夜间还有人向他住房的窗户上掷砖头。同学们背地里直呼他“赵二疤痢”，骂他“上课是老虎，下课是条狗”。这年开学不久，赵干堂从一个同学床铺底下查出了从靖书润那里借来的一本列宁写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加上靖曾鼓动过学潮，靖书润遂被学校开除。不久，与此事有牵连的罗修身、朱冠富等也被开除了学籍。对此，乡师学生自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几天之后，靖书润、朱冠富、罗修身等便从家中返回，住在一个旅店里，并经与孙玉俊等共同商量后，便写了一些漫

骂赵干堂的标语，还在上面涂上了粪尿，趁天黑贴到了“赵二疤痢”的门上，赵虽大为恼火，但却查不出来。赵在乡师的日子是不好过的，不足一年也就灰溜溜地离开了⑩。

一九三四年，接替赵任训育主任的是王少逸。王是北京某大学法律系毕业的硕士，国民党员，此人实际上也很坏，不同的是，他对学生除有硬的一手外，还有软的一手。如经常找同学们谈话，鼓励同学们写日记等，妄图用这种方式了解同学们的思想。又如，他对黑丽青、刘桂兰两个进步学生本来是很有意见的，并经常点名批评，可是，有一次他又找她二人谈话：“你们是女同学，应该优待你们，照顾你们的面子，有些事不便在大会上讲，但你们自己要自重。”黑丽青、刘桂兰根本不理睬这一套，便当面反责道：“我俩和同学们一样，用不着什么‘优待’！”直噎得王少逸半晌说不出话来。

一九三四年一月底，为了利用即将到来的阴历年关，开展一次大的宣传活动，经党员李朝杰、高景赐、李桂生、汪廷桂等人商量，决定将学校的油印机偷出，并由党员赵维昌等执行这一行动计划。油印机偷出后即放在校内西院的一座小澡塘内。待夜深人静时，先在澡塘外放出警戒，然后由高景赐起草，并经多人一夜的忙碌，到天亮之前，将宣传品全部印出，然后再急急忙忙地把油印机放回原处。次日晚，按照事先编好的两人一组，将宣传品交于三个小组散发。有一个组负责临清西南关的主要街道（即大寺街以东考棚街以西，锅市街以南马市街以北），另一组负责河西诸街（包括三眼井街，青龙街，米市街等），还有一组负责大众公园

(也叫“进注会”)的露天剧场。负责剧场的这个组,事先还将传单折成四方形的小包,内中并各装有一枚铜钱,以便于将传单抛散四方。待夜幕降临后,各组分头行动。其中,在露天剧场看戏的观众忽见传单从天而降,顿时骚乱起来,撒传单的人趁此机会便回了学校。次日全城大街小巷的人们,多以传单为话题大加议论。这次活动,一方面大大扩大了党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第二路民团指挥赵仁泉又急又怕,忙派人走街串巷,四处探听,更加强了对乡师的侦察活动^①。

一九三四年二月后,蒋介石为配合其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也加强了对白区进步文化的“围剿”。这年秋天,因上海地下党遭受破坏,查出了向各地邮寄文件书刊的名单,国民党临清县党部书记长谢丙如按照省党部的指令,亲自带人来到乡师查处,于是在乡师便发生了查抄书刊事件。多亏事先得到了消息,先将文件等转移出去,才使敌人扑了空,加上济南电报的扑人名单中,把孙林盘的“盘”字悟为“盃”字,一字之差,敌人不得已,扫兴而去^②。

查抄书刊事件之后的十余天,学校便将李朝杰、高景赐、李桂生、江廷桂等开除了,离校前曾约定在浮桥口西岸路北的三官庙小学的党员教师柴秀生住处,设一秘密接头点。但时隔不久,李朝杰等四人便去了石家庄。从此,乡师的党员多数便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学生运动从此趋于低潮^③。

（五）深切的怀念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临清乡师的革命活动所以搞得比较活跃，是和学校的进步教职员工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他们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想方设法为革命活动提供了很多帮助。

乡师的创办者孙宝贤校长就是值得怀念的一位可敬的老人。孙宝贤，字东阁，前临清县（今属河北省临西县）东张堤人。早年曾任省督学，大革命时期聊城省立三师的革命活动红极一时，其时他就在三师任校长。孙校长是个无党派人士，极富爱国心，他为人正派，忠诚耿直，一生坚持民主办学，对同仁协商办事，对学生循循善诱，凡同学们的进步活动，他都是支持的。如为便于学生自治会开展工作，他便在校内专门腾出了两间房作学生自治会办公室。每年学校召开有关教学的校务委员会，他也让学生代表参加。孙校长还兼任历史课，在讲近代史时，他除了讲授帝国主义侵华，统治阶级丧权辱国等内容，还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军与国民党作战等情况。在一次期末考试时，还出了“什么是苏维埃，列宁是什么人”的试题。孙校长对贫苦学生尤为关心和同情，为安排张祥甫（张锡林）、李振海（航桴）等同学点汽灯，擦灯罩，用此项微薄收入弥补生活费用的不足。尤其值得提及的，孙校长还多次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党员学生脱险，如一九三二年春乡师支部书记李恩荣的安全转移，一九三四年查抄书刊事件中孙林盘得以躲过敌

人的搜捕等，事先都曾得到孙校长的暗示。在抗日战争中以及全国解放之后，孙校长还曾在教育战线为我党工作过多年^②。正因如此，当五十年代后期，在赵健民同志任山东省省长期间，闻悉孙校长仍在历城中学任教，即驱车前往，并相继将孙东阁校长调到了山东省博物馆工作^③。

另外，还有几位老师如赵贯一、马天庆、刘季平、郝冠英、孟承文（育东）等也是值得怀念的。语文教师赵贯一，是从青岛李村中学转来的。赵老师思想进步，学识渊博，他除了课堂上向同学们讲授和推荐诸如左拉、莫泊桑、朱自清等人的进步文艺作品外，课余还经常讲共产党反围剿以及国共合作等情况，给人们以很大教益与启迪^④。马天庆老师原系北大毕业生，参加过反战大同盟，思想也很进步，来校后虽任训育主任并兼任三民主义课，但他在课堂上也向学生讲授唯物史观等社会科学知识。马老师对学生开展读书会活动很支持，有时二级二班的读书会活动就在他的办公室进行，在这种场合下，他还经常对学生谈论一些国家大事以及国民党多数人如何腐败，有一天终将灭亡等。一九三二年暑假前的第一次学潮，就是在他任训育主任期间发生的。赵仁泉和国民党驻临清代表谢丙如等，对马天庆老师的作为，是恨之入骨的。马在校工作一年后就被挤走了，离校以后，他还从外地给学生寄过一箱进步书籍^⑤。还有一位刘季平老师，他是山东沂水县人，南京中央大学教育系毕业，在乡师他曾对别人说，在南京时就听说华北地区的青岛李村中学、临清乡师、保定二师、大名七师等处有共产党活动，已引起国民党中央的注意。他是自愿到临清乡师教书的。刘季平在

乡师任教育课，也经常对学生讲一些抗日救亡的道理^⑥。郝冠英是一位教语文的女教师，思想也很进步，在查抄书刊事件中，孙东阁校长得知消息后，未来得及返校，即给郝打电话，郝将电话内容转告了孙林盘，并将一些重要文件书刊转入了她自己的宿舍。当县党部书记长谢丙如来校搜查并欲将孙林盘带走时，又是经郝冠英、刘季平老师据理抗争后，孙林盘才免遭逮捕的^⑦。一九三五年，入乡师任教的还有一位孟承文（育东）老师，他原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入乡师时已失落了党的关系，直到抗战爆发后才重新接上党的关系，在乡师工作期间，他对学生也很好^⑧。

一九三七年十月，临清县城第一次陷落，从此，临清乡师便自行解散了。但乡师党的革命活动是永存的。临清乡师不仅为鲁西北六县培养了一批批进步师资，更重要的是发展了一大批党员，这就为抗战爆发后鲁西北六县拉游击队准备了一批干部。乡师校友中的相当一部分，在全国解放后的党、政、军、民的各个部门，担负了重要的领导职务。

注释：

① 清渊，即临清。据县志记载，西汉时，设冀州部魏郡清渊县。

② 1983、9、28访问王金堂（树椿）同志笔录。

③ ⑦ 1984、8、31赵维昌同志来信。

④ 1983、1走访刘子蔚同志笔录。

⑤ 同④

⑥ 同④

⑧ 《党史资料通讯》一期（馆陶党史办编）P 4
P 1 4、《馆陶党史资料》九期P 2 ——4。

⑨ 1982、10、30孙一鹏同志来信。

⑩ 1982、12与王瑞征同志座谈笔录。

⑪ 赵健民《对鲁西北党的建设的回忆》（载《聊城地区党史资料》82、1P56）。

⑫ 孙一鹏：《我在（1932——1933）年在临清师范学校革命活动的片断回忆》（以下简称《回忆》）。

⑬ 见《临清李圈党的早期活动概况》、（载《临清党史资料》第三期）。

⑭ 同③、⑫。

⑮ 此人名字暂取靖濡之《对早期革命活动的回忆》一文之说，另据罗霞光同志回忆，应为徐戟文，刘慧溪同志来稿则称是徐×晖。

⑯ 同⑬、刘慧溪《我在临清乡师学生时期的回忆》（简称《回忆》）。

⑰ 这里暂取赵维昌84、8、31来信中的说法。刘慧溪同志在《回忆》一文中称赵书堂，罗霞光同志回忆称起并义。

⑱ 靖濡之《对早期革命的回忆》、刘慧溪《回忆》、赵维昌8、23来信、与罗霞光、王金堂同志座谈笔录。

⑲ 1984、8、23赵维昌来信。

⑳ 孙一鹏1983、9、17在馆陶县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㉑ 1984、8、23，8、31赵维昌来信。

- ②② 孙一鹏《回忆》，刘慧溪《回忆》。
- ②③ 1984、8、24 田侠媛同志来信。
- ②④ 1984、8、31 赵维昌来信、刘慧溪《回忆》。
- ②⑤②⑥ 1984、8、31 赵维昌来信。
- ②⑦ 孙一鹏《回忆》。
- ②⑧ 1984、7、26 杨赞廷同志来信。

我在临清师范学校革命 活动的片断回忆

(1 9 3 2 —— 1 9 3 5)

孙 一 鹏

临清联立乡村师范学校于一九三一年在临清城东关原省立第二职业学校旧址成立了。该校是由临清、清平、夏津、冠县、馆陶、邱县六县共同筹款举办的，因此，该校每年有一次六县教育局 长 会议，讨论教育方针、计划、财务等问题。学生都是从六个县招生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而且多数家境贫寒，思想比较进步。校长孙东阁，是鲁西北有办学经验，有名望的教育家，他为人开明有正义感，他聘请的教员都是比较进步的，如郝冠英、刘季平、孟成文等人。由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培养革命学生的宗旨，在校大门外两旁白灰墙上，写着培养学生的标准条件：“学生思想要革命化，要有健康的体格，要有工农劳动的身手。”校门外有一大片空地，校长亲自带着教职员和全体学生，定期参加种蔬菜的劳动。学校的图书馆各类书籍也比较齐全，一般马列主义理论的书籍并不禁止阅读。孙东阁校长为了实行民主办校，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由学生选出“学生自治会”的正副主席何金池、高景赐，并给两间房子做学生自治会的办公地点。每年召开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校务会时，都要学生代

表参加，由学生代表提出改进教学的意见。学生自治会，定期举行全校范围的讲演竞赛会。为了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扩大到社会中去，学生自治会还组织学生演话剧，当时颜菊清同学演出的话剧，轰动了临清各界和附近乡村的农民。孙东阁为了培养学生写作能力，定期出版校刊，通过校刊让学生自由发表意见，记得我写了一篇《教育是上层建筑，它推动了社会前进》在校刊上发表了。孙东阁校长担任我们的历史课，在课堂上讲近代史时，除了讲述帝国主义侵略，统治阶级丧权辱国的内容外，也讲苏联共产党建立没有剥削的社会，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红军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斗的情况，在学期考试时还出了“什么叫苏维埃？列宁是什么人？”的试题。孙东阁校长经常关心贫苦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困难，二班贫苦学生张祥甫（馆陶县人）家庭生活贫苦，每月有五元助学金，不能维持在校费用，孙东阁校长叫他添灯油、擦灯罩做半个工友的工作，使张祥甫同学解决了校费的困难。孙东阁校长在平时也重视思想进步的同学，对何金池、高景赐、李葵元、孙冠军等进步同学的学习和思想不断问一问。他堪称鲁西北教育界的先驱，是热心培养有志革命青年的楷模。

一九三二年临师六县教育局会议，研究发放助学金问题，因偏袒富裕学生，没照顾贫苦学生，而引起了学生们的不满，党支部就领导了贫苦学生反对助学金不合理的斗争。支部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并监视在西南关开会的教育局长的行动，组织了严密的纠察队，及时把教育局长会议的信息传达给同学们，以鼓舞斗志，动员同学们坚持说理斗争。学潮坚

持了五天之久，教育局长害怕学潮事态扩大，一面答应采纳同学们的要求，一面要学校提前放假，致使这次罢课斗争结果不够理想。

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在临清馆陶县的学生，除了我和郝胜微是插班到一班外，二、三班馆陶籍学生有二十多人；我和靖濡之、张祥甫、王天巖、孙作栋等同学都先后参加了共产党。参加共产党的还有临清的孙冠军、张长惠，冠县的朱冠富，学校的工友张某。在学校除了闹学潮，举行罢课外，党支部重点组织各班的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跑到街上贴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打倒国民党的标语口号，和散发传单等革命活动。不过当时因受“左”倾路线的影响，过分暴露了革命面目，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也遭到了学校训育主任的嫉忌，以致靖濡之同学因被训育主任查出《左派幼稚病》一书被开除，朱冠富因领导二班同学罢课而被开除，一九三四年秋李朝杰因领导学生闹学潮也被开除了。从此以后，我们就把文件和马列主义书籍放在校后小庙里土地神像后边，在星期天跑到野外去看，回来再放到小庙里，避免了训育主任搜查的遭迁。

一九三四年暑假前夕，李朝杰把我介绍给上边派来的联络员，他说：“上边要从上海给我们寄些党的刊物和进步书籍，写你的名字吧！”我在三人对面的情况下，接受了我做收件人的事。暑假过后，我回到校里，姓李的工友党员告诉我说：“从上海寄来的文件都放在教员备课办公室里，我给你收藏起来了，你把这些文件都拿走吧！”我把文件拿回宿舍，过了不久，因上海组织被破坏，查出寄文件的名单来，

通知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山东省党部转临清党部查处。临清县党部先告诉了孙东阁校长，并要到校搜查。当时，孙东阁校长没等回校，马上打电话给教员郝冠英，郝教员立即告诉我，并要我把文件转移到她们宿舍。待国民党带着警察到我宿舍时，什么也没搜到，再加上济南来的电报上，把我的名字孙琳盘写成了孙琳盟，警察在追问我的时候，郝冠英见训育主任跑到野外去了，便叫刘季平教员去和国民党警察去谈判。刘季平教员质问国民党警察说：“你们既没有搜查出证物，电报上也不是孙琳盘的名字，他是个好学生，不能把他带走！”国民党警察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悻悻而去了。同时，郝冠英教员叫我暂时离校避一避风，我便在当天晚上逃出校外，到北平精叶中学去找王化云同学。在精叶中学和严树勋（陶明）、郎清霖等同学住在一起。一个月后接到学校孙东阁的信，告诉我事已平息，我便回校复了课。从此以后，由于山东省党组织遭到了大破坏，临师党的领导失掉了和上级党的联系。

从这件事的事实证明，孙东阁校长和教员郝冠英、刘季平在关键时刻不避艰险，不顾个人切身利益，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从而保护了进步革命学生免遭迁难。

附注：我原名孙琳盘，字廷甫，战争时期都叫我孙廷甫，一九四六年从中原军区鄂北地委化装，通过国民党地区去东北过程中，化名赵一鹏，全国解放后又改孙一鹏。

八乡师党的活动概况

张乐天 整理

山东省立第八乡村师范于一九三二年在寿张建立（现为阳谷县寿张镇）并招生。学制四年，每年招两个班，八十人。因乡师每月给学生五块银元的补助，所以考入八乡师的多是东阿、郓城、阳谷、莘县、冠县、寿张等地的贫苦家庭的子弟。这为党的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乡师开设语文、数学、地理、历史、化学等课，校长高炳然、教育长孙柏屏、历史教员王丙、地理教员靳肇青，还有训育长宋龙迪等。

一九三二年、三三年，八乡师考入了一批受革命影响、思想进步的学生，主要有王福昌（字耀光，阳谷富安镇人）、（冠沙延孝县阎村人）、冯干才（冠县人）、段碱三（现名段延铭，阳谷西街人）、王宪武（现名王维群，冠县人）等。他们在八乡师积极活动，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东北义勇军的英雄业绩，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学生。一九三四年二月，冯干才由赵健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春，赵健民主持建立了八乡师党支部，王福昌任书记。同年六月，经赵健民、冯干才介绍，冯子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八乡师党组织又发展了王宪武（寒假后回冠县工作）沙延孝、段碱三、时玉泉（冠县庞田村人）。不久，党支部派段延铭到阳谷和中共阳谷安乐镇中心

支部取得联系，从此八乡师党支部由安乐镇中心支部领导。八乡师党组织得到一定发展后，即以党员为骨干，联络进步学生，借“九·一八”事变在学生中激起的爱国热情，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十月革命和工农红军，组织进步学生排演革命戏曲，走上街头进行讲演。并以同学会的名义和济南一师、济南一中、聊城三师、曲阜二师、临清十一中，兖州六师、大名七师等学校的进步学生联系，互相鼓舞。在党组织的引导带动下，八乡师广大学生订阅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如《大众哲学》、《帝国主义论》、《八月乡村》、《读书生活》，还有鲁迅的书籍，并且出版了《八乡师校刊》。这些活动提高了广大学生的思想觉悟，为党组织开展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当时，党支部的中心任务是：团结进步学生，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宣传马列主义，选择培养发展对象，积极扩大党的组织。他们发展党员的主要方法是，在学习交往中，通过交朋友、组织同乡会、读书会，介绍革命书刊，宣传革命道理，从中物色发展对象。寿张城外的田野和黄河大堤上，成了八乡师党支部召集会议，同发展对象谈心的好地方。

上级党组织对八乡师党支部极为关心，经常派人指导工作，八乡师党支部也加强了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除经常与赵健民同志保持联系外，还派各地来的学生党员到阳谷、濮县、大名等地，同那里的党组织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在八乡师党组织的辛勤努力下，八乡师学生的思想觉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家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拯救中华民族，把中国引向光明。有的要投笔从戎，找共产

党闹革命，有的主张以八乡师为基地，宣传民众，唤起民众，进行抗日爱国斗争。整个学校朝气蓬勃，热火朝天。

一九三五年暑假时八乡师党支部组织党员在暑假期间培养发展对象。八乡师党组织还以同学会的名义，向武训中学，兖州四乡师等学校的学生发出邀请，成立读书会，以团结进步学生，选择培养对象。莘县的冯子华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回乡后与濮阳中心县委书记刘晏春（到濮、范工作）取得联系，共同研究如何利用暑假组织同学会，以传播革命思想的问题。在刘晏春同志的帮助下，冯子华在莘县组织了二十多名学生，召开了假期读书讨论会。其间经考察选择了临清十一中的武雷岳、陈广得、郭学章和八乡师的贾鲁峰、宋书简为培养对象。一九三六年，八乡师党支部又发展了司银章、张道昌等同志加入党组织，还培养张丙村、吕月真为发展对象。同年夏，党支部还派冯子华、路绍禹（现名戈立，东阿县人），赴东阿进行党的发展工作。俩人在青年学生和农村雇工中培养了一些对象，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八乡师党支部经过两年的努力，学校八个班中有六个班建立了党小组，发展了二十多名党员，并在阳谷、冠县、莘县、东阿、临清等地发展了党的组织。

一九三六年十月，王福昌同志不幸被捕，当天夜里，寿张警察大队包围了八乡师，他们闯进学校，在寝室、教室，严密搜查，抓人审问，对八乡师实行戒严，国民党县政府还进行恐吓，白色恐怖笼罩着学校。八乡师党组织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但仍然坚持进行斗争。冬，鲁西北特委派王宪武前往八乡师同八乡师党组织进行联系。王宪武到校后即与时

玉泉接上了关系。时汇报了八乡师党组织的情况，分析了所处的形势。王宪武指定时任临时支部书记，并研究了八乡师党组织当前的任务，即联络党员，巩固党的组织，建立支部。王宪武向鲁西北特委回报后，特委加强了与八乡师党组织的联系。八乡师党组织在特委的领导下，又活跃起来，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就分散开，到群众中去，传播革命的火种。

一九三七年八月，八乡师迁往梁山。八乡师的党员大都回各县开展工作。八乡师党支部建立于山东党的组织连续遭到破坏、环境恶劣的时候，在这种形势下，八乡师党的组织不仅在校内，而且走出校门，积极同上级党组织联系，积极培养发展对象，扩大党的组织，为党培养了一批人才，它在鲁西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附注：本文据冯子华《八乡师建党》（见《阳谷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期），王维群《关于冠县早期党的建设的回忆》（见《冠县党史资料》1982年第2期）《关于八乡师党的建设情况的补充材料》，庞展《山东寿张第八乡村师范概况》（见台前党史办《革命回忆录》之一），赵强《八乡师回忆片断》（来源同上），徐光霄《回忆八乡师》（见台前党史办《革命回忆录》之二）盛北光《关于八乡师党支部一点回忆》整理。

范县简易乡师

党的发展和学生运动

莘县县委党史办 整理

一、乡师简况

范县乡师的全称为“范朝濮三县联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校址在旧范县城里，今莘县古城镇。它的前身是濮县师范学校。濮县师范创办于一九三〇年夏。一九三二年五月搬入范县城内，改为三县联立乡师，经费由三县均摊。开始时有观城县无朝城县，因观城县无钱退出，朝城加入①。校方领导也由三县推荐组成，校长牛采苹②，范县人，训育主任张梅岑，濮县人，庶务主任王云升，朝城人。

学生大多数来自范、朝、濮三县，也有观城县的一部分。学制四年，设国文、数学、公民、教育、物理、化学、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目的是培养农村小学教员。学校每年招收一个班，每班五十人左右，学生多系高小毕业生。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敌寇进攻，土匪蜂起，形势混乱，再加上连降暴雨，黄河泛滥，洪水淹没了金堤南部地区，濮、范学生大部不能就学，学校遂自动停办。

二、党的发展

乡师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是管守律。一九三〇年夏，濮县

师范招收了三十多名学生。一九三一年，又招了十几名插班生，管守律就是一九三一年插班进入濮县师范的。管守律，字子持，濮阳县白岗乡管庄人，一九二八年在濮阳上小学时，受到进步教师平杰三^③等人的教育熏陶，接受了革命思想。一九二九年，经大名七师学生管申律（管子修）介绍加入了共青团。之后，他在高小积极发展团的组织，建立了团支部。一九三〇年夏，管守律高小毕业回到管庄，参加了管庄的党团活动。这时，管庄建立了党的组织，因管守律年龄小，未能转党。至一九三一年夏管守律带着党组织交给他的在师范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的组织的任务，插班进入濮县师范，从此点燃了乡师的星星之火。

管守律入学后，很快就以他优异的成绩，乐于助人的品格，稳健、大方的谈吐，赢得了学生的喜爱。不久，

“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群情激奋，学运迭起。国民党政政府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防止学生的爱国运动，勒令学校提前放了寒假。然而，濮县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未接到提前放假的通知，因此，管守律便把本校进步学生和外地回乡度假的进步学生组织起来，发起成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印发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阴谋，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传单，一时轰动了学校，轰动了濮县城。

学校搬到范县后，学生的反帝爱国行动，受到部分进步教师的支持。校长牛采苹，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训育主任张梅岑，思想进步，在北京上大学期间，就参加了“反帝大同盟”。教语文的李老师和教数学的徐老师（女），倾向共

产党，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们在课堂上和谈话中，时常流露出对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主义不满。特别是张梅岑和李老师，他们自编讲义，讲授公民（即政治）、语文，结合当时形势，深入浅出地向学生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知识，灌输反帝爱国思想，对学生影响很大。这时，管守律也积极活动，以范县图书馆为阵地，与同学传抄阅读进步书籍，并办起了墙报，管守律为总编辑，转载、发表进步文章。经过一年的活动，管守律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同学，有刘培岑④、马功岑⑤、张成一⑥、毛延武⑦、徐洪来⑧、徐光霄⑨、郭崇豪⑩、岳喜岷⑪、王贯一、葛运太、郑法科等⑫。他们思想活跃，要求进步，对共产党有了初步了解。

一九三二年冬，濮阳县委批准管守律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把关系转到大名中心县委（因范县属大名中心县委领导）。不几天，大名中心县委谷××来到范县，通过范县北关党支部书记高庆云，与管守律接上了关系。同时，由管守律介绍接收刘培岑、毛延武、张诚一三人入党。随后不久，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管守律，组织委员刘培岑，宣传委员毛延武。支部归大名中心县委领导，大名不断派人来范县，通过高庆云与乡师支部联系，听取汇报，指导工作。

根据大名中心县委的指示精神，乡师党支部在团结同学、宣传革命道理的同时，积极物色发展新党员。为防止敌人的破坏，支部决定，谁发展的党员谁联系，党员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一九三三年，又发展了李永昶、马功岑、岳喜岷等人。接着，又向下级发展了于伯文⑬、王继奎⑭等人。这时，校内有国民党一个支部，以庶务主任王云升为首，他

们假借宣传三民主义毒害青年，发展组织。二级学生金瑞⑮、丁连正等人受其蒙蔽，加入了国民党。党支部便把争取金瑞、丁连正的工作交给了于伯文。于伯文和他们结成把兄弟，经常在一起谈论时局，发表感想，阅读进步书籍。经过工作，二人认清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和反动本质，愤然脱离国民党，经于伯文介绍，加入了共产党⑯。到一九三四年暑假前，乡师支部已有学生党员十四、五人⑰，分散在三个不同的年级。

一九三四年春，管守律去大名汇报工作，不幸被捕，随后，高庆云亦被捕，从而中断了乡师党支部与大名中心县委的联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乡师支部由刘培岑同志负责，继续坚持了斗争。正在这时，刘宴春同志在濮阳遭敌人通缉，转到濮县做地下工作。刘培岑等同志千方百计找到了刘宴春，接上了关系，乡师支部遂归刘宴春统一领导。一九三四年暑假，乡师一级学生毕业，刘培岑、毛延武等转入农村做地下工作，乡师支部由于伯文、王继奎负责。

三、学生运动

乡师的学生运动和党组织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学生运动锻炼、考验了一批先进青年，为党的组织发展准备了条件，党的组织发展又为学生运动形成了领导核心，进一步推动了学生运动。乡师支部成立后，领导学生开展了以下活动和斗争：

建立读书会

为团结同学，由管守律、毛延武等人发起，成立了读书

会。这个组织是校方同意后成立的，绝大多数同学都陆续参加了。他们不仅阅读图书馆的进步书籍，还号召每人自愿拿出一、二元钱，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从外地买来一些书籍。文艺小说如《铁流》、《母亲》、《牛氓》、《少年漂泊者》，社会科学方面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等。支部要求党员在读书会要广交朋友，找群众谈心。经过这一公开组织，团结了大批同学，提高了他们的觉悟。

一九三三年春天，山东省教育厅督学冯××窜到乡师，以查学堂为名，搜走了部分进步书籍，并对校方施加压力，要求学校追查学生活动的背景。在牛采苹、张梅岑的掩护下，冯督学没有抓到党组织活动的确实证据，悻悻地溜走了，学生的读书活动没有受到破坏。

公开和秘密的反蒋抗日活动

在濮县时，学校就有“反帝大同盟”这一组织。这是“九·一八”事变后，山东各学校普遍成立的群众团体。党支部认为，这个组织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目标太分散，因此，将“反帝大同盟”改名“反日会”，目标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在全国抗日情绪蓬勃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也不得不同意。利用这一合法组织，党员带领学生不仅在校内集会宣传抗日，而且走上街头，游行集会，散发抗日传单，张贴抗日标语，向群众宣传东北三省沦陷是我中华民族之耻，炎黄子孙决不当亡国奴，要求蒋介石出兵收复失地。号召群众抵制日货，谁买日本东西就是不爱国。学生的正义行为，代表了群众的心愿，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一时范县城内的商店不敢再出售日货。

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范县国民党部勒令取消“反日会”，胡说，抗日妨碍学习，救国扰乱治安，禁止学生的抗日活动。在此情况下，乡师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转入地下，党员分头向同学、向社会宣传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企图灭亡中国，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国家民族危在旦夕的形势，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本质，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蒋介石。

择师运动

党支部把学校教员进行了分析排队，决定进步的 就 拥护，就尊重，反动的就设法打击，使他们丧失威信，无法工作，以扫除学生运动和党的发展的障碍。庶务主任王云升是乡师反动势力的总代表，国民党学生都受他的操纵。支部决定把王云升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一九三三年放暑假前，王云升宣布停发两个月的津贴，一下子激怒了全体学生。乡师在招生时，明确规定每月发三元钱的津贴，许多同学家境困难，靠了这部分津贴才不至于辍学。当时，共产党员挺身而出，质问王云升为什么停发，学生群起响应，纷纷提出抗议，顿时轰动了会场。会后，党支部因势利导，发动各班级党员宣传鼓动，许多学生涌至王云升住室大吵大闹。王云升被迫答应与各县教育局交涉。经过斗争，停发学生津贴的决定取消了，王云升威信扫地，国民党支部出现了瓦解局面。

教理化的一个姓冷的教员，胡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对学生办的墙报横加批评，指责学生的抗日活动是不务正业。党员就带头散布他是南方人，口音不懂（实际上能听懂）要求校方撤换。经过斗争，这位“冷”教员灰溜溜地离

开了乡师。

反对国民党政府欺压学生的斗争

当时，国民党政府黑暗，对人民群众横征暴敛，残酷的压迫剥削，早就激起学生的强烈不满。一九三三年秋冬之际，以国民党县保安队士兵殴打学生事件为导火线，爆发了乡师学生对国民党县政府的抗议斗争。

这年秋后农闲时，子路堤（古城东）有一村唱大戏。乡师百余学生星期天看戏时，一学生不慎踩了保安队一士兵的脚，被一群士兵围住打的死去活来。在场学生在共产党员刘培岑的带领下，救出了遇难学生，痛打了行凶士兵，学生们知道敌人不甘罢休，立即返回学校，做好自卫准备。果然，数名^⑧保安队士兵荷枪实弹冲向乡师，见校门已关，竟向校院开枪射击，学生毫不畏惧，有的拿棍子，有的拿雨搭顶杠、有的拿劈柴拌子，也有的赤手空拳，一齐涌至校门，叫骂声、口号声连绵不绝，双方相持许久，士兵见学生有准备，遂退走。

这时，党支部适时地把斗争引向反对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管守律以学生干部的身份，建议学校向县政府提出抗议，并向学生宣讲：“在此国难当头的时候，拿枪的人不打日本鬼子，却把枪口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还有天理吗？”在党员的鼓动下，愤怒的学生涌向大街，包围了县政府，抗议士兵欺压学生的暴行。并推选管守律等三人为学生代表，与国民党县政府谈判交涉，提出三条要求：（一）严惩肇事士兵；（二）县长公开赔礼道欠；（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在学生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

党政府不得不答应了学生的全部要求。第二天，县长周君英到校内向师生赔礼道歉。学生的斗争获得了胜利。

另外，乡师党支部还进行了灾民暴动的组织发动工作。一九三三年初秋，黄河决口，范县平地水深一丈至数丈，秋苗淹没，房屋倒塌，大批难民无家可归，偎集在金堤岸上，啼饥号寒惨不忍睹。国民党政府为了显示其善政，设立了赈济机关。但赈济物资经过层层剥皮，到达难民手中就了了无几了。有的只是在大堤上有几个粥棚，每天供给一些稀粥。难民中蕴藏着极大的反抗情绪。这时，大名中心县委指示范县党，领导灾民起来斗争。斗争的步骤是，先散发“告灾民书”，搞宣传鼓动，再个别串连，发展组织，积蓄力量，最后搞灾民暴动，闹县政府，砸赈济机关。乡师支部积极贯彻了县委指示，发动学生党员深入各个粥场，串连发动了近千人。但由于缺乏暴动的经验，暴动时间一再推迟。管守律、高庆云被捕后，这一斗争就中断了。这次暴动虽然没有成功，却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提高灾民的阶级觉悟，增强斗争意识，起了一定作用。

乡师的学生运动逐渐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和注意。一九三四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到乡师逮捕张诚一、刘培岑、毛延武三人。这时，他们已毕业离校，在农村以教书为掩护做地下工作。训育主任张梅岑一面应付敌人，一面派于伯文通知三人迅速转移^⑩，使敌人破坏阴谋未能得逞。

四、乡师党组织的对外发展及影响

乡师党支部在成立之初，就要求党员利用假期、节日回

乡的机会，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培养发展新党员，使党向广大农村发展。并规定，发展新党员三人以下者，谁发展谁联系；三人成立党小组，五人以上者成立党支部。由于党员来自濮、范、观三县，毕业后又回到这三县教书，因此，对这里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濮县：几乎在乡师党支部建立的同时，刘培岑在本村李桥发展了刘茂斋、刘秀峰、吴允恭等人入党，建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先后由刘培岑、吴允恭等担任。这里的党员又在本村和向外村发展党员，使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杨集区，几乎没有空白村，不是有支部就是个别关系，绝大多数都是李桥发展过去的②。

毛延武（修文）同志入党后，在一九三二年底和一九三三年发展了毛修同、毛齐昌、毛修起入党，一九三四年又发展了毛修让、李中怀、贾四等同志入党，成立了毛岗支部，支部书记先后由毛延武、毛修同担任③。

于伯文在木靳庄发展了靳怀孔等人入党，建立了党支部④。

一九三三年麦假，管守律接受崔和皿（崔介）、李永昶入党，在濮县魁星柚举行了入党仪式⑤。李永昶于一九三四年秋末冬初，发展了徐宾、徐光霄入党。徐宾又在本村古云集徐庄发展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先后由徐宾、徐玉峰等担任⑥，徐庄支部还向周围村庄发展党员，使党在古云集地区迅速发展。

就这样，濮县的党象滚雪球一样，迅速发展起来了。一九三四年初秋，濮县县委成立，县委书记刘茂斋、组织委员

刘培岑，宣传委员毛延武⑤。

在范县：王继奎同志在孟楼，贾彩亭同志在贾刘石庄发展党员，建立了党支部。一九三五年，建立范县工委，于伯文任工委书记；一九三六年建立县委，金瑞为书记⑥。

一九三三年，乡师党支部还决定，由共产党员郭崇豪放弃三年的学历，重新考入寿张八乡师，进行秘密活动，发展党员。他在学校积极活动，干的非常出色，被开除学籍。支部又让他到济南一乡师活动，他又考上了该校，在那里他认识了赵健民同志⑦。

一九三五年，赵健民同志去徐庄见到黎玉同志，同北方局接上关系，并重建山东省委，乡师发展的党员是起到了桥梁作用的。如果没有徐宾建立徐庄支部，并把党的活动扩大到周围村庄，就不会引起黎玉同志的重视，住到这里指导工作；如果不是郭崇豪去济南一乡师，赵健民同志也无从知道濮县一带有党的活动⑧，并断定有党的重要领导人指导，不会到徐庄找党的关系。赵健民同志来徐庄找党的过程中，也先后受到张诚一、刘培岑等同志的接待、引导⑨。所以，乡师党的活动对重建山东省委是有贡献的。

五. 简短的结论

范县简易乡师是国民党政府为巩固其反动统治举办的。但和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由于学生多来自贫苦农民之家，受当地人民群众富于反抗黑暗统治的传统影响，易于接受革命道理，又有共产党员管守律的传播和进步教师的支持，所以，党的组织很快在乡师发展，并扩大到附近农村，从而奠

定了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根据地濮、范、观中心区地方党的基础。这一点，是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始料不及的。

注释：

① 《范县志》，民国二十四年续修。

② 牛采苹，字润亭，进步人士。一九四〇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县文教科长、中学校长，聊城师范校长等职，是山东省一、二、三届人大代表。一九七三年逝世。

③ 平杰三，现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

④ 刘培岑，现在河南省文化局。

⑤ 马功岑，即马士勋，一九四二年任永肥县长时牺牲。

⑥ 张诚一，即张功纯，一九四〇年任营教导员时牺牲。

⑦ 毛延武，现在郑州铝厂工作。

⑧ 徐洪来，即徐宾，曾任防空学院政治部主任，现离休。

⑨ 徐光霄，现在国务院文化部。

⑩ 郭崇豪，又名郭从文，一九四〇年牺牲。

⑪ 岳喜岷，又名岳洛峰，现在在平县。

⑫ 王贯一、葛运太、郑法科，现在情况不详。

⑬ 于伯文，即于子元，范县党的早期负责人，已去世。

⑭ 王继奎，已去世。

⑮ 金瑞，范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已去世。

⑯ 根据1984年7月8日刘培岑的回忆。

⑮ 据刘培岑1984年7月10日回忆，二级还有学生党员贾彩亭、田乾一。管守律1984年7月7日回忆，三级学生党员有王登明。

⑯ 一说一个连。见管守律回忆。

⑰ 毛延武1984年7月9日回忆。

⑱ 刘培岑1984年7月10日回忆。

㉑ 毛延武《革命回忆片断、回县工作》

㉒ ㉓、㉔、《中共范县党史大事记》范县党史办编。

㉕ 管守律1984年7月7日回忆。

㉖ 徐宾回忆

㉗ 刘培岑《革命回忆录（1932——1947）》

㉘ 徐运北《关于鲁西北党的建设片断回忆》见《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内部稿第6号。

㉙ 徐宾回忆，一九三五年赵健民去徐庄找党时，见到了张诚一，张未否认有党的活动；刘培岑1984年7月10日回忆，赵健民去徐庄时，他和赵住在一个屋里。

抗战初期鲁西北几个县举办 政治军事训练班简况

陈坤林 整理

一九三七年冬，鲁西北各县政训处相继建立。为了培养抗日力量，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各县政训处先后举办了政治训练班。现将博平、阳谷、寿张几处训练班简介如下：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博平举办第一期军事干部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吸收地方上爱国青年和中小学教师四十名。训练班由高元贵、巩固，黄家瑗、李克怒、宋玉珍、王光涛、杨金栋等同志负责。训练内容，主要讲授“民众动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国际问题”等课目，施行短期训练后，分配到县基层单位工作。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阳谷县党组织领导举办了第一期政治人员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400多人。训练班负责人是申云浦、黄竹一、徐翼、徐冰等。训练班曾成立“抗日巡回传队”，到农村宣传抗日。

一九三八年一月、寿张举办了政治训练班。管大同任主任。训练班成立了“同学抗敌会”，并出版会刊宣传抗日。

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冠县在政训处主持下，举办了两期政训班。培养了大批积极抗日的农村干部。第一期训练班

结束不久，冠县就成立了农民互救会，会长郭英（郭金粟）、副会长吕宋唐；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席沙春喜（洪林）、组织部长齐淑兰（齐涛）、宣传部长沙春莲（林彬）、张春云（张壁坤）、总务部长王震凡；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席卢成松、主要负责人还有霍如清（王黎之）、阎耀华、孙良才等。

各训练班的主要宗旨是训练抗日干部、发展党的组织、争取知识分子，动员群众抗日。

鲁西北的革命熔炉——政干校

许 法 邓愧余

抗战初期，在鲁西北，一提起政干校来，那是有口皆碑，人人赞颂的。这座抗大式的革命熔炉培养了大批干部，对于开创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贡献。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节节后退。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下令军政人员一律撤退黄河以南。成千上万的武装部队和各级政府官员，眼看国土沦丧，人民群众将陷于水深火热的严重灾难中，他们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放一枪，狼狈南逃。他们所到之处，抢劫民财，杀鸡宰猪，拉夫抓丁，鱼肉乡民。以至各行各业关门闭户，十室九空，人心惶惶，无所适从。在此紧要关头，中共鲁西北特委在山东省委领导和支持下，号召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华儿女拿起枪上战场，脱下长衫到敌后打游击战，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说服动员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重返聊城守土抗战。根据中共中央动员一切力量，进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的精神，广泛地吸收和动员鲁西北地区广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抗战，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改造旧的部队，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基层政治工作干部。中共鲁西北特委根据鲁西北各地，党在盐民、农民、中小学以及师范学

校的师生中有党的工作，党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基础和影响的情况，决定仿效抗日军政大学的办法，成立山东省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干部学校（简称政干校）。开始，拟仿照陕北公学而名为鲁西北公学，后定名为政干校。实际上是党领导的抗大、陕公式的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校址在聊城城内状元街原山东省立第二中学校址，即现在的聊城实验小学所在地。一九三八年五月招生。每期学习时间两、三个月。校长范筑先（兼），付校长张郁光，教务长齐燕铭、教育长周子明（周自睿）。校部设教务、训育、总务三个处。政干校设中共党支部，支部书记巩固（巩子展、巩俊杰）。在鲁西北特委和政干校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了党的工作，建立和发展了党组织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的组织，开展了党和民先的活动。政干校和抗大一样，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训、校风。全校实行军事管理以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全校编制一个大队。大队长周子明（兼）、于汇川。大队下设中队，每期中、四个中队。中队设中队长、指导员。高境、陈自鸾、高衡书（高衡）、李肇安、郝冠英（郝鲁伟，女）、王玄（女）担任中队长、指导员。每一中队设三个小队。中队、小队干部多由鲁西北抗日游击总司令部的连排级军官担任。政干校以适应战时需要，实施政治训练，培养抗日救亡干部和增强抗战力量为教育宗旨。结业后分配鲁西北各县抗日宣传动员工作或到各部队担任政治工作。在训练期间，有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课程。政治课程有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教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队中政治工作、

民众动员论、中日问题、国际问题等。军事训练包括游击战术、步兵操典、阵中要务令、防空防毒常识、战地救护等。还可根据自愿参加日语学习，以便在战争中进行敌军工作。在聊城、临清、荷泽、寿张等地同时招生，男女兼收。聊城的入学考试是在聊城城内司马街原山东省第三师范附属小学（现新华广场）举行的。学员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但学员的文化程度悬殊，从小学学生到高中毕业生；就年龄说，从十四、五岁到四十多岁；就成分、出身说，有学生、教员，还有个别的旧官吏，如做过堂邑县公安局局长徐某，也有个别商人如临清的金增光，有农民子弟，也有地主、官僚子弟，如原籍馆陶县的旧军阀王占元的外甥等。由于招生对象复杂，举行统一的笔试是有困难的，所以入学考试主要是作文和口试。在口试中多是了解家庭和个人情况，报考目的以及对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等，也就是了解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以及身体健康情况等来确定是否录取，一般的，凡报名者均可录取，所以在招生名额以外要准备相当数量的备取生。经过这种新型的主要依靠口问和目测的入学考试之后，很快在政干校大门对过的粉白影壁上贴了榜示。学校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亲自讲课。教员称教官。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的教官是任夷（任仲夷）、巩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教官是刘子毅，民众动员论由管大同、成润、许法兼课。时事政治教育除由学校领导讲国际国内形势外，经常教育由莫循（张昭训）兼课。李士钊讲音乐课和教唱抗战歌曲。游击战术由红军老干部袁仲贤、胡超仑讲课。周子明、何克讲中日问题。教材由教官或讲课人编写，铅印16

开新闻纸版本，内容丰富实际，印刷装帧良好，由学校发给。有时也印发讲义。这在当时条件下确实是难得可贵的。每天上午两堂“学科”，每堂两小时。“术科”除早操、课间操外，每天下午军事训练两小时，学习步兵操典，进行制式教练——立正、稍息、开步走，也“拔慢步”和刺枪等等。在教学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教师不仅讲课传授知识，还要指导实践。因为这些学员毕业后就要投身到抗日战场上去，所以课程都是为此服务的。每种课程进行一段还要考试，不论笔试、口试都着重让学员回答，“怎样去做”的问题，如“举例说明否定之否定这一辩证则”，“在宣传时怎样抓住群众的思想情绪”等。在学习过程中，为了理论联系实际，使学员不仅提高思想理论认识水平，还要有实践的经验 and 体会。学校常组织学员参加战地服务工作，到前线作宣传和救护工作。也组织学员下乡，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动员工作，有时也组织野营。讲课时，教官们随形势的发展，深入浅出地讲解，比较生动活泼，容易理解。教官们在讲课时也很“浪漫主义”的，没有传统的“师道尊严”，很少生硬的说教，多是启发诱导，生动活泼，有时还出点“洋相”，引得哄堂大笑。有一次一个教师因病不能上课，请政治部副主任姚第鸿代课。他到了课堂，首先自我介绍，只见他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大字“姚第鸿”，把“第”字的最后一撇拉出二尺多长。学员们的紧张情绪便为之一扫而光了。师生们有着共同的理想，紧密地打成一片，教师们满怀热情，为培养抗战力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有时请抗日军政领导作报告，范筑先多次

来学校讲课，每届开学或结业时，他都来校讲话，为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不仅对学员是一大鼓舞，对他自己也是一种激励。还请过鲁西北第一个民主县政府的县长、共产党员、莘县县长吕世隆作报告，也邀请红军老干部王幼平、袁仲贤、胡超仑，还有朱穆之等到校讲话，影响很大，很受欢迎。陪同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到敌后参观考察的刘白羽、欧阳山尊、汪洋等，到达聊城时来政干校参观，对五百余师生讲话，解答了学员提出的问题。在大家热烈欢迎下，欧阳山尊给大家唱了“游击队歌”。政干校抓住时机，向学员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给全校师生以很大的鼓舞，也很受学员欢迎。

每个中队设救亡室。救亡室是组织和进行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中队每月出版壁报一期，有漫画、诗歌、报告文学、速写、散文、评论等文章，短小精悍，每次出刊都围满了观众。尤其是毕业典礼大会上发表的《告同学书》，语言生动，热情洋溢，号召力强，扣人心弦。学员们听得热泪盈眶，情绪激昂，师生们情不自禁地高声合唱革命歌曲，特别是《毕业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大家唱得最起劲，鼓舞着每个师生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负”已成为每个师生的誓言。

学校领导和被领导，教师和学员都有抗战到底，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充满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和豪情壮志。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有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情同骨肉，亲如手足。上下级关系、师生关系亲密无间，生活上打成一片。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满怀豪情壮志，愿为

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抗战胜利，作出应有的贡献。师生们都有严密的组织生活，每周开一次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交流思想认识，学习生活是紧张热烈的。每天上课、出操完毕，即使只有10分钟的时间，响亮的歌声也顿时充满了校园。《救中国》的歌曲是集合队伍时必须唱的，集体唱、男女二重唱，有时四部轮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大刀进行曲》是大家最爱唱的，唱起来热烈激昂，大家满怀对日寇的深仇大恨表达出每个人愤怒的心声。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救亡进行曲》常常是在队伍行进中和着步伐节拍齐唱的。男女学员最爱唱的一支歌要算《在松花江上》了，唱时如泣如诉，慷慨悲壮，常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唱歌，大家为国土沦丧而悲愤，为学好本领上战场而激昂。即使是就餐也有歌唱，叫《吃饭歌》，在吃饭前歌唱，大意是：这些饮食，老百姓供给的，我们应当为民出力，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在“杀”的口号声中解散队伍，再到饭厅就餐。每个队又都是啦啦队，你拉我唱，我拉你唱，好不热闹，啦啦队队长高喊一声，欢迎×××唱×××歌，好不好？！大家齐声回答：“好！好！好！”领队又高喊：“大家呱呱呱呱！”大家热烈鼓掌，一直到对方唱了为止，啦啦队拉歌的花样很多，也引人发噱。在学校里约有十分之一的女学员，实行真正的男女平等，打破了过去学校男女不相往来的封建礼教，男女学员在一起交谈、学习、唱歌。由于这些歌曲紧密反映现实，和抗战密切结合，句句打动人的心弦，歌者、听者感情共鸣，常常一唱百合，此起彼伏。抗战歌曲已成了战斗的号角，它强烈的激发人们的抗日

热情，鼓舞着人们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

紧张的学习之后，校院里立即沸腾起来了，每周总有一两个下午的时间举行集会，由师生表演文娱节目或集体游戏。这时，校长、教务长、训育长等校领导和教官们、学员们在一起围个半圆形席地而坐，表演的节目有合唱、清唱、吹奏、独幕剧等等。齐燕铭教务长的昆曲，临清学员田德素（田园）和金胖子的京剧捉放曹，还有一位姓葛的学员擅长吹箫，能用嘴发出二重音，都很受欢迎。集体游戏最常做的是，每人自备三个纸条，第一个写“一个人姓名”，第二个写“在什么地方”，第三个写“做什么”。然后分三堆分别敛在一起，由三个人分别随意拣一条，把三个纸条连在一起念，真是五花八门，笑料百出。有一次，有人给一位热情大方的大姐开玩笑，把三张纸条连在一起念是“×××”、“在床底下”、“讲恋爱”。把大家笑得肚子疼，她也笑得前仰后合地连声说哪个调皮鬼搞的恶作剧。这些情景是多么生动活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亲切融洽它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仍然叫人记忆犹新，好象电影似地一幕幕地活现在眼前。

政干校第四期招生一百三十人，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开学，但是，十一月十五日，日寇侵占聊城。政干校全体师生员工在聊城失守前，已经按照鲁西北特委的指示和鲁西北游击总司令部的命令安全撤出，转移到冠县、馆陶一带。后改为筑先抗日学院。迁移到黄河南活动。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政干校，培养了两千左右干部，这批新生力量，在这里接受了革命的思想理论，认清了形势，

踏上了抗日战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现在有许多干部已经是我国各条战线身负重任的领导干部，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坚强骨干。这是我们党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党的领导的伟大胜利。但是，斗争是复杂的，胜利来之不易。奉系军阀余孽，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和他的爪牙民政厅长李树椿，勾结第六区司令部参谋长王金祥，极力造谣破坏，大肆攻击我们党，杀害我党领导干部，拉拢收买部队，建立他们所掌握的学校和各种组织，妄图改变政干校的性质和教育宗旨，要把政干校改成所谓国民党正规课程的旧制学校，与我党争夺青年，争夺群众。沈鸿烈、李树椿之流，在寿张县张秋镇设立山东省政府后，开办联合中学，妄图和我党争夺青年。他们要联合中学的学生“读书救国”莫谈国事，不问政治。实际上还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毒害青年的老一套。在聊城万寿观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常常有现鲁西北民先总队部、政干校的代表和学生发言批判沈鸿烈之流欺骗青年的奇谈谬论，揭露他们毒害青年的阴谋诡计。政干校师生到阳谷、寿张、张秋镇进行宣传活动时，对这些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恶毒和最可恨的是沈鸿烈、李树椿等丧心病狂，勾结日寇攻占聊城，范筑先、张郁光、姚第鸿等数百名将士壮烈殉国。一九八二年三月下旬，笔者到邯郸瞻仰了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在烈士纪念堂、烈士墓地见到了范筑先、张郁光、姚第鸿、肖永智、刘致远、桂干生、史钦琛，张炳元、徐翼、晋士林、查茂德等烈士——我们尊敬的亲爱的老领导、老战友的灵墓遗象、遗物，思绪起伏，既悲痛又激动。今天，我们这些幸存者，看到全国各族

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正在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可以告慰牺牲了的战友们，安息吧！你们的战友和学生们正在努力继续完成你们的未竟事业，胜利就在我们前面。

本稿承蒙成润、周子明、范旭光、张升等同志提供材料与修改，一并致谢。一九八二年六月脱稿于天津技工师范学院，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修改于北京。

附：山东省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干部学校第三届招生广告
(注)

一、教育宗旨：本校以适应战时需要，实施政治训练，培养救亡干部及增强抗战力量为宗旨。

二、修业期限，三月结业，但成绩优良之学生得尽先分发任用。

三、投考资格：凡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之男女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均能报考：

(甲)小学教师；

(乙)初中及乡师毕业或肄业者；

(丙)大学毕业或肄业者；

附记：各救亡团体得保送报名，经考试及格者，准予入学。

四、任用办法：结业学生由政府分发各县任民运工作或各部队中担任政治工作。

五、课程要目：

(甲)政治训练——包括政治经济常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队中政治工作、中日问题，民众动员论与国际问题等科目。

(乙)军事训练——包括步兵操典，阵中要务令，游击战术防空防毒常识及战地救护等科目。

六、学生待遇：除食宿及讲义由学校供给外，概归自备。

七、招收名额：三百名，备取学生暂定一百名。

八、报名地点、日期及手续：

(甲)地点——(一)聊城本校，(二)临清政治部，
(三)荷泽(报名及考试地点临时公布)。

(乙)日期——自九月十七日始至十九日止。

(丙)手续——(一)呈验证件，(二)填写表格。

九、考试科目：

(甲)作文及常识测验，(乙)口试。

十、考试日期及地点：

九月二十日在原报名地点考试。

十一、录取新生入学手续：到校新生须经校医检查身体及格后，始准予向教务处注册，赴训育处登记。由总务处领取学生证后，得入所属队部报到。

十二、开学日期：十月一日

(注)原载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三八年)九月七日聊城《抗日战报》。

政干校七月野行军

冯 瑛

一九三八年七月，政干校举行了一次野行军。当时，我是即将毕业的学员，在野行军中又担任了中队的政治侦察员，对于此桩十分有意义的事，一直难忘。

干校为了在第一期（三个月一期）结束前夕，给学员一次实际的锻炼机会，同时为了推动当时的政治斗争，决定于七月中旬举行一次野行军。当时，我党领导的鲁西北抗日力量以聊城为中心，而国民党顽固派却以张秋镇为中心，进行破坏鲁西北抗战的活动。这次野行军就是要到他们的势力范围地区活动，进行一次有力地政治斗争。所以，这次野行军既是对我们的一次锻炼，又是对我们这支生力军力量的检阅，也是一次富有实际战斗性的活动。因此，大家欢欣鼓舞，群情振奋。

全校整队出发了，队伍由巩固同志带队。他是政干校党的负责人，由他带领我们去战斗，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这支有五、六百人的队伍行进在聊阳公路上，秩序井然，个个精神抖擞，军容整齐。队伍所到之处，人民群众争先观看，并赞不绝口地说：“从来没见过这样有精神又文明的队伍。”而地主、豪绅和顽固派却造谣说“这是一些小共产党，可不得了啊！”他们有些恐慌了。由于我被分配为政治侦察员，可以穿上便衣，离开队伍，在行军行列周围或驻地

附近活动，所以从聊城一出发，途中就看到和听到这些反映。

我们到了寿张，县长是顽固派冯谦光，很反动也很狡猾。他表面上很热情地接待政干校全体师生。好肉好面地供给我们，暗地里却搞阴谋和我们斗争。在寿张冯谦光召集了一个欢迎我们的大会，他企图利用他们上司们在会上发表演讲，压倒我们，打击我们。这两个人，一个是所谓国大代表刘某某，一个是国民党山东省常委。这两个人一上台就大放厥词，高唱“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府（国民党政府）”、“一个领袖（蒋委员长）”的顽固论调，并声称统一战线要由国民党领导等等。这两个家伙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叫嚷，我们政干校的师生在台下却高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坚持团结，一致抗日”、“坚持前进，反对倒退”以及“谁要破坏抗战，谁就是汉奸”、“谁要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谁就是犯罪”等口号，口号声一浪接一浪，把这两个家伙气的目瞪口呆。在场的群众也高喊：“把这两个家伙撵下台去！”此后，我们的巩固同志讲了话，义正词严地反驳了那两个家伙的陈词滥论。巩固同志的讲话不断被全场热烈的掌声和“拥护抗战”、“坚持团结”、“把抗战进行到底”的口号声所打断，台上台下十分吻合。随后，我们干校的齐燕铭教育长也走上主席台，他的将军衔和职务比冯谦光那伙人也高的多，这样那几个顽固派更显得狼狈不堪了。之后，我们的队伍在散会回驻地时，又在冯谦光的县政府门口示威、喊口号约半小时。政干校在寿张住了两天，在政治上扩大了影响，给顽固派以沉重打击。

从寿张行军返回后，这时阳谷县长是半顽固派张纸庠，他比寿张的冯谦光稍开明些，但是受王金祥一伙及阳谷顽固派刘建高、熊某某之流的控制。他可能接受了冯谦光的经验，没有敢开欢迎会，于是我们只在他的县政府门前示了威，就到安乐镇去了。

阳谷的国民党顽固派这时在安乐镇办了一个训练班。刘建高在那里欺骗青年学生，大肆发展三青团员，培植反动势力，进行反动宣传，与我们以聊城为中心的鲁西抗战力量对峙。我们政干校到达安乐镇后，主动邀请他们开联欢会，他们不好不答应。于是就在一天下午，在他们训练班的大门外（旧职业学校门前）场里“两军对垒”似的开始发言致词，进行交锋了。两边学员自由发言，他们的学员不到一小时就理屈词尽了，而我们的学员却积极踊跃，个个表现的有理、有力、有节。两小时以后，我们见到他们的队伍乱了，一些顽固一点的分子偷偷地溜跑了，而多数学员却有兴趣地听我们发言。之后他们中不少学员把我们紧紧地围拢起来，要我们多讲些道理。散会之后，他们有许多学员跑到我们的住地，真正联欢起来，有的表示要脱离这个训练班，到我们干校来学习，其中有我的几个同学就是这样。

政干校这次野行军，与这两个县的顽固派势力进行了斗争，沿途进行了政治宣传，大大扩大了我党政策、方针的影响，教育和鼓舞了广大群众，锻炼了我们这支队伍，提高了干校学员的斗争精神；给这几个县的顽固派势力一次政治上的沉重打击，加速了这两个县的分化。因此，政干校七月野行军是有积极意义的。

野行军经过半个月，收获不小。我于九月底结束，被分配到抗日青年挺进大队作政治工作去了。

团结战斗的鲁西北

特委党员训练班

王天虹

鲁西北特委驻地冠县城北八里庄，距县城较近。仅有四公里，交通方便。一九三八年十月（农历）间，中共冠县县委决定调我赴冠北八里庄村参加党员训练班。我当时拿着入党介绍人阎耀华同志（当时冠县六区民运指导员）写的一封介绍信，要我亲自去找中共冠县县委书记许梦侠同志。梦侠同志接过介绍信后，当即给我写了一封去特委党员训练班的介绍信。我高高兴兴的前去特委党员训练班了。到达目的地后，我将介绍信，面交办理接待入学业务的苏群同志。他满面笑容热情地接待我，随即把我编入一个党的小组，正式参加学习。那时党处于秘密的环境，不能公开身份，为了保密起见，参加党训班的每个党员，组织上都给临时起了化名，

我的化名叫王广才，是苏群同志起的。记得我们这个党小组，共九人。党的小组长是民主表决推选的，党的小组长是郭思九同志，他年轻有为，十分活跃。党训班的学员，都是从鲁西北各县调来的，约计有七八十人。冠县、馆陶、临清、莘县等县占多数。党训班的机构，象党校一样，校长是鲁西北特委副书记张炳元同志。开学和毕业典礼他都来讲了话。党训班结束前，向全体学员同志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

神——毛主席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总结。教员绝大多数系鲁西北特委负责同志，亲自授课，讲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完全采用启发式的授课。下课后，分党的小组漫谈讨论。大家发言踊跃热烈，讨论得比较深刻，因此领会消化的比较好。学习了两个多月，大家谈心得体会时，一致感觉收获很大，受益很深。课程一共有四门。党的基本知识授课人为王晋亨同志（特委负责人，后为鲁西北地委组织部长抗战时牺牲），民运工作授课人为徐运北同志（现任轻工业部顾问），统一战线授课人为鲁西北特委付书记张炳元同志（抗战时牺牲），战争动员武装斗争授课人为訾修林同志。此外，申云浦同志（现任贵州省委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苏群（一九四八年牺牲）等同志都讲过课。王亚民同志（抗战中牺牲）教唱救亡革命歌曲——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工人歌、黄河进行曲、延安颂等。在党训班整个学习过程中特委负责同志及党训班负责人，平易近人，作风深入，艰苦朴素，和学员同呼吸、共命运。总之，同甘共苦，上下左右打成一片，完全是亲密的同志关系，团结战斗，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关心，阶级友爱的精神发扬得很好。领导和学员之间 学员相互之间，倍感亲切，真是亲密无间，深感党的温暖，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党的小组生活会十分严格，一星期过一次组织生活，除汇报思想情况外，就是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为一个刚入党不久的党员深感一切新鲜，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后，各方面都受到深刻教育和锻炼，思想上、工作上都有所提高。特别是对党的基本知识方面——党的奋斗目标，党的性质、党的最低和

最高纲领等较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使我深深感到鲁西北特委训练班和延安抗大的校风一样，处处体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动局面。

编者注：据申云甫同志一九八四年五月初谈，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聊城失守后，鲁西特委由聊城迁往冠县，十一月下旬，特委班子进行了调整，书记徐运北，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炳元，宣传部长王晋亭，民运部长申运甫。这个特委延续到鲁西区党委建立后重新划分地委为止。

关于筑先学院的回忆

刘希鹤

一九三九年约八月间，由林远同志率领我们（杨俊升、刘湘江、刘富昌、刘庆林、赵敬斋等）八、九人，从鲁西北专署赴筑先学院学习（注）。当时，林远同志系冀鲁中学筹备负责人，后来听说冀鲁中学停办才调林远同志去筑先学院的。我们到达鲁西行署后，筑先学院筹备尚未完善，行署将我们介绍到抗大二分校行政五队学习。约在十月间筑先学院筹备完善，学员陆续到达，我等也由行政队转到筑先学院，但杨俊升、刘湘江仍留行政队学习。筑先学院共分两部分，一是师资速成班，一是中学部，共约二百人左右，各一百人上下。

学院的组织机构：院部下设教务室、训育室、行政室（或科），学员组织均叫中队，如师资队下设分队，分队设班。学员都穿军装，发武器（步枪、手榴弹等）。

筑先学院院长，由行署负责教育部门的（局或处）负责人管大同同志兼任，后管大同同志调走，由张挽同志兼任。教务主任林远，后来增加张书成任副主任，训育主任吴鸿宾，副主任高×。还有几位教员。

教育宗旨主要是培养教育人才，如小学教员和基层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县文教科长、科员，区的文教助理员等）。教学内容，当时还设有正式课本，多讲授党的政策，抗战理

论，教育的重要性，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等，也讲授政治经济学。张书成副主任到职后，讲授政经学校较多。

学生的来源多是各县选送的，有的是抽调的，也有社会知识青年。文化程度、学生年龄均参差不齐，一般文化水平较低、年龄较小的多分配到中学部，文化水平稍高、年龄较大的多分配到师资班。师资队受训六个月毕业，结业后归原来县分配工作。学员分配什么较适宜，学院提出建议，如我，学院建议作县文教科示导员或中心小学校长。中学部约两年毕业。

党组织在学院活动，那时是秘密的，当时我不是党员，了解情况甚少。

学校活动地点：随行署多在阳谷、东阿、寿张一带活动。学院和抗大二分校，除教学内容各异外，在行动上基本上是一个整体。

筑先学院筹备工作或政干校改变成学院的经过，我不了解情况。建议找管大同同志，我想他是了解很清楚的（管大同同志，已病逝）。

上述，是我的回忆，作为当时的一个学生来讲，知道的情况肯定是很少的，所述的情况也不一定十分准确，谨供研究时参考。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注：根据徐运北同志《鲁西区党委工作报告》和邵之言同志回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聊城失守后，政干校

随同鲁西特委， 几经辗转到冠陶县城（现为冠县北陶镇）为纪念范筑先将军，将原政干校改为筑先抗战学院。该院余现有一部分年令较小未分配工作的学员外，又招收了部分青年入院。学院共办两期，因形势变化，遂告束。

在筑先抗战学院工作情况

藏君宇

我是一九四一年七月到筑先抗战学院担任副院长的。在这以前在鲁西行署教育处担任副处长，当时的处长是管大同，这个学校的筹备主要是管大同来掌握的。筹备学校最初的负责人是张叔成，然后是吴鸿宾，一九四一年鲁西和冀鲁豫合并，叫“冀鲁豫”。在这两区合并的时候，我调到筑先抗战学院来。不久晁哲甫任冀鲁豫边区行署主任，院长就改由晁哲甫担任了。这学校创建的目的，主要是从长期坚持抗日战争着眼，为抗日战争造就人材，造就干部，这是主要的。另外一个考虑，要从敌占区吸收大批青年到根据地来，这一点从实际情况看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因为从这个敌占区，一些青年直接参加工作。有些人他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可是要读书，要到根据地来上学，受比较正规的教育，这样一个办法，很有号召力，很起作用。当时从学生来源，根据地占相当大的部分，还有不少人是从敌占区来的。这个办学校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一方面要给同学们正规的、各种文化知识，所以学校的文化课，占很重要的地位。这不是短期的，要学习二、三年打下一定的文化基础，这样便出来工作。另方面，政治教育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在敌人的据点包围当中，有时还要同敌人作战，这就

需要提高同学们的政治觉悟。要造就革命人材，政治教育这就更是必要的，在课程设置方面就体现出来了。文化课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等自然科学；有历史、地理；政治课主要是关于抗日战争的理论、政策；另外还有比较根本的课程、唯物史观、革命近代史等。为了适应局势、环境，学生要自卫，要作战，要背枪，所以要学习军事课。当时的教员还是有相当的教学水平和政治水平。从学历讲吧，多数都是大学毕业，林远是教务主任，他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陈香坡是大学毕业，而且在当地很有名望的，教学经验很丰富。吕逸帆、何伟都是大学生。沈建图同志，他是做政治工作的指导员，是香港大学毕业，是新加坡的华侨，为抗战回到祖国来的，他的英文水平很高，后来是新华社有名的记者。教员当中，有部分是党政干部，如徐鹤京，他就是一个县的县长，当时因身体不太好，到学校来，一方面养病，另一方面是教课。学校的活动，在那时候，在敌后，离不了武装斗争，学校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主要依靠抗大。鲁西后来也成为冀鲁豫，有抗大的一个分校，我们就随抗大分校活动，军事行动、情报工作，都由抗大负责和指挥，筑先学院随着行动，听他们的指挥，但是，自己也得要有武装力量，因为驻防时须自己警卫，行军中也须有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力量，筑院所以有个军事大队部，学生在班级组织以外，还有个军事组织，这就是区队、分队。

（摘自《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内部稿第六号，题目为编者所加）

鲁西——冀鲁豫筑先抗战学院 部分教职员名单

肖 华	鲁西行署主任兼院长
董君毅	冀鲁豫行署主任兼院长
张 挽	副院长
张叔成	秘书长、教务处主任、副主任
吴鸿宾	训育处主任
高 衡	训育处副主任
林 远	教务处副主任、主任
尚宝书	总务主任
张霖甫	总务主任
李玉慈	师训班主任
沈建图	生活大队部指导员
李景贤	院部机关指导员
李 华	院部机关指导员
李曙明	女生指导员，女
王也甲	女生指导员，女
王 绩	教务股长，女
王 建	文印股长
靖季林	总务股长
孔明生	粮秣股长
郝 伟	教员

徐鹤京	教员
陈香坡	教员
吕逸帆	教员
武 装	教员
顾慕义	大队长
鲁 平	特派员

筑先抗战学院一级学生名单

于 荣	王兆斌	王 林	田苗雨	冯巨川	许金宝
刘兴海	刘传铭	刘鹤龄	朱异石	朱基迅	杨子远
杨耀久	陈惠敏	陈振岚	李 曼(女)		李泽民
李 伟	吴广新	吴广亮	辛培宏	张宗武	张 华
张治光	张尚德	张志超	张承春	范南华	孟广宽
孟 超	孟 萍	赵敬斋	赵 宏	桑 根	焦 杰
董凤鸣	董保明	满 丰	傅厚明		

筑先抗战学院二级学生名单

于敬轩	万小获	孔 祥	邓桂生	王志钧	王正珠
王正兰	王鹤亭	王冠英	尹承灿	尹承蕤	田 夫
孙 涛	刘正厚	刘庆斋	刘干卿	刘树坤	刘 声
朱光华	乔学珩	乔学珮	任瑞亭	靖季林	李 民
李德成	李爱华	李 彬	李玉川	李凯声	李金畔
邹玉明	杜得生	苏 民	吴 民	武广太	辛培营

辛培田	范新平	周立	明印生	罗英	岳光
段庭芳	段乔杉	段振邦	侯仲选	郝海亭	赵卓如
赵衍章	饶毅梅(女)		常兆垣	韩登太	程永康
程铁山	傅良斋	葛兴周	吕晓朋(女)		

筑先抗战学院三级学生名单

万光	卫川	卫平	王正菊	王正福	
王翠文(女)		王俊杰	王运辉	王勇(女)	
王运亮	王生运	王旭	牛可	车翠云(女)	
文魁	田民	刘振北	申家宾	吕安	李大中
李德熙	李在鑫	李国光	李瑞云	李洪岑	李恒善
李冀峰	李洪胜	李志魁	李耀华	李毅	李中生
乔学琨	乔明安	江林	武梦常	吴逢会	陈岳
陈广远	苏伊(女)		苏华	辛衍景	汪进
郑传兰	郑新华	国华	周洪庆	周传任	孟令琛
张青	张志经	张正新	张衍俊	张国昌	张明磊
张克一	袁瑞民	苑景芳(女)		林荣(女)	
林莉(女)		金焰	胡广杰	赵恕卿	
赵静湘(女)		赵法明	赵侠	赵同	侯径三
侯月明(女)		姜渔潭	郭宪才	郭伯爵	郭宪民
郭宪广	高永清	唐勇	阎祝平	贾振华	路浩
程秀华(女)	董桂林	董继州		董忠民	栾鲁亭
靳光	豫平	冀平	冀洲		

(原载《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内部稿第五号)

阳谷中学沿革简介

郑芷华 整理

阳谷一中的前身是冀鲁豫边区第二中学（开始创建时名为湖西中学）、济宁七中、济宁女中、济宁师范、边区一中一分校。

冀鲁豫边区第二中学

湖西中学，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在单县东南四角楼成立。它创建于湖西抗日根据地，所以命名为“湖西中学”。后来，冀鲁豫边区按照边区各个中学成立时间的先后，又把“湖西中学”命名为“冀鲁豫边区第二中学”。

一九四三年前，冀鲁豫边区第二中学随边区政府活动在金乡、单县、鱼台、丰县一带；抗战胜利后，湖西解放区迅速扩大，长期被日寇蹂躏的金乡、单县、武成、巨野、曹县、鱼台等县城，相继克复，回到人民的手中，各县联成一片。这时，湖西地委决定，要第二中学进驻新解放的鱼台县城。开始住在原伪县政府的院子里，后来又搬进了旧“书院”里。一九四六年初，湖西地委决定第二中学移住新乡县城，住在北关内一座姓辛的大院子里和牌坊南的一所公房里。一九四六年秋，蒋军进犯湖西，学校开始北撤。

冀鲁豫第二中学，一九四一年开始招生，到一九四五年

底搬进鱼台县城时，有学生三百余人，其中第四级有四十余人，是毕业班；第五级有一百三十多人，分“五一”、“五二”、“五三”三个班级六个区队，人数最多；第六级有百人左右，分“六一”、“六二”、两个班级。教师、干部、事务人员有五十人左右。驻进金乡城以后，又招收了一百多名新生，编为七级，分为“七一”和“七二”。在北撤的路上，特别是到了黄河北以后，有不少撤离湖西的青年干部和干部子女被送到学校中来，这些新来的学员编在七级；后来，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程度参差不齐，年龄有大有小，所以在（阿城东南二里）皋上进行了整编，把新来的学员另成立一个班级，叫预科（即八级）。由于不断有从湖西撤出来的青年干部和干部子女被送到学校中来，预科的学员越来越多。一九四七年五、六月间，在苑店把预科分成两个班级，即“预科一”（班主任孔令闻）和“预科二”（班主任孙玉乾）。湖西地区的党政领导，把撤离湖西的一部分妇女干部集中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妇女训练班，约一百多人，由苏健、王子香、乔琳等同志负责，在建制上划归第二中学领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湖西中学妇训班”（一九四六年底，在皋上南面的一个小村上住过）。妇训班存在了一年左右，由于形势的变化，后来，又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了。

第二中学有个分校，叫着苏北中学，校长刘君斋。创建于一九四四年秋。一九四五年八月间，曾合并于校本部，不久又以苏北中学名义在丰、沛、铜一带招收了师训班和普通班。四六年春，也搬到金乡城内。第二中学撤出金乡城，苏北中学也同时撤离，随第二中学活动，不久，就又合并到第

二中学来了。

开始，行署第一专员李贞乾兼校长（江苏人丰县战役牺牲），一九四二年，校长换杨经元（民主人士，边区参议员、冀鲁豫建国学院院长杨汉章的胞弟），付校长刘尹斋、朱煌如（负责党团工作），教导主任张剑华、付教导主任赵勉，总务主任聂补伍。驻进金乡以后，党团负责人朱煌如，其成员有张剑华、赵勉，一九四八年三、四月间（在阳谷吕超范），在区党委参加第一批整党的部分人员回到学校，学校干部有了相当大的变动。朱煌如、孙玉乾、王运通、孙基纯、岳纯修、李新刚等，参加整党后，没有返回学校，被调往别处工作。赵勉于一九四七年九月间离开学校，参加土地会议后，又留在冀鲁豫区党委参加了第一批整党，结束后才返回学校，被任命为副校长、党组负责人，代替朱煌如的职务，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区党委又派来一位教导主任李冰（在此以前，他是报社的编辑），同时，任命聂补伍为副教导主任，总务主任职务由孟逸东接任，接着，副校长刘尹斋也被调离学校。

冀鲁豫边区第七中学

冀鲁豫边区第七中学的前身是东平中学（边区一中一分校）、济宁联中（济宁七中、济宁女中、济宁师范），

冀鲁豫边区第一中学第一分校，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崑山县桑老庄（现属梁山县）成立。一共三个班，分别叫一、二、三级，共有学生二百余人，一、二级是从住在白衣阁的边区一中带过来的。麦前（四月份）在桑老庄又招了第三级

一个班。校长是宋辛夷、教导主任是王贯一、副教导主任唐朗斋。

一九四六年初（刚过了春节），一中一分校搬到东平城里书院小学，改名冀鲁豫边区东平中学。春季，一级学生毕业分配又招了第四级，一个班，学生七、八十人。另外，还成立了干部文化补习班，有学员四十人；师范班，有学员五十人；干训班，有学员五十人。暑假后，宋辛夷校长调走。

一九四六年秋，汶上中学，两个班，也撤到东平境内，跟东平中学合并，称东平中学汶上分校。分校负责人是陈伯武。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济宁解放，成立冀鲁豫边区济宁七中、冀鲁豫边区济宁女中、冀鲁豫边区济宁师范。济宁七中六个班，有学生二、三百人，校长陈大羽，校址在原中西中学；济宁女中两个班，有学生七、八十人，校长李蕴华，校址在南关外；济宁师范六个班，有学生二、三百人，校长赵紫生，教导主任王贯一（从一中一分校调入），校址在中西中学西边（曾作中学女生宿舍）。

一九四六年八月，国民党杂牌军吴化文部占领济宁，济宁七中、济宁女中、济宁师范从济宁撤出，当时正值暑假，跟出来的师生不多，只有少数学生，部分教师，共八十四人，其中学生四五十人。撤出济宁后，三个学校合并，称济宁联中，陈大羽任校长兼党总支书记。一个月以后，陈调出，赵紫生任校长。整个下半年，随军活动在南旺、汶上、昆山一带。一九四七年一月（或二月），济宁联中师生进东平城里，住在城里西菜园小学。

一九四七年三月，东平吃紧，东平中学、济宁联中一起撤出东平城，住在东平城北三十里北辛庄天主教堂里。是年四月，根据第七专署的指示，两校合并，合并后改称冀鲁豫边区第七中学。原济宁联中的学生编为五级，赵紫生任校长，王贯一任付校长兼总支书记，唐朗斋、王柯坪任教导主任，教务员王浩明、训导员张政亭（当时叫李政亭）兼总支部委员。

冀鲁豫边区第七中学在北辛庄住了一个春天，到五月份，全校共有九个班级，即二级甲、二级乙，三级一个班，四级一个班，五级一个班，六级一个班，另有文化补习班、师范班、干训班，共有学生五百三十余人。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东平形势急骤恶化，七中变成了游击学校。

阳谷中学

一九四六年八月中旬，敌军占领了丰县、鱼台，八月二十日夜里，湖西中学的队伍离开了金乡县城。从此，第二中学又恢复了它的游击生活。从巨南到郛北，十月从郛北李杭出发，在寿张县孙口过了黄河，过河后，活动在寿张、阳谷、东阿、聊城的农村。

一九四七年秋天，冀鲁豫边区第七中学从寿张东的张堂过黄河，住在张秋东的窦营，以后住过大碾郭、司营、城角孟等村。

一九四八年六月初，根据冀鲁豫区党委的指示，把冀鲁豫边区第二中学与冀鲁豫边区第七中学合并，合并后仍称冀

鲁豫边区第二中学并决定进驻阳谷城里，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动。当时第二中学的师生住在阳谷县城东北之一里孟营（人称“城角孟”）。第七中学的师生住在阳谷正东三里之司营。两校师生在孟营召开合并大会，随即进行编班，分配干部。

合并后的第二中学，仍由杨经元任校长，原第七中学校长邓光耘任付校长，赵勉任付校长兼教导主任，原第七中学教导主任王柯坪任付教导主任。不久，王柯坪调走，原第七中的语文教师张绍禹任教导付主任。学校党的工作由赵勉负责。由于杨经元、邓光耘两位校长均系非党同志，所以，赵勉负责对学校的全面领导。合并后，党的关系属冀鲁豫行署直属党委领导，取消了学校中的党组。

合并后的第二中学，把原第二中学的七级改称第一级，建制保持不变，等待毕业分配。除此之外，原两校各级学生一律进行统一考试，按文化程度统一编班，按顺序编为：

二级：两个班级，即二级一班，二级二班。

三级：三个班级，即三级一班，三级二班，三级三班。

四级：两个班级，一个普通班，一个短期班，短期班的学员多半是一些地方干部和部队战士。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级（原第七级）学生毕业。这一届招生时有一百多人，由于北撤和不断有人调出，这时只有二十人左右了。一级的学生在鉴定之后，遂由其班主任带领，送冀鲁豫行署分配工作。

济南解放后，在阳谷县就很少见到敌人的飞机了。第二中学的校部、教师以及各级学生，陆续搬进城里，在这里定

居下来。在阳谷北关里，有一片房子，曾是阳谷伪中、伪师的校舍（现在阳谷一中西院水沟以东地方），里边有一个能容纳二百人的小礼堂，有一座与礼堂同样大小的“二郎担山”式的办公用房，在办公室周围有四座格式一样的教室，另外，还有几十间可作学生宿舍的房子，前后两院，小巧紧凑，第二中学就住在这里。

一九四九年平原省成立后，改名“平原省立阳谷中学”，从此，冀鲁豫边区第二中学，随着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遂由一所以培养干部为主的学校，改为一所普通中学了。

建立新校

冀鲁豫边区第二中学定居阳谷后，上级领导机关采用“母鸡下蛋”的办法，从第二中学抽调了成套的干部，组成了新的班子，去创办新的中学。主要是：

〈一〉淮海战役后，湖西专署要在沛县创办中学，除派湖西专署副专员刘尹斋（原二中副校长）出任校长外，行署从第二中学调赵勉任副校长，孙健良为教导主任，孟逸东为总务主任，季文存为教员，杨天柱为教导员。组成了沛县中学的领导班子，建立了沛县中学。

〈二〉一九四九年春，湖西专区又要在金乡创办中学，行署决定调第二中学校长杨经元出任校长，从沛中调赵勉任副校长，调二中的李永昶、薛正琛到金乡中学任教导员。教员杨赞元、一部分管理员、炊事员、通讯员等也被调往金乡中学。还决定，第二中学的二、三、四各级学生，

凡从湖西地区来的，根据本人志愿，都可以去金乡。事实上，原来第二中学大部分学生都已开赴金乡。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想回湖西，只有少数人愿意留在阳谷。这些去金乡的干部、教师、事务人员和学生，构成了金乡中学基础。所以金乡中学成立后，保持着原第二中学一整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三〉平原省成立后不久，要在郛城创办中学，又从阳谷中学调配了一套领导班子。遂调邓光出任校长，调教导员廖一庸任教导主任，调总务主任陈宗典出任总务主任，另外，还带了几个管理人员，办起了郛城中学。

阳谷中学的领导骨干和教师骨干，仍然是第二中学的基本队伍。如教导主任（原七中）、总务主任刘继昌（原二中）、教导员孔令闻（原二中）、历史教师唐朗斋（原七中）、化学教师任广洪（原二中）校医田永生（原二中）、管理员田玉纯（原二中）等，都是原来边区中学的。

材料来源：

湖西中学材料，由赵勉同志提供。赵勉同志系原湖西中学副校长，现任济宁师专副校长。

济宁七中、济宁师范、济宁女中材料，由赵紫生同志、王贯一同志、张秋芳同志、张绮华同志提供。赵紫生同志系原济宁师范校长，现任曲阜师院院长；王贯一同志系原济宁七中付校长，现任泰山医学院基建科科长；张秋芳同志系原

济宁七中教师，现任泰山医学院工会主席；张绮华系原济宁女中教师，现任山东大学教务处处长。

边区一中一分校材料，由张绍禹同志、王浩同志提供。张绍禹同志原系一分校教师，建国后在阳谷一中、冠县一中当校长（退休）；王浩明同志系原一分校教师，现任曲阜师范教导主任。

诸校合并成立阳谷中学后的材料，由李化民同志提供，李化民同志系边区中学学生，后留分校当职员。现任聊城一中管理员。

一九八四年二月

鲁西革命青年的摇篮

——冀鲁豫抗日第四中学情况概述

李志成 整理

一、学校的创办和发展概况

冀鲁豫抗日第四中学（即今聊城一中前身）创建于一九四二年冬。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党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号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冀鲁豫区党、政、军、民、武等部门和机关，都精简了一部分年龄较小的同志，把他们集中在较安全的地区进行培训和学习，冀鲁豫区所属的泰西地委遵照上级指示，决定成立一所干部训练班性质的学校，于是，一九四二年冬冀鲁豫抗日第四中学便在东阿县牛角店区创办开学。

建校初，学校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和破坏，代号称为“文和轩”，规模也很小，仅有校长张海平（萍），指导员赵长文，教师岳克寒等，正式学生十八名。后来，随着规模的扩大，“文和轩”改名为“泰西公学”。一九四三年，泰西和运东两个地委合并后，该校又改名为“泰运中学”，任务仍然是为我党培训干部。一九四四年，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好转，解放区不断扩大，党政军各部门急需充实大批干部，冀鲁

豫区行署决定，将根据地的随军中学、公学和干部训练班按成立时间先后，统一名称，泰运中学即被命名为冀鲁豫第四中学。

冀鲁豫四中是一所游击式的随军中学。它没有固定校址，学制也不稳定，也无校舍和桌椅，经常处于流动活动状态，采取边行军边教学的方式。建校初期主要活动在东阿牛角店一带，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主要在长清、平阴一带活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期间，学校迁往平阴，后又迁往东阿铜城一带，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初，学校主要在东阿姜楼、西城堡一带活动，在此期间与阳谷分校的师生合并。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又迁至聊城城南八大王庄，四、五月间，又迁至茌平的吴官屯，一九四八年冬迁至聊城双街今聊城一中校址。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八年的六年中，该校共为党政军各部门培养输送干部一千二、三百人，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锻炼和考验，大多数已成为各级领导骨干，分布在全国各地，主要集中于北京、河南、贵州等省市。有的在地方，有的在部队，有的成为中高级知识分子，有的出国深造。在当时艰苦的岁月里，这所学校被誉为“鲁西青年的革命摇篮”。

冀鲁豫抗日第四中学的师生员工都与各部分工作人员一样，实行供给制待遇，每人每天小米一斤，油盐各二钱，菜金每天鲁西票二分；学生所用的背包、书包、讲义夹及教材和其他用品均由上级统一供给，所以，它是一所抗大式的干部学校。

学生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党政军武等部门和机关精简的部分年龄较小的“红小鬼”；（二）革命干部、军人的子女和亲属；（三）各地抗日高小保送和考入的优秀学生；（四）从敌占区投身革命后由地下党的机关介绍入校的进步青年；（五）各地保送和选送的儿童团干部和青年干部；（六）根据地机关在职培训的调干学员。此外还有少数敌占区的进步小学教员和高小毕业生。

二、学校的课程和学生活动

冀鲁豫抗日第四中学是一所以培养革命干部为宗旨的学校，因此它的课程完全是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开设的。主要课程如下：

政治课，主要内容是根据当时党的中心工作，讲授党的方针政策，以便于学生参加减租减息、征收公粮、支前和土改以及其他突击性工作。政治理论主要教材有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艾思奇的《社会科学概论》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理论知识，目的在于端正学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联系当时抗日战争的实际，学习革命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此外，还经常邀请地委和行署的领导人向学生做政治形势和任务方面的报告。

语文课，主要选学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和鲁迅的杂文及小说。为激发学生抗日爱国热忱，还着重讲解我国古代民族英雄的诗文，如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以及赞颂岳飞等人的古文。另外，为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选讲一些通讯报导以及延安和边区党报的社论及评论文章。

史地课、历史课内容主要讲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抗日战争史。重点讲授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侵略；讲授“五四”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爱国活动；联系日寇对中国的侵略，激发学生爱国热忱。地理课主要联系解放区和根据地的版图；介绍位置、面积、人口、物产及各地区的抗日形势，使学生了解这些地区的自然和经济，增强对革命根据地的了解和认识。

音乐课也是学校的一门重要课程，因为学生毕业后不少人要到部队或机关搞文化宣传活动，这就需要会吹、拉、弹、唱，学校除组织学生学唱抗日流行歌曲外，还举行歌咏比赛和文娱演出。

学校除进行文化学习外，还组织师生大力开展各项课余活动。军事训练课是一门主课，学生按年级、班组编制，分别相当于部队的连、排、班，学生活动从早操、开会、上课到行军、住宿都以班、组为单位活动，具有较强的部队特点和军事化特征。

学校从进行文化学习和军事训练外，学生的课余生活也是非常活跃的。文体活动主要内容是打篮球、乒乓球、各种游戏性娱乐活动和唱歌、自编自演文娱节目。学校的业余剧团非常活跃，结合斗争形势编演各种独幕剧、活报剧和秧歌剧等。如《妇女放脚》、《夫妻识字》、《军民联合打日本》、歌舞剧《白毛女》、《血泪仇》、《共产党真正抗日，国民党妥协投降》、《气壮山河》等，这些剧目多半是学生和教师自编自演的，在与部队和群众的联欢会上演出后起到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打击敌人的作用。

课外文化生活也是生动活泼的。学生中办了壁报、板报、文艺刊物，内容丰富多采。每班设有一个“救亡室”，以俱乐部的方式开展活动。墙报、刊物均有刊名，内容包括漫画、社论、评论、驳论、诗词、评比等栏目。学生的思想活跃，民主空气浓厚，学生中每周一次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学校沿用了延安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校训。

学校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从一九四二年建校初的十几人，经过连续招生，到一九四四年已经初具规模，一九四五年在校生已达三百余人，毕业生总数达千余人。为了及时给党政军各部门输送干部，有时大批大批地甚至整个班级被输送到野战部队、军区、军分区和地方党政部门担任基层领导干部。该校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后，由于有文化、觉悟高，所以各部门都非常欢迎。

三 边区军民与师生的战斗情谊

冀鲁豫抗日第四中学直接受冀鲁豫区党委的领导，由边区行署教育处管辖。上级领导的秘密文件和军区的军事情报都由交通员直接送到学校，以决定学校的转移和与主力部队的配合。

学校设党支部，党组织不公开，支部书记的公开身份是政治指导员（后又分为教导员和指导员两种职称）。学校的教师、工作人员均配有长短枪支，年龄较大的高年级学生发给步枪或手榴弹，随时准备参加战斗。

学校活动的主要区域在当时的泰西和运东地区。这里是

鲁中山区至太行山区之间的交通要塞，也是通往革命圣地延安的主要通道之一。敌人的封锁、破坏和扫荡是非常残酷的，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学校能够长期存在，不断发展，没有遭到重大破坏，并为革命培养了千余名干部，最重要的保证就是边区军民对学校的关怀和支援。

边区军民对学校的支援是多方面的：

边区军民保障了师生的生命安全。该校活动的主要地区是山东西部的长清、齐河、肥城、茌平、平阴、东阿等县。这些县的地方抗日武装和驻防主力部队都把保护学校做为重大使命，千方百计保证师生的生命安全。凡是大的行军和转移，前后均有武装部队或县大队保护。如该校二级的东阿籍十二名学生入校时，由长清、东阿、平阴三个县大队护送，辗转行军一个多月，才安全的到达平阴，找到学校。又如一九四四年该校师生在一次敌人扫荡中遇险，学生年龄都在十七岁以下，长途行军一天一夜，精疲力竭，情况十分危急。在这关键时刻，齐禹县大队及时出击迎敌，激战一天，双方均有伤亡，却保护师生幸免遇难。

边区军民省吃俭用，保障了师生的生活供给。全校师生的吃喝穿住，都依赖于边区军民的供给，在形势最艰苦的时候，学校采取化整为零，寓学于农的办法，将师生按班组分散到附近村庄，住在群众家中，实行分散教学，采取小先生制的办法，利用树林、青纱帐做掩护，边学习边战斗边做群众工作，与广大群众风雨同舟，休戚与共。

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师生之间也结成了战斗的情谊。他们同吃、同住、同活动、同战斗，待遇相同，要求一律。

在教学上采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办法，能者为师，采取小先生制，教师多数是一专多能，身兼数职，他们不但对学生的生活、学习负责，更为学生的生命安全负责。每次行军或转移，校长、指导员都要做动员报告，行军、宿营、避险、隐蔽都须全盘布置安排。特别是校长张海萍，在学校发展、师生安全等重大问题上贡献颇大，广大师生有口皆碑，记忆犹新。如有一次深夜师生宿营地被敌人包围，张校长亲自组织指挥师生突围，当时形势极为危险，校务人员几次催促他赶快转移，但他首先想到师生的安全，直到师生全部转移出村后，他才最后一个离开村子，他的女儿张培华见他鞋子跑掉，气喘吁吁的样子埋怨他为何不早些撤离时，他语重心长的对女儿说：“上级把这么多老师和学生交给我，我要对他们每个人的安全负责，我自己出了事只是一个人，全校师生出了危险我怎么向上级领导交待。”张校长关心体贴学生生活的事例至今还在学生中传为佳话，如他既亲自深入学生中了解伙食，向学生嘘寒问暖，又关心学生的穿衣用具，他曾多次在油灯下给学生缝补衣服和鞋袜，很多当时的学生回忆起来，都称颂说：“当时的张校长对我们真是又当爹又当娘啊！”

四十年过去了，今天，当年冀鲁豫四中的学生大多数已年过半百，有的已年逾花甲，他们有的已子孙满堂，有的已满头白发，但是只要回忆起当年在学校中的战斗和学习生活，都情不自禁的开怀畅谈。在北京的几十名校友每年都在颐和园的万寿山上欢聚一次，大家畅叙当年的战斗历程，高歌当时的抗日歌曲，跳起当年的秧歌舞，美好的回忆又把大家带入

四十年前朝气蓬勃充满青春活力的革命战斗岁月。

注：本文系根据冀鲁豫四中指导员赵长文、原校学生聂衍增、杨志高、马登申、张培华等同志的座谈回忆录音整理，对于内容中的出入和缺漏有待其他知情同志补正。

抗大式的冀鲁豫边区第四中学

杨志高

冀鲁豫边区第四中学（以下简称四中）成立于一九四二年冬，即抗日战争的第六个年头。当时抗日战争正在胜利发展，又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在这一情况下，根据冀鲁豫边区党委的决定，“既要精兵简政，又要培养干部”，四中建立了。

一、在战火中成长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鲁西地区的抗日战争十分艰苦，日寇把进攻重点放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集中兵力在大扫荡中五里设一据点，三里建一碉堡，到处挖封锁沟，经常搞铁壁合围，长途袭击，再加上闹灾荒年，经济非常困难。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边区为了更好地打击消灭敌人，当时党政军机关都精简了一些年轻的同志，还有些无家可归的干部、烈士子弟和亲属，集中起来进行学习。泰西地委决定成立一所学校，也就是四中的前身，为了保密，代号叫“文和轩”，后改为泰西中学，泰西地委和运东地委合并后，这所中学又改名为泰运中学。

一九四四年秋中央号召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解放区不断扩大，需要大量的干部，冀鲁豫

边区行署决定，把各地随军中学、公学统一名称。泰运中学由边区政府统一定名为冀鲁豫边区抗日第四中学。

该校长期处在敌后，没有固定的校址，经常活动于相对稳定的抗日根据地。如山东西部的长清、齐河、禹城、茌平、平阴、东阿等县，敌情紧张时跟随后方机关或部队转移，这也反映了游击战争的特点。记得我们东阿县的十二位同学入校时，三个县大队护送，行军一个月，才找到学校。泰安、肥城县的同学入学就更困难了。

为了自卫，教职员工一般都配有枪支，年纪稍大的学生都发步枪，学生还每人配备两颗手榴弹，我当时就配有两颗手榴弹觉的满神气。我们学校经常处于敌人扫荡包围之中，学校曾几次遇险。一九四四年冬，有一次敌人扫荡时，我们同学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十三岁，连续行军，领导也拖得很累，走了一天一夜才到达了根据地中心，学生都盼着宿营休息，但是校领导经过认真分析越是根据地中心，越是敌人长途奔袭的目标，还是决定继续前进，果然在第二天拂晓，敌人就把我们想住而未住的村子包围了，齐禹县大队迎敌激战一整天，双方都有伤亡，我校幸免遇难。

当四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采取化整为零，寓学于农，钻青纱帐，实行小先生制的办法，神出鬼没，把敌人搞的毫无办法。我校随着形势的发展，由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由一个班发展到近十个班，每到一处出操上课，精神饱满，歌声嘹亮，大大活跃了根据地的战斗生活气息。根据地的人民对学校十分关怀，提供食宿和安全保证，对这所十二个县唯一的一所抗日中学寄予很大的期望

二、抗大式的抗中

在抗日战争中，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方向。

延安抗大学习的重点是革命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提高学员抗日救国的本领。校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了自给，还开荒地。

四中就是按照抗大的方针办学的，成为鲁西抗大式的学校，鲁西培养干部的重要阵地。

四中主要学习内容是：艾思奇同志所著的《社会科学概论》，主要端正学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联系抗日战争的实际，学习革命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

政治课是根据当时党的中心工作，讲授党的方针政策，参加减租减息，进行征收公粮，组织支前，参加土地改革和一些突击性的工作，边学习边实践。

近代史课主要讲授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特别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全面介绍日本在鲁西实行“三光”政策的血腥罪行，激发抗日的热情和斗志。

语文课主要选学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以及鲁迅的《阿Q正传》等文章。

数学和英语、日语为选修课。

学生来源：主要是党政军机关精简所谓小八路和干部、抗日军人子女和亲属以及鲁西地区十二个县保送的优秀儿童团干部和青年干部、地下党介绍的敌占区优秀青年。

学生待遇，在艰苦的岁月里，对学生实行供给制。规定每日小米一斤，油、盐各二钱，菜金每日鲁西票二分。平时吃的是小米饭加萝卜条，灾荒年间吃野菜吃柳芽，生活十分艰苦。学生三件宝，背包、书包、讲义夹。谁若有一支钢笔，大家抢着用，完全是军事共产主义。

生活完全军事化，出操、上课、紧急集合，站岗放哨、唱歌游戏都是八路军的一套。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虽然生活艰苦，但精神很愉快，真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三、良师益友

一个学校办得好与差校长是很关键的。我们的好校长——张海平（萍）同志，他是山东省长清县人，一九〇八年出生，任四中校长时是三十岁，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毕业后在山东省乐陵县做教学工作。“七七”事变后，回到家乡，寻找救国道路和革命队伍。他任过长青县和行署的教育科长，后遵照上级指示创办四中，任校长。张海平同志知识渊博，热爱祖国，不图高官厚禄，只想抗日救国。国民党曾请他做官，他看准了国民党消极抗日，卖国投降，所以决定投奔解放区。到鲁西根据地后，工作积极，不怕牺牲，吃苦耐劳，任校长后与学生同吃同住，对学生关怀备至，经常亲自教课。有一次深更半夜被敌人包围，校务人员几次催促他赶快转移，他首先想到的是老师和学生，组织大家全部转移后，他才离开了包围圈。

除学校任务之外，有时他还执行党的特殊任务。有一次

一架美国飞机与日机作战失利，美国飞行员被迫跳伞，恰巧落在抗日根据地内，被民兵捉住，送往专署，他痛哭流涕，不吃不睡，他自以为是落在敌人手里。由于语言不通，专署工作人员毫无办法。当时解放区懂英语的人很少，只好请我们的张校长去。张校长用英语向他讲明是落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根据地里，我们是毛泽东的队伍，是中国的抗日队伍，他高兴极了，主动介绍自己的情况，后来被顺利地送往延安。

其次，还有个我们学校的顶梁柱赵长文指导员。他是学校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主要负责党务和行政工作。赵长文同志的工作繁重，全校教职员学生的思想工作、行军宿营供应保障工作都要他来做，他既是政治委员，又是参谋长。有一次敌人扫荡学校，逼得没办法转移，冒险转到敌人碉堡下，赵指导员带的学校唯一的一个步枪班把碉堡围起来，勇敢地监视敌人一昼夜，保卫了学生的安全。学校每遇险境，他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更为艰苦，大家都称他是模范指导员。

教员梁志超老师和岳克寒老师，也是十分受大家敬仰的。梁老师原是清平县人，东北流亡学生，对日寇仇恨极深。他原来在专署教育科任职，以后根据需要抽到学校任教师，负责政治课、语文课、边区政策教育等。该同志任课较多，教学严谨，深入浅出，讲授毛主席著作和鲁迅先生的著作，很受学生欢迎。他一贯反对读死书，死读书，提倡联系实际，深入理解，学生收益甚大。岳老师讲授史地课，主要讲近代史，他通过近百年中国的革命史和各种封建反动势力的罪恶，激发学生抗日救国热情，讲得大家深受感动，斗争

热情很高。有一次他让学生读报纸“一坛血”的血泪史，读后学生纷纷要求到各部门工作，到敌后去与敌人决一死战，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报仇。

学校从校长到通讯员全体教职工总计就只有一个班，十余人，他们勤奋的工作，忘我的战斗事迹，直至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深深地铭印在我们的心头，使我们永远难以忘怀。

四、为边区培养了大批的干部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根据冀鲁豫边区党委和地委的要求，在解放区迅速扩大中，必须加速培养干部。学校党组织和领导及时扩大班级，从一九四二年建校开始18个人一年级一个班，到二年级两个班，三年级、四年级迅速扩大。一九四四年初具规模，一九四五年大发展。尤其是日本投降后，形势发展很快，急需干部。鲁西十二个县城相继解放，需要地方干部；军队随营学校迅速扩大，需要军队干部；支前任务重要，需要支前干部；边区建国学校成立需要输送学员，这些地方经常是指名要抗中的学生。

学校为了应付多方面的需要，决定哪里需要就往那里输送，每年四季都招生，甚至随到随收，没有学制。毕业后，学生有时成班、成年级的输送。仅日本投降前后，就毕业了二个年级五个班几百人，全部奔赴各条战线。这个学校实际成了鲁西地区干部重要来源之一。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九年期间，共输送干部1000余名，有的学生一出校就担任领

导职务。这些干部，在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中，在鲁西和泰西起了重要作用。在建国时期这些干部多数已成为领导骨干，分布在全国各地，主要地区是北京、山东、河南、贵州等地，有在军队的也有在地方的。多数均为地师级干部，少数有军级干部和县团级干部。有的已是工程师、讲师、高等学校教师，也有的在外国，总之，都起了重要作用。

以北京为例：四中学生在北京工作的五十名左右。从中央机关到国务院各部，以及军队高机领导机关均有，现在大多数是地师级干部，他们都在为革命而辛勤工作，这也是学校的光荣。

这个学校现在看来，虽然是普普通通的一所学校，从人力物力投资同现在一所中学比起来差的很远，但是现在看起来，它的地位和作用在战争年代，确实起到了重要的战略作用。

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

忆 张 海 平 校 长

杨 志 高

我第一次见到张海平校长，是在一九四四年夏天。我们东阿县的十二名学生，在东阿、平阿、长清三个县大队的护送下，经过一个月的急行军，在山东省长清县大吴庄找到学校。

张校长听说我们到校，立刻同赵长文指导员和几位老师去看我们。接到通讯员通知，几个学生觉得非常紧张，不知如何是好。当校长来到我们院子时，满脸笑容，平易近人，问同学们辛苦了，并代表全校师生欢迎我们来校学习。接着问长问短，简要的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叫我们好好休息几天。告诉我们怎样生活，并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互助等。一下子把我们吸住了，也不觉得紧张了。

当时我们校长是三十四岁，身高一米七左右，肩膀宽宽的，穿着一身兰布裤褂，一双山东圆口布鞋说话非常风趣。

开学以后就听学生传奇般的说：“张校长是北京大学毕业生，数理化很棒，会说几国话，英文学的顶呱呱，在我边区是数一数二的大知识分子”。有的说张校长是个地下党员；有的说他是个爱国人士，国民党让他去做大官他都不去，冲破敌人的种种封锁投奔解放区的。

总之，学生对校长非常钦佩和崇敬，再加上学校有几根顶梁柱，赵长文指导员、梁老师、岳老师等，学习条件尽管非常艰苦，但是大家很安心学习，觉的这个学校，什么都是很新鲜的，在抗日战争年代里，能在抗中学习是很值得骄傲的。

我在学校的时间很短,张校长却有几件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海平同志亲自讲课,当时他风华正茂,会写会画,学校教员很缺,凡是没教员讲的课,他都讲。他知识渊博,讲的逻辑性、条理性很强,所以,学生都爱听他讲课,讲后效果也非常好。他讲自然科学,也讲社会科学。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提倡读书要问几个为什么,他反对读死书,死读书。海平同志是个革命乐观主义者。学校当时的条件很艰苦,日本人经常扫荡,几百名学生的安全是一大难题,再加上少吃缺穿,真使人发愁,但是张校长很乐观,他会讲笑话,很会寓教于谐,只要他到哪里,哪里就会朝气蓬勃,非常活跃。他经常根据形势,抽空编些小剧,让同学排演,自己也参加演出,给部队演,给群众演,教育人民对敌恨,对己爱。有时还和同学一起打球、游戏。海平同志是学生的良师益友,与学生同吃同住,对学生关怀备至,象慈母一样爱护学生,他对学生“俯首甘为孺子牛”。有一次学校被敌人突然袭击,深更半夜,校务人员几次催他赶快转移,他首先想到的是全校师生,他带着唯一的一个通讯员逐个检查,当工作人员和他的女儿听到枪声响硬拉他撤退时,他着急地说:

“我是校长,师生的安全是我的职责,我怎能离开学生自己走呢?”直到全校都安全转移后,他才冲出敌人的包围。张校长有很多特长,抗战期间,他除负责学校方面的任务之外,还担负专署的统战工作和人民代表的工作等社会活动。如有一次一架美国飞机与日机作战失利,一个美国飞行员被迫跳伞,正好落在抗日根据地内,被民兵捉住,送到专署后痛哭流涕,不吃不睡。开始他认为落到敌人手里,语言不通,专署

工作人员也无办法,当时解放区会英语的很少,只好请我们校长去,张校长去了之后,用英语会话,向他讲明是落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根据地内,我们是毛泽东的队伍,是抗日的队伍,他高兴极了,主动介绍他自己的情况。经过一番工作之后,基本正常了,根据上级指示逐级送往延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我和一批同学参加专署战勤工作队(打庄平),当动员出发时他讲:“抗中抗中,人才集中;中央号召,反攻反攻;刀山火海,立即出动!”他讲时声音宏亮,情绪激动,看出他在大反攻中的那种高兴劲。我们一群青年学生经过他动员之后,就立即打起背包,奔赴前线了。谁会想到我们这刚出茅庐的学生,这一别竟是与校长一生的永别,是与我们尊敬的校长的最后一面。

一九八三年春,我们偶尔在北京聚会的几位男女同学,兴致勃勃地去找他在北京的女儿张培华同志,打听老校长的消息时,惊悉老校长已于七五年去世,终年仅六十五岁,在他女儿的家中竟无意中开了一次追悼会,大家不约而同的泪流满面,痛哭了一场。沉默了好久好久还是培华同志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别难过了,还是我的不是。同志们高高兴兴地来到我家,我不该告诉大家这个不幸的消息,请同志们好好谈谈吧。”接着大家就谈起张校长四五年以后的情况。

日本投降以后,学生大批的出校也大批的进校,高年级的同学相继毕业,学生越来越多,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大,学校的稳定性越来越好。聊城解放以后,专署进驻聊城,学校

也随之开进去，由四中改为聊城一中。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诞生了，海平同志光荣入党。这更焕发了他革命的青春，多年宿愿实现了。从此他把对党的忠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热情都倾注到教育工作中去。他的外语水平比较高，其他课程样样都行，真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一九五六年，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上分配他到曲阜师范学院任教务长，离开了他亲自多年创建的四中，在曲阜的几年又对教育工作做出了应有贡献。全家老少也就定居曲阜。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海平同志遵照我党长期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的小组会上，提出了大跃进中的不足之处，说了几句真话。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了党籍，降职降薪，由十三级降为十五级，由大学教授、教务长降到炊事员，剥夺了他领导教学工作的权利，使他的才能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

根据党中央的通知精神，一九六二年为张海平同志平了反，撤消了处分，但是，身心受到了摧残，一病就十三年，最后病魔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

不但老校长受到了“左”的错误的危害，冤案多年，而他的亲属也受到了株连。大儿子从山东体育学院开除回家务农。二儿子在农村原是模范教师，也被开除公职。这两个儿子至今仍在农村未得到安排。大女儿由于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诉父亲要相信组织，相信党，有错就改等安慰的话，却被认为有阶级立场问题，敌我不分，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撤消了她管人事档案工作的职务。二女儿在泰安农学院

上学任团支委，也被撤了职。从此，张校长由一个爱说爱笑的人变成一个少言寡语的人了。

我们的张校长一家在“左”的错误影响下，与全国大批的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所遗憾的是，海平同志他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重大贡献，也未能幸免。最可惜的是，这样一位教育战线上不可多得的人才，党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被折磨得病倒十三年。

回忆起来，他几十年如一日，把全部精力贡献给党，贡献给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合格的人才，一直到他最困难的时候，他还怕他的学生们因他而受到牵连，不与任何学生通信和接触，象战争时期一样，用自己的身体掩护学生不受到伤害，这是多么高尚的品德啊！

其实他在受打击的时候，我就在他身边鲁南，当他来京两次，我们更多的同学也在他身边，不是指挥员就是地方高级干部，我们要知道，可以为他说明情况。七五年还可以为他伸冤，起码可以安慰他，生活上照顾他，他若看到桃李满天下的教育成果，也会在精神上得到安慰。

尊敬的海平同志，敬爱的老校长，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纠正了“左”的错误，实现了你在世的心愿，望你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我们学校在校庆四十周年，也在总结你的宝贵经验和卓著事迹。你不愧为一位多才多艺的教育工作者，你的外语水平高，你还会编剧、演戏、绘画，你过早地失去了工作能力，离开了人间，这无疑是山东教育界的一大损失。但是，你的成绩在我们眼前，你的面容在我们的心底，你的言语在

我们的耳边，这一切，永远会留在我们千百学生中间。

张海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我仅在校庆四十周年之际，回忆他战斗生涯的一个片断，以表对他的敬仰和怀念。

一九八二年

抗日卫东中学的战斗生活回忆

林远 胡雷

卫东中学是一九四二年二月创办的，它的诞生地与活动中心在卫河以东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这是一所三年制中学，以学习文化为主，以培养干部为目的。它无教室也无固定校址，行动军事化、战斗化，学习与战斗、工作、生产相结合，在游击中教学，在实践中学习。学生分别来自社会，失学青年、抗高毕业生、军、工、烈属的子女，还有从部队、地方工作岗位上保送的“小鬼”。学生实行制供给，毕业由组织上统一分配。实质上是一所抗大式的基层干部学校，是一支有简单自卫武装的“抗日学生军”，也是一支抗日宣传队、工作队。建校开始，只招了一个年级，第二年又招了一个年级，两个年级分别于一九四四年的夏季和一九四五年的春季毕业，日寇投降前，又招了两个年级学生。这批学生毕业以后先后输送到党、政、军、教育、群团各条战线，支援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祖国的解放。几十年来这些学生，遍布全国，早已成为一批坚强的中层领导骨干。1982年11月间，原校长卫东中学创办人林远同志从上海华东师大赶来，还有在邯郸的原第一任支部书记张炬分别邀见了现在济南、聊城和邯郸工作的一级学生郭文江、梁学礼、郭凤梅、马介一、郭碧川、宋贺彩、王新盟、王林普、胡雷，畅叙以往的战斗经历。有许多惊心动魄，值得纪念之事，把它笔录出来，以资借鉴。

在敌后坚持办学校

创办这所学校的时候，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鲁西北抗日中心区被敌人蚕食围攻紧缩到莘、朝、冠三县结合部和大名、莘县交界的一些村庄，横直超不过三、五十华里。冀南、冀鲁豫区的一些后勤机关和冀南一地委一专署以及报社、银行、医院、兵工厂，多在这里隐蔽活动，目标比较大。日寇从一九四一年冬，就象发了疯似地联合四面之敌，紧密配合，对这一带实行铁壁合围，轮番奔袭，分割包剿，蚕食强化，妄图一举把它吃掉。这一年又遭遇空前严重的旱灾，民不了聊生，敌人趁火打劫，四处抢粮。我党政军民既要连续而紧张地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反抢粮的战斗，又要领导群众抗旱救灾，向天灾和饥饿作斗争。卫东中学就是在这样异常严峻的形势下诞生的。校长林远、教导主任李奎元、党支部书记兼班主任张炬是创办人，还有第一批教师黑若仙、崔景清、李黎（康国俊）、事务员陈君三，这些同志在冀鲁豫三地委、专署直接领导下，一开始筹建就处于紧张的游击活动中。在招生前后那一段时间里，转移过十几个地方，有时一天搬两次家，有时被迫迂回到敌人据点附近坚持工作。报考的学生，接连串几个村子甚至两三天找不上校部所在地是是常有的事，简直是在敌人眼皮底下开考场办学校。办校的工具，只有两头小毛驴、一架油印机，开始还有块黑板，后来也丢失了。拿门板当黑板，石灰块当粉笔，熬麻子拌锅底灰当油墨，烧木炭描画教美术课，弄一节高粱杆插上个竹

签当笔头，把颜色化成色水当笔水，破本子、旧书翻过来写作业，找块砖头当座位，两个膝盖当桌子，村里村外、田间路林，到处是课堂，走到那里学到那里。没有课本自己编，没有油印员就选拔几个学生边学习边刻印。粮食不够吃了挖野菜充饥，被敌人冲散了集合起来再学，硬是在二年半的时间里基本上学完了初中的全部课程。

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党办教育的决心这么大，是鉴于革命形势的需要和广大爱国青少年的愿望，高瞻远瞩，在建设根据地的同时，恢复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冀鲁豫三地委（后划入冀南，改为冀南一地委）、专署的领导同志在委派林远、李奎元、张炬等创办这个学校时，谈到四个需要：一是为准备干部，迎接抗日形势的发展，也为长期革命需要的接班人着想；二是为抗高毕业生升学创条件。当时莘、冠、朝等几县抗高学生都经过一、二年游击生活锻炼，毕业后应该继续培养；三是党政军机关一部分“小鬼”正处在学习的黄金时代，要求提高文化知识；四是社会上有志的青少年，因战争失学，迫切希望有个学习机会，为打日本求解放增长才干。当时冀鲁豫区党委和冀鲁豫行署鉴于冀鲁豫根据地已经办起了筑先抗战学院、财经学院、抗大二分校，只有卫东一带还是空白，因此很快批准了创办鲁西北卫东中学，把筑先学院教务长林远调来做校长。果然，卫东中学这块牌子一打出去，象一声春雷，迅速响彻鲁西北大地，对根据地和游击区的群众，尤其对求知若渴的爱国青少年，鼓舞很大。他们从这里进一步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和未来的希望，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和英雄气概，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

胜利的信念。有些学生冒着生命危险只身找来报考；有的群众穿过碉堡和封锁线送子上学。结果，一个班考取了七、八十名，年龄最大的二十岁左右，多数是十六、七岁的少年男女。林远校长和几位经过游击战争考验的老干部在一起创办这所中学，尽管遇上这么恶劣的条件，还要率领这支“学生军”反扫荡、保安全、保学习，担负着极大的风险，可他们好象胸有成竹，沉着自信。林远同志经常咯咯地谈笑风生，常说：“咱们来个白手起家，一本万利。开创个教育工作新记录，为我国胜利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积累一点新鲜经验。”

卫东中学的创建和发展，促进了鲁西北根据地的基础教育，同时也和青少年抗日救亡运动，自然地结合起来。党对发展教育向来是抓得很紧的，一建人民政权就村村开办抗日小学，县县建立抗日游击高小。有了这所中学，还有农民中学的青年男女识字班、夜校扫盲班、民兵班、儿童团、姊妹团、青抗先，卫东中学和他们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既学文化又学政治，既搞生产又打游击。一时，这一带根据地的宣传教育活动和文娱活动，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一同敌人斗 二同天灾斗

卫东中学最困难的时期是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同敌伪斗争，还要同灾荒斗争，在反扫荡中坚持教学，生活又无保证。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使每个师生经受着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这里仅举几例：

一是学生共产党员张耀奎同志在反扫荡中壮烈牺牲。这

是一九四二年春季发生的事。一天，学校正在朝北武家河，突然接到地委通知，说敌人合击我中心区，要火速转移。我校当即编成三个小队，由干部教师带领向三个方向疏散。教师崔景清、李黎带着一个小队向北迂回，目的是到冠、莘游击区暂避风头。这天夜里，阴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摸索着前进，走到朝北榆家附近突然和敌人遭遇。十八岁的共产党员张耀奎和另一个学生王增录走在前面探路，冷不防碰上正在“拉网”的敌人，被捆绑在战车上。王被绑在车后边，偷偷把绳子弄开，可巧前头遇上游击队鸣枪，趁敌兵一惊的瞬间，跳车逃脱。敌人乱放了一排子枪，把耀奎同志紧紧地捆牢带到冠县城里，交给伪军司令部。他背包里有一个手榴弹和几张油印的讲义，汉奸们一发现就妄图从他嘴里逼出我鲁西北军政活动情况和学校的干部党员名单，捞个大鱼，在皇军面前领奖。伪军司令部里对张利诱、毒打、软硬兼施，轮番审讯。耀奎同志面对奸诈凶残的敌人，坚贞不屈，以压倒对方的革命英雄气概，把敌人审判厅变成我们的演讲台，大讲抗战必胜，严斥日寇侵略罪行，揭露汉奸丑恶嘴脸，并以民族大义劝说伪军爱国抗日。汉奸们无计可施，把他交给日寇去处死。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先以狼狗撕裂其身，把他咬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然后弄到打靶场上当活靶子轮番点射。耀奎同志至死骂不绝口，连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直至闭上眼睛。吓的敌人目瞪口呆，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威风，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节和共生党员的高贵品质。这件事发生在建校不久，对学校里震动特别大，有几个意志脆弱的学生

给吓回家里去了，有的被家长叫走了。可多数同志通过隆重的追悼会和深刻的总结，反而记取了教训，受到了教育，增强了坚持学习的信心和勇气。

再是于家庄突围和开展地道斗争。一九四二年六、七月间，学校正在朝北于家庄，一面教学，一面帮助群众搞“合理负担”，一天的晚上，远远传来零星的枪声，校部里机警地把大家叫起来准备着，却又一点信息也没有了，一直等到下半夜没动静。这时一无接到上级情报，二估量着又是小股敌人在中心区的边沿上骚扰，眼看天到三更，料无大事，就把四路岗哨安排好，让大伙休息去了。谁知刚一入睡，敌人趁着天亮前的一阵黑暗，从村西寨壕外边摸上来，学生马昂（马相臣）和十五岁的孙涛正在这里警戒着，突然听到几米外的地方有响动的声音，再一看一片人影正在疏散着向我们这里移动，机智而幼稚的小孙涛脱口大喊一声：“口令！”顺手摔出一个手榴弹，马昂紧接着扣动板机，开枪射击。敌人弄不清虚实，更不知道只是两个毛孩子，仅有一个手榴弹，一只步枪几粒子弹，吓得缩回到十几米的地方。刹时，哒哒的机枪声象一阵巨风似的扫射过来。马昂紧靠寨墙根作掩体，坚持到敌人上来寨壕，孙涛跑步回校报告。刚刚和衣入睡的师生们，早被惊醒了，爬起来，听着枪声在西边，就冒着枪林弹雨向东面突围。出村就有青纱帐和交通沟作掩护，待敌人包剿过来的时候，就看不见一个人影了。马昂、孙涛没跑出去，被群众掩护起来。敌人扑了空，一无所获，放了几把火，抢了些东西，就缩回到乌龟壳里去了。敌人头脚走，我们二脚回来，先做房东的工作，向掩护我们

群众登门致谢，然后总结经验。林远校长在会上表彰马昂、孙涛机智沉着，临危不惧，恪尽职责。为学校安全脱险立了大功。这一天，还补上了早晨和上午耽误的课程。

情况越来越紧张，有时一连几天不停脚地跑敌情，无法坚持正常学习。一九四三年春，有一次敌人从四面向我中心区合围，学校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有个小队从中心区跑到游击区，发现敌情连夜跑回中心区，第二天黎明刚想在武城集中心点落脚，枪声四起，四面受敌，被冲得四散奔走，两天两夜饿着肚皮在敌人扫荡的旋涡里来回奔跑，三天后才集合到一块上课。这一次，校长林远从武城集包围圈里跑到王庄，又被敌人围上，多亏那里有个地道，敌人从地上搜索，地下听得清清楚楚，未被发现。不久在又一次反扫荡中，刚招来的二级学生马希曾又被捕了，经多方营救，才从虎口脱险。师生们有了于家庄被包围的教训，又有了校长钻地道的经验，加上这一次的危险，便下定决心建设自己可靠的地道，以地道为靠山坚持教学，防备敌人突然包剿。我们一级的学生在莘、朝、元（当时大名卫河以东部分为元城县）边界一带方圆二、三十华里的地方，分为四个组实行分组教学。校部设在朝北武城集，其他有的在王、贵、刘庄，有的在武家河，有的在元城县的司家庄。每组在住地挖一个地道，大约有二米深度，能行人，有通风道，有进口、出口，有的设在锅底里，有的设在院里或村边闲园里。地道都是学生利用学习空隙挖的，象老鼠打地洞一样把土扒上来，再运到远处，伪装好。尤其开始的时候，伸不开身，双膝跪在阴湿的洞里倒退着往外扒土。出入口怕外人发现，摸着黑整宿

半夜的干。确实艰苦吃力，可是同学们越挖越有劲，裤子磨烂了，手磨破了，肩膀压肿了，不叫苦，不说累，病号“轻伤不下火线”，女同学体弱不示弱争先恐后，你追我赶，比劳动、比学习、比贡献。

三是同灾荒作斗争。一九四二年鲁西北一带旱灾异常严重，农民担水种的谷子，刚一抽穗又被蝗虫吃掉。日寇、汉奸的三光政策，加重了灾情严重程度，到一九四三年春出现特大粮荒，人畜大批饿死，路有饿殍，野有遗骨，还发生活人吃死人的惨事。这时师生们每天的口粮标准压缩到十二两小米，还要节余二两支援前线。剩下十两，一天两顿稀粥，喝快了喝上一碗半，喝慢的喝上一碗就没有了。一碗稀粥一块老咸菜，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有一次，郭风梅、沈向哲等几位女同学，饿的睡不着，摸到房东伙房里，拿了半块糠团子一人吃上两口才入睡。菜金也是寥寥无几，有时一块咸菜也无保证，就往饭里放上点盐喝咸的。油就更少了，整月滴油不见是常事。当时，粮贵，牛肉、鸡蛋、花生米贱，后来有计划地用粮食换上一顿，就算改善了生活。粮食供应，上级拨给一个地点、一个斤数、一个品种，有时拨到游击区的村庄里，靠我们自己催运，催上什么吃什么，那样苦的年头，定下的品种很难照样兑现。有一段光吃绿豆，有些学生得了夜盲眼。有时赶上敌情催不上来，数日不得一粒粮，就挖野菜，采树叶，买棉籽、糠麸、花生皮、玉米轴、红萝卜头之类代食品充饥。有时煮上一碗高粱皮子就算一顿饭，有时一顿只吃上一块花生饼，一把花生米。有的大肠干的便不下来。尽管这样，还要反扫荡坚持学习，的确够难的。少数

受不了的辍学回家去了，留下来的更坚强了。我们催运粮食的工具是独轮手推车（大把车），谁也没有推过，东倒西歪的，掌不住把。尤其在沙窝路上简直走不动。肚里没东西光咕噜。即便使出平生力气，汗水湿透了衣裳，也出不来牛劲。有一次，胡雷饿的别说拉车子，走也走不动了，比他大几岁的学生解金刚停下车子，给他摘了把榆叶吃，大家接着议论起来说：“红军吃草籽爬雪山，我们吃榆叶过沙窝，强的多咧！”顿时精神抖擞，忘记了饥饿和疲劳。有的同学不会推车子，面有难色，学生会主席郭文江风趣地说：“推小车不用学，只要腚蛋活”。逗得一个运粮“小车队”的人又笑又跳。

为了胜利渡荒，保证学习，校领导发动全体师生献策献计。发动家在本地的学生，回家背粮食，有的家中无粮，找亲友帮助也济点事，但不能根本好转。后来采取教学与生产相结合的办法，到汉奸齐子修部在冠县野场一带制造的无人区（齐部逃走三天，我们就去了），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先后在野场、潘庄开荒一百多亩，生产粮食二万多斤。一九四四年情况缓和了，又在朝北的富余集和元城县的北峰种菜、养猪、养羊，自产自用，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

一九四三年夏季，小麦几乎绝产，青黄不接，形势紧张。冀鲁豫三地委决定把我们送到冀鲁豫区的中心地带（濮、范、观），那里夏季丰收，也比较安全，一可吃饱肚子，二可正常教学。一天太阳刚要落地，我们一级一班四十多名师生，从莘县的梁平营出发了，前后都有军队保护，穿过若干碉堡群和封锁线迂回前进，一夜马不停蹄行军一百一

十多华里，黎明前到达安全区。这次夜行军对我们是一次新的考验，每人背着一个衣被卷、一个书包，“路远没轻重”，有时跑步前进，有时又原路退回另选他路，有时正走的时候突然命令蹲下不准有声音，有时爬深沟，有时眼望炮楼上的灯光，屏气轻步从敌人据点脚下穿过，年龄小一些的学生和女同学特别显得累，脚底板打泡了，腿累疼了，谁也拉不下一步，年龄大的同学从他们身上夺行装，谁也不松手。到了目的地天刚蒙蒙亮，怕惊动群众的“黎明觉”，大家和衣躺在村头的场园上，枕着衣被卷，一觉睡到太阳挂在树梢上。冀鲁豫区党委派人为我们准备了食宿，四个一斤的白馒头管吃饱，大伙真象饿虎扑食，三口两口就是一个，连老咸菜也顾不上要了。胡雷、宋贺采、李新知这一帮十五、六岁的孩子，早饭吃七、八个，晚饭又吃七、八个。有些当地的儿童团员围上来看，说：“这伙人真是饥民。”实际上就是来要饭吃的。

我们住在黄河北岸范县孟楼、姬庄小学里（正在放假），两张单桌对在一处，正好睡下一个人，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两个多月的形势变化很大，鲁西北秋季丰收了，学校留下生产的人员也收果实了，我们一路穿过的碉堡群、封锁线宿小了。接到地委通知，就在大白天欢唱着回到武城集老根据地，开始了新的教学活动。

出生入死，巧教活学

在游击战争中办教育，头一条就是千方百计适应游击环境，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坚持正常的教学活动。因此，一

开学就搞生活军事化、战斗化，说是一个学校，实际上象是一支“战斗小分队”。上级党派李义同志任我们的军事教员，除了上军事课，还经常讲解游击战的常识，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搞反扫荡演习。学生按年龄大小混合编组，把女同学搭配开，每组有个学习组长。还有个军事生活组长，配上一支步枪、二三颗手榴弹作为自卫武器，天天晚上传“口令”，轮流站岗放哨，校长、教师和学生干部执勤带班、查岗。师生一律轻装，每人只有一条薄被，随身衣服，一个背包。住宿地点经常转移，白天一个地方，夜深人静再搬个地方，“声东击西”东西南北，纵横迂回，一年四季和衣而眠。情况紧张的时候，一个班或者一个组隐蔽在一处，上盖天，下铺地，头枕被卷，手扶书包，象一群鸿雁集体入睡。在一般情况下，睡觉前第一件事是藏好书包，清理干净手上的铅笔、墨水痕迹和口袋里的纸片片，以防遇上鬼子突袭。男同学还常用砖磨手造茧子（敌人见男青年手上没茧子就怀疑是八路军）。女同学备有假发、发网、农妇粗布破衣等一套化装品，紧急时化装。一九四三年四月间，有一天，苏坡、吕纪柯两个同学在朝北王庄被敌人包围，年仅十六岁的小姑娘苏坡梳上发卷，穿上个破褂子，脸上擦几道黑灰，扮农妇模样，吕纪柯牵了一头老黄牛，一前一后充作一家人，随着逃难的老百姓，从敌人的眼前闯了出去。事后，有几个俏皮学生谈起此事就打趣哄笑，笑得苏坡脸上泛起一阵阵红云。

这样紧张的战斗生活，慢慢地练出了胆量，增长了临危不惧，沉着应战的本领，跑一阵子，听不到敌人动静，见不

到敌人的影子，就能很快安下心来继续学习。战壕里、地道里、老坟场、破庙院、青纱帐、芦苇坡、沙河树林、灌木丛中、生产场地、行军路上、运粮车旁，都当过我们的学习“课堂”。有一次，两个同学奉命到接近敌占区的阎村催粮，开始没找着一个村干部，说是有敌情准备去了。这两个同学躲到村南芦苇坡里，一面静观虚实，一面拿出书本温习作业，等到天黑不见动静，就进入村里完成了催粮任务。生产、运粮、挖洞休息时间也是学习时间，学习成了一种享受。教师们行军时教唱歌代替音乐课；夜间摸黑无法讲课文，就讲古今中外民族英雄故事、历史知识、军事知识、政治形势，讲红军长征史、讲祖国伟大可爱；白天在青纱帐隐蔽处也讲课文，辅导作业、备功课。尽管这样，还是难以保证学习任务。后来，从斗争实践中逐步摸索到一些适应游击教学的规律，在形势比较缓和时（一般是青纱帐起来的时候）集中活动；环境不好的时候，明聚夜散；情况紧急了就分组教学；敌人加紧扫荡的非常时期，就远距离分散隐蔽，迂回周旋，采用小先生制传授教学，小先生就是从学生中选拔几位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教师把课文教会他们，他们再到各组隐蔽的地方传授。当时担任过小先生的学生有魏兰亭、许天德、赵畅、孙涛、常鹏飞、马介一、曲辰、胡雷、吕纪柯。这样根据情况变化，机动灵活地交替使用几种方法，基本上保证了正常的教学活动。

游击教学的另一个特点，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既要保证普通中学的教学内容，又要结合当时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和客观条件，从实践、实用出发进行教学，培养民族民主

革命的后备人材。各科教材都是教师自选自编，都和战斗生活、实际工作相结合。数学课增加编排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累进税率的计算方法；化学课结合制造油墨、粉笔；生理卫生课结合讲战地救护和包扎伤口；地理课配合形势讲国际上反法西斯的游击战争，开辟第二战场等形势图，讲国内的延安圣地、解放区、游击区、蒋管区、敌占区，祖国大好河山；政治课讲抗战必胜，坚定胜利信心，讲新民主主义，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以解决学生的人生观问题、信仰问题。更突出的是经常进行民族气节和热爱祖国的教育。常用的教育方法是结合民族英雄、革命先烈的事迹进行“三杆、三上”教育。

“三杆”是拿起笔杆能写文，拿起锄杆能生产，拿起枪杆能打仗；“三上”是，上战场英勇拼刺，上法庭坚贞不屈，上刑场视死如归。当时学校里对我抗战死难烈士，特别是我校同学张耀奎之死，都及时组织庄严隆重的追悼会，对个别变节者也及时组织批判会，运用正反典型进行民族气节教育。历史课也配合战争形势，讲“论持久战”和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孙子兵法十三篇，讲近代革命史，特别是“五四”运动和民族英雄人物。结合实际最丰富的是语文课，除了选学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论著和鲁迅、邹韬奋、郭沫若、茅盾等当代进步作家的文章，还有报纸、新华社发表的群运经验、重要社论、文章、新闻，还有史记、古文、唐诗、宋词，还有苏联作家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日记和作文更强调联系实际，跑一次敌情未遇上敌人，就写“虚惊”，突围以后写“突围记”、“反扫荡记实”，

参加工作队，回来交工作实习日记和几篇论文。放假回趟家，也要出调查题目，交调查报告。还和报社联系写新闻报道。教学方法上，常常就地采取实物标本，讲得生动逼真。讲生理卫生课时，以猪羊实物为标本，在青纱帐里讲玉米、高粱等植物的根茎花叶。一次林远校长在树林里联系现实环境讲唐诗，引用杜甫诗句“独坐竹林里”，使学生顿时忘却敌后环境的残酷和自身的安危，对我国古典文学的欣赏引起浓厚的兴趣。李黎老师在一次分组教学中，在高粱地里讲生理卫生，以自身作标本，讲得生动形象，引人入胜。

教材自编，还得自刻自印，又没有油印员，怎么办？开始教师刻印，不久从学生中选拔魏兰亭、苏坡、胡雷，算是一个油印组，又送胡雷到鲁西北抗联分会学习了些时，回来由他负责油印组并保管油印机具、纸张、材料。他们几个白天学习，夜间加班刻印，保证不误讲用，保证机具不丢失。往往刻印到下半夜，别说加班费了，连口水也摸不着，还得收藏好机具保安全。可是，我们却引以为荣。完成任务之后，肚里咕噜噜的直叫，心里却乐滋滋的。

书本上学与参加社会斗争实践相结合，这又是卫东中学的一个特点。一九四三年春夏之交，一级学生组成一支工作队由校长教师带领，参加朝北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查黑地运动和借粮斗争。一九四四年八月又到冠北领导群众打蝗虫。这一年，二级学生也参加冠北工作队，进行开辟新区的工作。学生们在工作队里，既有单独的学习编组，又和有实践经验的县、区干部在一起当“徒弟”，深入到广大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中间，既工作又学习，真是练文习武，三个月不长的时间，学

到的东西很深刻丰富。完成任务，集中上课的时候，校部组织师生们总结收获谈体会。大家都感到，一是参加借粮斗争，帮助群众渡荒，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学校和群众建立了血肉关系，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二是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现实阶级斗争教育，增强了无产阶级感情和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观念，坚定了和群众同甘共苦的思想。当时为群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成了全体师生的誓言；三是学到了一些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实际工作经验和生产斗争知识。这些都是书本上根本学不到的东西，它为学生毕业后，很快能担负起领导骨干的责任，练了基本功。

学校里分组教学或者明聚夜散的时候，在朝北一带和农民扫盲运动、青抗先运动、武装民兵工作，结合得也很紧密，得到他们的支持，也为他们传授文化知识，宣传抗日道理和战斗形势。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光卫东中学的附属高小，以朝北王庄为中心，在附近十多个村庄，村村办起了男女青年识字班、扫盲班，其中有姊妹团员、武装民兵和青抗先队员，搞得轰轰烈烈，活跃了那一带青少年运动和农民运动，也锻炼了我们这帮“学生军”。

沙里淘出的真金

我们一级一班处于那样艰难恶劣的环境，可是一开始就明确是全日制的三年中学，培养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军队”。课程和普通中学一样有语文、数学、常识、物理、化学、史地、外语、政治、军事、音乐、美术。后来因形势需

要把外语、音乐、美术正课取消了。各科内容虽然基本上是自选自编，并不低于普通中学的教育质量。语文课有白话文、古文、唐诗、宋词，强调背诵。数学有整数、分数四则、几何代数。历史有近代史、古代史、外国史，通读了通史简编。一九四三年秋从冀鲁豫回来，根据形势发展和领导的要求，就开始有计划地突击教学，同学们为了迎接抗战的胜利，学习更加起劲，除了结合实践和战争学了一些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以外，二年半基本上学完了中学三年的课程，提前于一九四四年七月毕业分配。这一班学生从开学到毕业变动很大。开学时将近八十人，中间有的提前工作去了，有的随父母工作调动跟走了，有的在反扫荡中牺牲了，有的经不起恶劣环境的考验辍学回家了，还有个别变节到敌占区去了，参加毕业典礼的只剩下三十四人。林远校长欢送这批学生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十分激动地鼓励大家而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经过千锤百炼，沙里淘出来的真金，真金不怕烈火，到工作岗位上，一定要表现出真金的硬劲来啊！”

新的考验开始了。服从分配是第一关。当时地委、专署要求除少数文化程度差的和个别因工作需要外，都要从事教育工作，可是同学们多数不愿干这一行。结果，不讲价钱，愉快服从。除了几个同学到县、区党、群机关或者到部队工作，其余都奔赴教育战线。七月分配，八月又到冠县北部发动群众打蝗虫，九月参加鲁西北师资训练班、担任班、组长，主持师资训练班的仍是林远校长。这个时候，毕业的三十四个同学，大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前，已是党、政、群、文方面的比较出色的区级领导骨

干。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增加了新的血液，建国前后大都成为县级领导骨干，五十年代，已经有的担负起地、师级的重任。

几十年来，这班同学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经受着各种不同的实践检验，没有辜负校长寄予的期望。同学康心保，刚到莘县一个区的抗联工作，就在一次反扫荡中被日伪军困在屋里，敌人狂叫着要拿活的，“放下武器，投降不杀”，这位十七岁的小伙子，沉着勇敢，开枪反击，弹尽之后又和敌人赤手搏斗，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壮烈牺牲。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大举进犯解放区，教师崔景清、同学马光普、郭碧川等率先报名参军，转战南北，英勇杀敌。一九四九年党抽调一批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区，教师王耀华，同学赵畅、孙涛、吕纪柯、苏坡、张腾华、崔景运、沈向哲等挺进敌后。全国解放后，转入和平建设，我们师生分散在全国各地，在各条战线上付出了劳动和智慧。五十年代，原第一级学生班长郭文江，响应支边号召，参加建设新西藏，到中印、中尼交界的中巴县任县委书记，达十五年之久。调回内地后，又带病挑起山东高唐县委书记的重担。还有同学结合本职工作，勤奋自学，努力攻取科学文化，很快达到了高中或者大学的文化程度。在五十年代，有的就成了新华社的模范记者和新华社的编委委员。

一九四五年春季毕业的二级学生，踏上工作岗位以后，也成长为县、区级领导骨干。一九四四年卫中附小的学生，也早就活跃在全国各地，成为一批坚强的中、基层骨干力量，有的是著名的科技工作者、医务工作者、专家、学者。

二级毕业分配后，日寇投降前，学校又招了三、四两个年级，附属高小也同时招了两个年级。“八·一五”日寇投降，一九四五年九月解放鲁西重镇临清，地委、专署、军分区进驻临清。同年十一月卫东中学奉命搬到临清旧城天主教堂旧址，把附小留给元朝县改为该县的第四抗高。当时校长林远已是冀南第一专署教育科长，付校长王宗约调到柳林筹办武训师范去了。卫中校长由唐香涛接任，把附小的工作交给胡雷主办。卫中搬到临清以后，在林远主持下，把临清日伪时期的一处中学接收过来，合并为一处中学，改名为冀南一中，建国后改为临清一中。现在临清一中的前身就是卫东中学。建国三十多年来，临清一中一直是地区和省的重点中学，每年都为国家输送一批人材。

力量的源泉在那里

卫东中学能够在战争年代生存，在游击环境中坚持教学，且能逐渐发展壮大，为建设根据地和民主革命输送了一批干部，关键的因素一是党，二是军队，三是群众。

卫东中学始终是在党的领导哺育之下。开始创建的时候，地委书记许梦侠和专员周持衡亲自帮助选调干部配班子，亲自交代办学目的和方法。他们反复强调在建设根据地的同时努力开办学校，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为迎接抗战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准备一支有文化的军队。配备的干部教师质量都很高，教导主任、党支部书记都是三七、三八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县以上党员干部，都有了几年的游击战经验，具有

大中专文化水平。校长林远是战前燕京大学的学生，曾于1940年参加创办筑先抗战学院，任该院教务长，有在游击环境创办学校的经验。一九四三年调去的副校长王宗约和一九四五年接替林远校长的唐香涛，都是后师毕业生，三八式老干部。第一批教师中的黑若仙、崔景清、李黎、苏景轼，后来有由我地下党组织从敌占区陆续送来解放区的黄敬斋、李绍堂、王耀华、王迪生，有的是清华、北大的毕业生，有的是济南后师毕业，就连附属高小的教师也配得很强。开学以后，在二年半的学习期间，地委、专署、军分区的领导干部，不断去作报告，讲形势，介绍反扫荡经验，进行慰问鼓励。为解决课本困难，专员周持衡亲自找我们研究，并亲自派人上太行山弄课本（因敌人封锁严密未过去）。在冀鲁豫区的时候，区党委书记黄敬和行署主任晁哲甫，把我们以及当时在那一带活动的筑先学院、财经学院、冀鲁中学召到范县唐家洼的树林里，亲自作形势报告，达三、四个小时，开学放假、结业以及许多关键时刻，行署、专署的负责人常去讲话鼓励，帮助解决困难。一级毕业那天，冀鲁豫行署付主任贾心斋和一专署的负责人都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毕业典礼。鲁西北一带党政干部和各抗日群众团体都很关心和支持这个学校的成长。有个学生在朝北办事务粮秣科工作，一说要到卫东中学去报考，科长张玉书在工作空隙里，主动帮助补习功课，准备考试，临走的时候，全科的同志欢送，学习期间派人去看。当时鲁西北抗联分会、鲁西北日报社、冀鲁豫文化出版社等单位的负责人沈廷相、张延积、张风采、孙仰洲、吕冰、丹彤、鲁西良都曾给我

们甚至多次给我们讲形势、讲游击战、持久战、讲阶级斗争、群众运动，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民族气节教育。冀南、冀鲁豫文工团、军分区文工团还多次为我们演唱岳飞传中的岳母刺字，文天祥、戚继光以及其他革命烈士为国家为民族杀身成仁的故事和《水浒》传中的英雄故事，还为我们演唱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南泥湾开荒》、《雷雨》。

学校本身党组织的活动更具体地体现了党在这里的领导作用。建校开始，教职员中有党员五人，学生中有党员十九人。校建“党团”，由校长林远任书记，下设一支部，由张炬任书记。增设二级以后，取消“党团”，建总支，每班有个支部，党员按教学组编组。平时学生中起监督、保证、模范带头作用，并进行物色对象，发展党的工作。那时党是秘密的，组与组不发生横的关系，支委对党员采取个别领导关系。党的工作通过学校的学生救国会和活动分子会进行。学校每在教学计划上、政治上、安全措施上有重要任务或者应付紧急情况，都先通过党的组织，以学生会的形式进行酝酿动员部署。党员是哪里有困难、有危险，就在哪里抢着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工作学习带头，他们都默默无闻地起着尖兵和保证作用。为了宣传马列主义、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地委还供给党支部两份党内资料，一个是“灯塔”，一个是“堡垒支部”。

人民抗日武装对我们的关心爱护和保卫，也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一九四二年“四·一二”大扫荡中，一部分学生眼看被敌人抓住，军分区三营赶来与敌苦战一场，付出很大

牺牲，把十几名学生抢救脱险。一次，学校里催不上粮食来，军分区派马河支队一个连为我们催粮。一九四三年一级学生转到濮范观的时候，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亲自带领一个连队护送到中心区。平时军分区还经常给学生补充武器，通报敌情，派干部讲解军事斗争知识和实战经验。还有老根据地的民兵，帮助我们站岗放哨，掩护转移。在分组教学那段时间里，学校和中心村的民兵班结合的更加紧密。学生教他们唱歌、扭秧歌、识字，他们为学生的安全操心费力。

卫东中学来自群众，扎根于群众之中，受群众支持保护。我们住的是民房，烧的是民柴，做饭借房东的炊具，挖地道搞生产用群众的镢头，反扫荡靠群众掩护，离开群众寸步难行。因此，特别注意群众工作，坚持学习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房东打扫卫生、生产劳动、担水拾柴，帮助村里建立识字班、学文化，活跃青少年工作。游击教学流动性大，情况紧急时一天一移动，但是不论住长住短，每到一村放下书包第一件事，是每个师生必须到群众里边去，选建一个第二家庭，商量好当人家的什么人，彼此互相称呼什么，敌人来了跑不出去的时候，怎样统一口径，不让敌人看出破绽。连刚懂话的小孩子也要演习一番。大凡分组教学或者明聚夜散，师生们就分散吃住在自己的第二家庭，和全家男女老少亲亲热热真象其中的一员。有的学生到麦季了还穿着棉裤，乡亲们就主动给拆洗成单衣，看到天冷了，还穿单衣，就送给棉裤、棉袄，看到鞋子挂不住脚了，就把自己孩子的鞋给一双，如果得了病，就更体验到“第二家庭”的温暖了。一九四四年在冠县北打蝗虫的时候，突然发现敌

情，上级命令暂时撤离这个地方，可有个住在冠北东王信的学生，病重难行，决定留下，房东老大娘冒着私通“八路”的危险，煎汤熬药，调剂生活，象慈母对待心爱的儿子一样，一气侍候二十多天，直到病好之后交给当地政府送回学校。当时群众中流行着一句话：“卫东中学师生的家多，房东老大娘的儿女多。”这是真实的写照。在必要的时候，群众确实能够毫不犹豫地豁出命来掩护“儿子”。一九四三年夏季，有个叫梁学礼的学生，从朝北的化庄跑敌情，跑到潘海，后边敌人紧紧追赶上来，眼看快到跟前，他就急速跑往老房东家。这时敌人已经进了村子，房东老大娘一看他身上有钢笔水，马上拿出一条破裤子催他换上，让他装作小儿子蹲在灶坑里烧水，敌人到她家胡乱查看了一番，抓了几只鸡，怪叫着走出去了。还有一次，被敌人冲散，两个学生跑着跑着和敌人的大队人马遭遇，看得真真切切，他们利用灌木丛的有利地形，飞速穿过一条公路，钻到一望无际的芦苇坡里，藏在那里的群众，主动让给包袱和牛，伪装成他们的孩子混了过去。二年多来，这样的情景并不稀罕。事实表明，卫东中学生的生存和成长的基础是群众。

四十年过去了，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党对发展教育，开发智力的重视；工、农、青、妇、武各行各业对学校和青少年成长的关心和支持；学校领导、全体职工和教师办好教育的事业心和牺牲精神；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教书又教人，体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以及患难与共、亲如一家的新型的师生关系；学生们为国家、为民族、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孜孜不倦、勤

奋好学的生动事实，回忆并笔录出来，我们认为对今日教育战线上的同志和新的一代青年学生们都可以从中吸取教益和力量的。

卫东中学一、二级教职员名单

校 长	林远 唐香涛
付 校 长	王宗约
教导主任	李奎元 苏景弼
支 书	班主任 张炬
事 务 员	陈君三
教 师	黑若仙
	崔景清 王耀华
	李 黎 (康国俊)
	李绍堂 王迪生
	黄敬斋 宋慕容

一九四二年建校时党员名单

教职员中的党员：

林远 李奎元 黑若仙 张炬 陈君三

学生中的党员：

梁学礼 郭维民 郭文江 杨士英 许天德 赵昌
宋贺彩 杨士芳 张跃奎 马万胜 马光普 高源 王庆元
(王新盟) 邹遵宪 陈宜民 康正保 马金秀 郭登美
解金刚

战 斗 的 一 年

——献给抗日卫东中学的学生
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

林 远

《注（1）》

鲁西——

这片广阔的平原上，
从南到北，
斜躺着一条古老的运河，
成行的树林，
疏落的草地，
装点了大自然的美景。

花生，

• 草麻，

红枣，

打瓜， 《注（2）》

此地的特产。

朴实，

勤劳，

尚武，

强悍，

老乡们的秉性。
一群小胡子矮兽、
歇斯底里似的狂叫；
“三光政策”，
惨绝人寰。
反抗，
复仇，
优秀的炎黄子孙，
谁肯甘心任人辱笑！
千万双粗手，
将平原改造成埋葬敌人的战场；
无数滴血汗，
换来了今天的自由之苗。
“积蓄力量，
准备反攻”；
“培养后一代，
建设新中国”。
几万张喉咙的雄壮呼声，
正是一九四二年的春天，
“黎明前的黑暗”。
数十个年青的孩子，
凑成一团，
卫东中学——这座新文化堡垒，
象一支锋利无比的飞箭，
已射至万恶敌人的胸前！

几路“合击”，
残酷扫荡，
绝望挣扎着的野兽，
企图毁灭这支新生的力量。

不错，
血腥的狂飙，
夺去一个年轻同学的生命。 《注（3）》

绵羊似的屈服吗？

不！

我们眼里没泪，

只有激愤的怒火；

我们的心已黏合在一起，
为死者复仇！

反扫荡声中的我们学校，

象一只在狂涛中驶进的帆船，

几次风浪，

换去了水手们不少辛劳。

半江中，

闪出一阵欢呼，

年轻的乘客们在驾着一把新舵；

从此它——

我们的学校，

排着狂涛，

渡过暗礁，

向着胜利的彼岸，
飞也似的驶到。

一九四二年冬

附注：（一）四十年前旧作原稿，保存在当时筹备学生会的常鹏飞同志处，一九六二年由北京寄赠于我，今略作修改。

（二）山东冠莘一带夏季，盛产的一种瓜，当地人摘吃时不用刀切，用手打开，故称打瓜。

（三）一九四二年卫中创办不久，在一次反扫荡中，我校学生张耀奎被俘，后被杀害。

冀鲁豫建国学院述略

阳谷县教育志编写组整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十月二十日，菏泽城解放，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进驻菏泽城里。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从事和平建国之各种人材”，冀鲁豫边区党委和行署于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作出决定，在菏泽成立冀鲁豫建国学院。

一九四六年三月初，建国学院筹委会成立，前省立六中校长刘培源先生等多人被聘为筹备委员。四日，筹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者还有执教于前聊城中学多年的边区参议员王静山先生，边府民政厅厅长晁哲甫适来边区巡视工作也到会指导。会上曾对菏泽一带新解放区学生的就学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决定了建国学院所设专业和班次。经过一个来月的筹备，四月一日第一届新生入学，十日正式开课。校址在菏泽城内原省立六中旧址。

一九四六年秋，蒋军向鲁西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为了尽量争取有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建院”于八月份迁出菏泽，撤到临泽县，西股驻顺城集、大张庄、郝庄一带，东股驻张楼附近诸村，协助当地群众搞了两个月的土改。九月份，“建院”随同区党委、行署继续北撤，北过黄河，驻在毛河、孙口一带，秋后又迁到堤口、油坊。一九四七年初（春节后），到筑先县（聊城）搞土改复查。五月份，土改参军基本结束后，集合在杜庄、谭庄、郝路口。秋收时节，迁到阳谷城西俞楼、杜庄一带。冬天，

又迁到朝城、南乐的边境大张、马集、范村一带。其间，师生分批南下参军参战。一九四八年麦收时，学校从朝城、南乐边境搬到阳谷县坡里，从此校址固定。一九四八年底，大部分师生调河南濮阳和范县、观城工作，一部分南下。战争年代的冀鲁豫建国学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于一九四九年二月改为冀鲁豫区第一师范，十月改名平原省第一师范。

“建院”是战争年代冀鲁豫边区的一所综合性学校，它既培训党政军干部，又培训师资、新闻工作者、会计、科技人员和培育中学生。初建院时共设三部：一为行政干训部，该部设财务行政、司法及银行会计三个班；一为师范部，该部设师范及中学两个班；一为专门职业部，下设电话、汽车两班，另有一个新闻研究班。上述各部，除专门职业部外，均招收初中毕业学生。“建院”一开始就有三百多学生的规模，接着续招师范班、初中班、电报班、电话班、财务行政班新生各二十名，汽车班、银行会计班新生各三十名，又招初中二、三年级、高中一年级、简师二、三年级编级生五个班。过黄河后，师范班、中学班增多，全校师生近两千人。一九四七年七月份跟冀鲁豫边区第一职业学校合并，一九四八年初跟冀鲁豫边区第九中学合并，教学人员更加充实，行政设置更加完善。学校定址坡里后，结构调整，专业减少，设政民部两个班，师范部两个班，中学部六个班。

“建院”的行政组织机构是院部，设正副院长、教育长、正副教导主任、总务主任，另有图书、医务、警卫、通讯、印刷、工厂、货栈等辅助单位。“建院”成立，行署即任命杨汉章为院长，张挽为教育长。开课后，又调第一分区专员张

耀南任副院长。张挽调走后，解彭年担任副院长兼教育长，继后是宋辛夷担任教育长。教导主任前后是李蕴玉、吴力践、王镜如、刘昭、陈桐源；副主任前后是刘衍洲、杨子毅；总务主任前后是金树尧、王岱峰、于克非、张守芹。学校的政治领导核心在一九四八年初坡里整党以前是院党委，整党以后是党总支，党委（或总支）书记前后是张耀南、解彭年、刘昭，分支书记多由学生干部担任。

各班设班主任，班主任有专职的，如干训班班主任路丁、师范班班主任贺光；也有兼职的。设教导干事（班主任助手），如中学班教导干事杨清美、师范班教导干事于传璧。专职教师有高镇五（教育学）、牛涧亭（数学）、李云华（语文）、岑明（政治）、贾崇岩（语文）等数十人。

领导干部和专职教师多半是从后方调来的干部，例如，张耀南来院前是分区专员，路丁是长征干部，解彭年是二十年代的老党员、老干部；从游击区、敌占区来的失业知识分子也有。学生来源：一是机关干部和部队中年龄较小的同志（“小鬼”），例如翟子亭同志原在一分区教导队工作，一九四六年春带着一分区司令部的信到“建院”报考；二是干部子女，例如晁哲甫省长的长子晁丁杰，是“建院”师范班学生；三是解放区、游击区的进步青年学生；四是向往革命、向往解放区的敌占区的进步青年学生。他们都是经过政府有关部门介绍来的。入学条件主要是政治条件，年龄放的较宽（中学班十六——二十岁，专门职业班十六——三十岁），文化考核也不很严格，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有大学肄业的，有中小学水平的。

“建院”存在于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因此，在办学形式和教学方针上，充分体现了为人民战争服务和为人民群众政治斗争服务的特点。一、学习内容：中学主要科目包括国语、数学（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历史、地理、博物、理化、政治、常识、外国语等项；师范课程，将以上科目酌情减少，另加教育及美术科目；电话、汽车、司法、财务行政及银行会计等专门职业班，则偏重于总结实际工作经验和形势政策教育。二、修业期限：原规定干训部、专门职业部修业期限为六个月，中学修业期限为二年，师范修业期限为一年。以后则根据战争和实际工作需要，采取随到随收、随调随走，流水似的招收分配办法。三、参军参政：在与蒋匪生死搏斗的三年中，“建院”曾多次抽调部分师生参加支前工作，并多次组织师生南下。一九四七年秋，刘邓大军渡黄河，“建院”有八十名优秀师生参军参战；一九四八年年底，大部分干部、学员北上参政，一部分南下（少数师生留在坡里，编入师范）。四、为群众政治斗争服务：一九四七年春，“建院”全体师生，组成土改复查工作队，到筑先县（聊城），同地方干部一起，发动农民进行土改复查。土改结束后，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参军人数达几个团之多。“建院”师生在帮助土改、发动群众参军工作中，不少人立功受奖。一九四八年六月修渠、八月捕蝗的战绩，师生记忆犹新；以介绍服务政治中心经验为主的校刊（油印，十六开毛头纸），所载立功者名单、表扬信，赫然现在。

“建院”师生经受了战争年代艰苦生活的磨炼，教职员实行供给制，学生除中学自理外，其他均由国家供给膳食、书

籍和灯油费,家庭困难的补助衣服。吃的小米饭,穿的粗布衣。学习条件也很差,没有校舍,住群众房屋,一口住房,既当教室,又当宿舍和饭堂。学习没正式课本,靠抄讲义、记笔记,使用的纸张全部是边区和本校生产的毛头纸。汽车班没有供实习用的汽车头,化学课上没有作实验的仪器。学校流动时,运输工具靠群众的牛车。

经过战争洗礼和艰苦锻炼的“建院”领导骨干和专职教员,在建国后,有的成为大专院校的领导人,有的在党政军和科技部门担任了重要职务,如高镇五(河南省教育厅长,已故)、刘昭(贵州省政府秘书长)、宋辛夷(郑州市委副书记)、解彭年(贵州化工学院院长,已故)、于传璧(新乡郊区党委宣传部长)、王镜如(北京历史博物馆党委书记)、陈桐源(云南化工厅长)、李宽宏(贵州教育厅长)等同志。“建院”所培育的数以千计的优秀学员,如今在党、政、军、文各条战线,已成长为革命和建设的领导骨干,担负着重要职务,如石友堂(湖北军人疗养院书记)、李方茂(上海党校政治部主任)、杨荣贵(三门峡钢厂书记)、苏达(新乡市委副书记)、段纯华(原子能研究会专家)等。“建院”大部分时间驻阳谷境内,当初阳谷青少年在“建院”学习的甚多,如今在本县担任领导职务的,如张子奎(副县长)、王汉杰(县委统战部部长)、魏之林(县一中校长)等,据统计有三十余人。

冀鲁豫建国学院建校三年,在冀鲁豫边区人民革命斗争中立下了不朽功绩,在该地区教育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

附件一：

行署决定成立建国学院

〔行署消息〕行署顷决定成立冀鲁豫建国学院，以培养各种建国人材。建国学院共分三部：一为行政干训部，该部暂设财务行政、司法及银行会计三个班；一为师范部，该部暂设师范及中学两个班；一为专门职业部，下设电话、汽车两个班。上述各部，除专门职业部外，均招收初中毕业学生。现在行署已任命杨汉章为院长，张挽为教育长。招生广告不日即可发出。预计四月初可开学。

（冀鲁豫日报）第〇六五期二版载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附件二：

冀鲁豫建国学院招生广告

一、宗旨：本校以培养为人民服务、和平建国之各种人材为宗旨。

二、编制及修业期限：本校暂设三部七班，编制及修业期限如下：（一）行政干训部，内暂设财务行政班、银行会计班、司法班，修业期限均六个月；（二）专门职业部，内暂设汽车班（汽车之驾驶、修理人材）、电话班（电话之装修、收发、管理人材及电报之收发人材），修业期限均六个月；（三）师范部，内暂设师范班及中学班，修业期限中学二年，师范一年。

三、招生名额：财务行政班、银行会计班、师范班、中学班各六十名，汽车班及电话班各一百名，司法班暂不收外生。

四、投考资格：财务行政班、银行会计班及师范班须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年龄应在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男女兼收。汽车班及电话班须高小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或初中学生，年龄应在十八以上、三十以下，电话班男女兼收，汽车班只收男生。初中班须高小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年龄应在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男女兼收。

五、学生待遇：以上各班除中学班外，膳费及图书灯油等学杂费均由本校供给（被服自备），其特别贫苦者，酌予

补助衣服及鞋袜；中学班全部自备，只特别贫苦者可酌予补助衣食图书。

六、考试项目：国语、算术、常识、口试。到校后再举行体格检查。

七、投考手续：投考者须有区级以上政府机关或学校之介绍信，其贫苦需要补助者，须有县政府以上机关证明。

八、投考日期及地点：自三月二十一起至三月三十日止，为报名期间；考试分两批举行，第一批三月二十五日，第二批三月三十日。投考地点为：（一）菏泽本校，（二）济宁市本校办事处（在市政府内），（三）各专署教育科。考试时膳食由本校供给。

九、毕业及择业：毕业后由学校介绍工作，不愿者听其自便。

院 长 杨 汉 章

二月二十日

（《冀鲁豫日报》第五六期载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原冀鲁豫区阳谷县四十年代教育史实

冯 之 琨

〈 一 〉

一个游击队式的抗日高级小学的诞生

我们这个县抗日战争前仅有一所简易师范和初中班。在一个乡镇上除了有一个初级职业学校外，各行政区也仅有一处高级小学。而在“七七”事变后，这些学校基本上散了摊子。县城和一些乡镇相继沦陷。四十年代初是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我方政府起初还没有精力和条件重新恢复和兴办这些学校，仅能把注意力放在兴办农村初级小学上。这些初级小学大都是一些较大的自然村主办兼收附近的小村落的孩子上学的，大多又是只开一、二年级或三、四年级中的某个班，有的也不分年级，而且多数初小，只有一名老师，进行复式教学。当时，由于处在战时，学制脱节，教学层次机构失调，这些乡村的少年儿童读完初小后，无法再进入高级学校或中学继续读书了。这样就直接影响了这些儿童的文化知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影响到今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

一九四三年，中共阳谷县委和地处运河两畔的七级一带第四区政权机关，为了解决当时的学制脱节和学校层次失调的问题，决定在这个抗日活动中心区建立一处抗日高级小学

校，可是，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还盘踞在七级镇上，他们不会安心让我们建立一个有着十分稳定的校舍。于是，我们确定成立一个流动的、游击式的抗日高级小学校。县、区党组织选派了首任校长，他是一个勤奋、精干、功底较厚实的党员。另外，还选派了一名在区里做妇女工作的妇女干部作为政治老师，她也有相当中学文化水平的程度。在选派了几名能胜任教学工作的教师后，就在七级东翟庄一带一个初小的办学基础上，招生开学了。这样一个游击队式的抗日高级小学校（以下简称抗高）就诞生了。

抗高开始招生四十余名学生。有四名教师，一名校友（校工）。学校选择了几个群众基础较好离敌据点较远一点的村子，如郎湾、苇铺等，作为流动中的落脚点。这时入学的学生也多是这一带村庄的孩子。不管抗高流动到这一带的哪个村庄，群众都象爱护自己的儿女一样，象接待子弟兵一样，欢迎这些男女孩子。师生住在群众家里，在群众的爱护下进行教学。有时，抗高行起军来，师生背起自己的背包，校工担着全校仅有的校产：马蹄表、校铃、毛珠算、小黑板、粉笔盒和油盐粮食，还有一架半旧风琴。这样的生活，师生感到很有趣，他们说：“我们是学生，又是游击队员；我们是老师，又是小小游击队的指挥员。”一些年龄较大的学生则说：“我们现在是八路军游击队的预备队员，毕业后去当正式战士。”当时学生的年龄放宽了些，学生一般十三、四岁，大一点的十六、七岁，有的在学校时还被接纳入了党，如刘贵长等。因此，他们生活自理能力是比较强的，尽管在游击

生活中教学，但绝大部分学生学习成绩比较优异。有一部分学生还没毕业，就提前离校参军，参加村、区政权建设工作去了。留下的同学，则以首批离校的校友的行动为荣，鼓舞着自己，在校努力学习。

抗日高级小学的定居

一九四四年秋，我军民的胜利日益扩大，日伪军的命运摇摇欲坠了。在我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七级镇解放了。翌年春，我县县城也相继解放了。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初小毕业的学生能升入高级小学读书的要求，县委决定在七级一带老区扩大抗高的规模，进一步办好这所已有一定基础的抗日高级小学。就在这个时候，我受党和政府的指派去兼任这所抗高的校长，以接替另行分配工作的原任校长崔衍勋同志。县里还指示我去选定一个固定校址，把抗高办的更好一些。我和抗高的老师交谈，和有关同志商量，走访了几位曾经当过我的老师的教育界老前辈和一些支持办学的民主开明人士后，决定把新校址定在七级镇。新校舍设在镇上原来办过学校，但已停办了七、八年的三义庙上，但它已是断瓦残垣。面对这所破落庙院，如何修整呢？当时，我们确定了要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拆除附近的其他孤立的破庙，修善这所学校。于是师生动手，又请了几位泥瓦、木工师傅，此外县政府又拨来两车拆敌人据点的本料，区政府又通知了各乡群众前来支援。半月之后，就把这所破庙修整一新了。然后，我们在校门两侧刚刚粉刷过的墙上写出了“人民教育”四个大字，为学校增添了雄姿，同时宣告了这所学校的服务宗旨。

又在正中教室的门两侧书写了“新教育浪潮汹涌澎湃于运水，新文化光芒辉煌灿烂于谷山”的醒目大字、以示我们的豪情壮志。于是，抗高的师生，来了最后一次行军，从翟庄临时校址搬到这里来了。

就这样，完成了抗高定居之喜。从此，也进入了一个办学的新阶段。招收了五、六年级的插班生，同时还招收了三、四年级的学生（不招一、二年级学生），这时，全校总共有学生一百四十余名了。

抗高的办学方针、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法

如何更进一步办好抗高，采取什么样的办学方针，确定什么样的教学目标这是至关重要的。对此。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教育配合，二者若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的指示精神，结合当时抗战形势与任务的要求，联系抗高已走过的道路，这年秋，又在地委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的启示下（这次会是地委申云浦书记主持并作了很好的报告，我作为阳谷教育工作者的代表之一参加了这个会），经过讨论确定了：为革命战争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具体的说，我们培养的学生在现阶段主要是为参加革命战争，以保卫抗日根据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以发展和建设根据地，以就业为主的培养目标。

在教学内容上，必须在普通基础教育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现实的实用性教育。那时，我们在五、六年级开七门课，即

时事政治课、国语课(包括农村应用文)、算术、珠算课、自然常识课,还有体育和音乐课。其中比例较大的是国语、算术课,时事政治课隔一周一堂课。那时,还没有统编教材,有的课是借用旧的课本,如自然常识课,但因乡土味太淡等原因,内容不大适用,这就要靠教师自己编写补充教材了。

以教学为主的教学秩序、制度是严格的,如上课考勤、考试、升留级制度也是坚持实行的。那时的教育质量也比较高。时事政治、国语、珠算课成绩最好,算术课的成绩不平衡,有一部分学生成绩很突出,他们对加减乘除联合应用题很感兴趣,如鸡兔同笼、和差化积、和尚分油、土地丈量等应用题。对乡村爱好数学的小学教师,会计先生钻研的一些古怪难题都可以解,这部分学生占十分之四左右,他们的数学程度超过了高小程度。时事政治水平的考查,那时是通过作文、书面问答进行的。作文内容往往又是以时事政治为主题。抗高的学生在学习之余,或在寒暑假中帮助村上的会计(那时叫先生)收工粮、记帐、算帐,帮助儿童团、青抗先、妇救会的活动,参加农村剧团、冬学等工作。因此,他们毕业后,就参加了八路军,参加了农业生产,参加了村、区政府的工作,成为村自卫队,农青妇各种革命组织的骨干和积极分子。这也体现了抗高的教育目的。

至全国解放前夕,有几个抗高的学生已成为区政府的助理员;在五十年代有的已被培养为县委成员和部队连级干部;有的在部队立了功,成为战斗英雄;有的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成为光荣的人民烈士。据了解,现在有不少那

时的毕业生，分别战斗在各条战线上，担任着地、县、社和军队的领导工作。

抗高是学校又是社会文化 宣传的阵地

我们的抗高后来改为第三高级小学。这所高小主动承担了开展社会文化和宣传的任务。

在拥军、慰问八路军的活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解放本县县城的战斗中。当时组织年龄较大的学生，到战场上慰问，使他们亲眼看到子弟兵英勇杀敌的情景，回校后向同学们报告前线见闻，鼓舞了全校学生努力学习，毕业后上前线英勇杀敌的革命热情。

在开展社会政治宣传工作方面，我们师生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编排反映革命战争前线胜利的活报剧，到集市上演出。如为了揭露美蒋勾结，编排了美国大使赫尔利和蒋介石勾结的双簧戏，形象地揭露了他们的阴谋。象这类的活报剧，根据时事政治内容，每月都编排一两个到集市中心演出，很受群众欢迎。特别是在一九四六年召开几万人参加的“四八”烈士追悼大会时，抗高的全体师生齐动员，承担了会场的全部布置工作。通过这种政治性很强，富有革命教育意义的实践活动，对提高师生政治觉悟，锻炼他们的活动能力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四六年冬，为了配合土改的发动工作，师生排演了一部叫“贫女泪”的剧。师生热情洋溢，边念台词，边练舞台动作和唱功，前台打击乐也是自己干，演出效果很

好。七级镇有位老大娘，看了戏，哭了一夜，决心闹翻身，积极要求参加土改。抗高师生的宣传活动，受到了这一带群众的赞扬，他们也更加热爱自己的学校。

抗高也是乡村文化教育的 积极支持者

抗高在普及文化教育工作中，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每年冬季，各村开办冬学，组织成年人，在冬闲的晚上学习识字，学习政治，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抗高教育自己的学生（特别是走读生），要积极支持自己村上的冬学，充当教员或“小先生”。不少学生是这样做了。除了冬学的夜校外，他们在成年人中，根据生产、家庭副业、家务劳动的情况，组成志愿结合、各种形式的认字组，如变工组、互助组、妇女纺线组等认字活动小组。如抗高有个叫姚小兰的五年级的女学生，就出色地利用晚上，到一个由老太婆自然结合的纺线组当“小先生”，经过几个月，这些文盲老太婆认了一百多个字。另外，一个姐妹纺线作活点的几个大嫂、大娘也请她去教，她成了很受妇女欢迎的“小先生”。当时，冀鲁豫行署教育处住在镇上，当了解到抗高以本校为中心，通过学生去组织和支持镇上和各村的冬学、帮助群众学文化的事后，还在行署办的刊物上作了报导，表彰了抗高的这种做法。此外，抗高的学生还在一些村上办有见物认字和村头、村中心挂识字牌的普及识字的活动。

生产劳动相结合

抗高不仅在教学方针、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上规定了与劳动相结合，而且使师生亲自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这既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念，又增长了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同时，也出色地完成了本校农业生产的任务。当时，学校有十二亩校产（学田租）把它作为师生劳动生产基地。我们组织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定期参加劳动。除收割季节外，一般每周一次。农忙时，集中一两天，由老师带领加上一名校工，组织学生进行播种、收割及晒场的劳动。有一位姓贺的和一位姓翟的老师，那时他们是四十多岁的人，劳动好，有生产经验。他们一面带领学生劳动，一面手把手的教给学生生产技术。老师们在生产中还讲生产知识、农作物知识、土壤知识、气候、化学知识，这样就补充了学生学自然常识的理性知识不足之处。有一年，学校收获粮食（绿豆、黄豆）十二石。我们用这些劳动成果，开支办学经费，做到了经费自给。还给学生每人买了一顶军帽式的毡帽和学习用具，并解决了搭伙同学及中午带饭蒸的同学的烧柴、开水等问题。

抗高的分身法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到一九四五年秋，大运河畔的人民群众，希望子女在本村读完初小后能升入高小的人，

比以前多了起来。但由于各种条件所限，他们在本村既不能办起高小，而全区再办一所高小也没有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抗高采取了建立分校和支点的办法。首先在离本校八华里的西北新添庙设立了一处分校，这处分校也是利用一座庙宇设立的，并在那一带村学中选拔了一名教员，再由本校派去一名有教学经验、知识水平较高的教员主持工作。此外，还派了本校毕业的一名优秀毕业生充任教员，招收了三十名学生，成立了分校。分校的教学计划、教材、经费由本校负责统一管理。这和支点不同，支点的教学计划、教材、经费、教师基本上是由当地村学安排，本校只是给指导和帮助解决教学方面的有关问题。支点在条件具备时，再转为分校。当时，我们已着手在本校以南六华里的三合庄建立一个支点，计划在东边再建立一个支点，准备在两年内搞起三个分校。这样，就可以基本满足这个地区的学生升学的要求了。

由于我在这以后的一年，调到县里主持文教工作。不久这个区又被划入新建制的为纪念徐翼同志而命名的徐翼县，对那里的工作联系少了。

〈 二 〉

生气勃勃星罗棋布的农村 初级小学教育

在战争年代，农村的一切活动，都要适应革命战争的特

点和它的需要。因此，农村初级小学教育就要围绕革命战争的特点和需要，确定自己的任务，确定教育方针、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办学形式、教学方法和手段。关于那时的教学方针和目的，在总的原则上是和前面我们讲到的抗高的方针和目的基本相同，只是办学形式、教学方法、手段则有所区别。从四十年代起，人民群众和战斗在广大农村的初级小学教育工作者、教师，把党的路线、政策与农村实际情况相结合起来，通过自己的工作实践，于是一扫战前旧的小学教育制度、方针、办法，改革了教学内容，表现了很大的创造精神。那时，我编了一首描绘这种新教育、新学校、新儿童的歌，曾在几个小学里教唱、流行。这个歌子是用当时的《儿童团歌》的谱子填词而成，歌的名称是《新学校、新儿童》，共分四段，今录于下：

1=C $\frac{3}{4}$ 新学校新儿童歌

3 $\underline{23}$ | 1 - | 3 $\underline{23}$ | 5 - | $\underline{3353}$ | $\underline{32}$ | 3 - |
 新 中 国 新 儿 童 新中国的主人翁
 新 学 校 新 学 生 新中国的好儿童
 草 篮 里 放 课 本 又 劳 动 来 又 学 习
 互 助 组 小 先 生 你 教 我 来 我 教 你

3 $\underline{61}$ | 5 - | 1 $\underline{61}$ | 2 - | $\underline{2353}$ | $\underline{23}$ | 1 0 |
 小 书 包 背 在 身 站 岗 放 哨 我 认 真
 起 得 早 上 学 校 上 课 听 讲 我 用 心
 地 头 上 树 荫 下 读 书 写 字 我 努 力
 全 日 制 半 日 制 校 内 校 外 好 学 生

(2 3 5 3 | 2 3 | 1 0) :||

说明：这里的谱子是回忆原《儿童歌》的谱子。由于记忆不清，难免和原谱有差别。

关于办学形式是从单一的全日制发展到多种形式。我县在一九四四年前都是全日制。那时，农村实际情况是不少青壮年参加八路军、游击队了，特别是男劳动力，脱产参加革命、参加部队的多。因之，村里剩下的三多：妇女多、孩子多、老人多，甚至有的人家只剩下妇女、孩子。村里缺乏劳动力，需要孩子们参加生产劳动。因此，不管是土改前，土改后，中农以下人家的孩子，甚至少数富农人家的孩子，因为家庭要求他们负责家务和农业方面的辅助劳动，所以坚持全日制读书有困难，因此，有的只有放弃读书的机会。如今，人民政府办学，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政府号召每个孩子到了入学年龄，都要进校读书。但如何解决好让孩子读好书而又不耽误家务劳动的问题，这是摆在多数家庭和学校面前的现实问题。对于这个矛盾，在没有摸索出解决的办法之前，大多数农村小学难以保证满意的入学率和学生满勤率。开始只是单纯地规定学生必须满勤不准缺课，动员家长给自己的孩子做工作，但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后来，在其他解放区先进经验

的启发下，总结正反经验，才摸索出新的教学形式。那就是全日制、半日制、隔日制等办学制度和教学形式。经过试验是可行的，以前存在的实际问题解决了。学生、家长都很高兴，教师也不再为大量学生缺勤问题发愁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摸索出“小先生制”，即学生在不上学的半天或一天里，按照他们劳动的相同类型，在一个时间内，以自愿结合辅以有计划编组的方法，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在这些小组中，选拔一个“小先生”担负辅导其他同学的功课的义务。这样，他们小组在劳动中、休息时、在家中都可以不间断地进行学习了。当然学校里仍然有一部分学生坚持全日制，决不可放松对他们的教学工作，另外，师生还可以根据这些小组劳动的地点，进行必要的巡视检查、督促，指导他们的学习，还可以在校内无课的时间去同他们一起劳动。这种形式和方法我们曾在七级镇周围几个小学首先实验过，之后，向全县推广了。

关于农村初级小学的教材，在一九四六年前，我县还没有统一编写的全套小学教材，只有个别课程如语文、数学有统一编写的题纲和一二年级的木刻印刷的国文课本，一九四六年以后，逐步有了行署教育处编印和各县编印的各科课本。各个学校以此为基础，结合本乡本土的实际情况，结合当前政治中心任务补充教材内容。在这方面，有些农村小学教师发挥了很大的才能，他们在有统一教材的时候，能够联系实际，对教材充实内容，在没有统一教材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教育。在安乐镇附近离敌人较近的村子，日伪的教育视察员来了，就拿出四书五经或准备几本日伪发的课本摆门面，他

们一出门，老师就把那些课本收了换上抗日民主政府的课本。有一年，我在安乐镇附近的小学里，老师还表演这种戏法给我看。这些小学的教员，坚持了抵制敌人的奴化教育，实行民族的、爱国的和民主、科学的教育。

在革命战争年代，老解放区的乡村小学，还开展了垦荒种地、拥军优属的活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我们在七级镇进行了这些活动，成绩是喜人的。那时的开荒种地，要求利用地边、坑沿、路旁、荒坡零星地边、小块土地，因地制宜，种植适合生长的农作物。一个区一年曾开了五十多亩。多数种植的是蓖麻，他们卖了蓖麻子，给学校添置部分必要的教具，给学生买了铅笔、作业本等学习用具。一九四七年，这种活动推广到全县。有些学校在此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竟办起了小商店、烧饼铺等。但是，当时我们没有推广这种做法，因为，它是有特定条件的，办大了会分散学校精力，影响教学，不是大多数学校发展的方向。

此外，每年秋后，学校还开展了拥军优属，帮助鳏寡孤独老人去劳动。要求从秋后到冬至的几个里，学生利用课余，集体拣柴拾干草，送给烈军属鳏寡孤独的老人。七级区儿童一年曾拣柴草达三万多斤。

乡村教育在前进中的小小曲折

乡村教育，自从抗日战争爆发后，曾经历了由衰落到兴起，以旧的办学方针、内容、形式、方法到逐步改为新的教

学方针、内容、形式、方法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也出现了小的曲折。如在土改运动中，曾由于发生了违背毛主席制定的土改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错误倾向，曾提出了贫雇农路线和“贫雇农打天下”的口号，又加之唯成分论的偏面思想的影响，使少数出身地富和部分出身中农的乡村教员，思想上受到了冲击。而他们中绝大多数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拥护党的政策，拥护抗日民主政权的，即使在自卫战争开始的形势下，他们也是相信共产党的。但在土改中有的被发动土改的干部免了职，换上了半知识分子担任教员，在少数教员中也有挨斗的，极个别的也有被群众要回去打死的。他们灰心了，有的甚至对个人前途发生了疑虑，几年来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思想和热情骤然暗淡下来。这种情况，在我县的一九四七年年秋、冬，是确实存在的。同时，由于这种错误思想倾向，也伤害了一些曾经热心帮助办学的学董。这部分人士中，不少人对抗战有功，他们多半是医生、社会知名人士、开明绅士，对土改也不是坚决反对的，他们中间多数人土地比一般农民多一些，但不属于大地主，他们表示愿意把多的土地交给群众分配，只是怕列入斗争对象。他们不敢过问学校的事了。这样，一时乡村教育的发展受到了影响，直到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这种情况才有改观。经过土改整党后，毛主席的指示、党的政策被广大干部群众掌握了，变为他们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后，这些灰心意冷的乡村教师看到了党的政策落实了，他们的心才稳住了，重新焕发精神，努力工作，乡村教育又得到发展。

对新解放的城镇小学教育的逐步 改造和全县教育工作的兴旺发展

一九四五年，我县县城解放，这些地方的学校回到了人民怀抱，由人民政府管理了。因此，我们对当时新解放的县城及县城附近乡镇的小学教育逐步进行了整理、改造。这些学校有少数教师，在日伪命运垂危的日子里，逃到敌人还占领着的大城市去了。绝大多数留了下来。可是，由于他们在敌占区过了八、九年，对人民政府的政策和人民民主教育不甚了解，他们虽然继续为教学工作服务，但思想上有顾虑，工作上还不着实。为此，我们举办了几期解放区的小学教员训练班。办训练班的目的是从思想上解决他们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同时，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当前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等文章。介绍老解放区的教育情况，发扬老区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肃清奴化、封建主义、法西斯教育的影响，使之转向人民教育的轨道上来。这些学校的老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般的说比老区学校的教师，基础文化水平高，有许多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因此，团结、教育、改造好这些教员，使他们为人民的教育事业服务，对提高教学质量是很重要的。县教育科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对这些学校和教员进行了整顿和教育，使这些学校的教员，取得了人民的信任，改变了办学的方针、形式、内容，适应了革命的需要。后来这些

学校办的都比较好，不少学校的教学质量还超过了老区的学校。

至一九四九年，全县发展起近三百所（其中有三所高级小学和一部分完小），由于专署在我县办了一所初级中学，所以，我们县未马上再办中学，但是办一所中学的条件将逐步成熟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府重视发展乡村教育，广大教育工作者、小学教师艰苦奋斗，坚持不懈地工作，谱写了乡村教育的史诗。

注：本文系作者一九七九年所写，一九八四年九月进行了改写，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摘录。

泰运书店梗概

王 毅 然

泰运书店系冀鲁豫一地委于一九四五年建立的，是地委领导下的一个文化事业单位。原名为泰运文化出版社，后改为泰运书店。它承担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主要是：（一）负责全地区中小学课本的印刷，还代银行印制钞票；（二）后来又协助地委办报，如《晚报》、《挺进报》；还派人到地委具体参与办报，即李林轩同志和我；（三）经营和供应全地区的精神食粮——书报杂志；（四）参与土改等中心工作。

书店开始只有几部油印机，后来规模越来越大，石印机增加至二十多部，还有了两部铅印机，人员发展到一百余人。书店经理是吴冠英同志，他是二七年的老党员、一九三八年任泰运地委委员。一九四八年泰运书店与冀鲁豫书店合并，冠英同志调区党委党校任副校长，后又调中央财政部工作。冠英同志现已离休，已是七十九岁的高龄了。三位副经理之一申伯谨同志已于一九八四年六月廿四日去世，当时的几个区级干部李忠、吴道庚在天津，孙星海、李星垣二同志也先后去逝。我是一九四九年来贵州的。在吴冠英同志领导下的泰运书店，不论思想政治工作，还是经营管理都有独到之处。如职工夜校，所有工人和一般干部无例外的都要参加，经过三年多的学习，不少人原来识字不多，后来竟达到了高

小程度。冠英同志对干部的学习非常重视，总是亲自领导，不仅如此，他还要我们经常自选题目写文章，由他批阅，远远超出了一般中学语文老师的水平。

（节选自王毅然同志《给地委党史办公室的信》）

原冀鲁豫区阳谷县四十 年代新文化史实

冯之琨

新文化的曙光普照我县广大乡村

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农村新教育的开展，乡村新文化也逐渐发展起来了。而且这种新文化的发展是与新教育的发展密切联系着的。因为这种新文化活动中，乡村教师、学生是主要的力量。普及农村的文化，发动农民识字的运动，是一种很普遍的文化教育活动。那时的识字课本、识字牌，所用的字、词都是反映革命战争、时事、政治和生活方面的内容的，如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抗日政府、八路军；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国民党反动派等字词。在反映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方面有从一到十的苏州码、阿拉伯数字、元、角、分、丈、尺、寸、斤、两及各种农作物名称和生产用具名称等。把这几类的字和词编成句和课本，用来普及和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增加农民的政治、生活知识。在一九四五年前，这些教材基本上是各村文化教育者自编自教的，之后逐渐有了专署或边区编印的材料，如冬学课本及新三字经等。

农村学文化的形式，有冬学、识字班、识字牌、见物识

字等。在较大的乡村里，还有农村剧团。此外，民间喜闻乐见的传统玩艺儿，如高跷、竹马、龙灯、狮袍、民间说唱等文化艺术形式也有新发展。儿童团、妇救会经常教唱革命歌曲。在一九四六年，我就接受县委指示编了一个独幕剧《穷人要翻身》，一个花鼓调《十二个月》印刷下去，作为春节文艺材料。还编了纪念聊、阳、阿人民英雄徐翼烈士的《纪念徐翼烈士》。抗日战争胜利后，农村在宣传工具上创造了广播筒、广播台。我县农村新文化面貌有一个突出发展时期，是在一九四七年后，比较明显地反映在农村新春联、新年画的出现，过去那种“姜太公在此，诸位退神”、“天地图”、“灶王爷”、“奶奶像”和旧门神被新春联、新年画、新门画代替了。

一九四五年，我军攻克了县城，我们进了城。可是在日伪反动政权侵略压迫和奴役中国人民、掠夺中国人民财物的七、八年中，这伙强盗连为他们服务的反动文化事业单位也没搞点什么。所以，抗日政府进城后，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可接管的事业单位，只有白手起家，努力创办革命的文化事业单位。

当时，县一级的文化机构只有一个教育科，它负责一切文化工作的任务。

在社会文化宣传方面，教育科的同志担负了对县城人民进行形势和任务的宣传工作。当时没有先进的广播器材，我们就采用土办法，制作广播筒。城关小学负责城关的宣传。广播稿则由教育科统一编写或摘抄冀鲁豫日报。那时还没有群众订报，只有县、区一级党政机关才有少量份数的报

纸。这样利用上广播进行宣传就可以补充了报纸宣传不广泛的问题。

为了使群众能接受更多的文化知识、时事政治，我们在县城里创办了一个类似现在的文化馆。在这里陈列出报纸、时事政策性材料和部分图书资料，还刊出黑板报、识字牌、年画、画报等文化宣传品和通俗读物。里边设有桌子、开水，使赶集的城乡群众来此休息、阅读。另外，还可以借阅。后来我们就正式命名为县群众文化教育馆了。这是我们创办的第一个服务于群众的文化机构。之后群众文化教育馆的内容也渐渐丰富起来了，有时在那里教唱革命歌曲。一九四八年秋，县文艺工作队组织的河南坠子等曲艺节目，也是以群众文化教育馆的名义举办的。

为了印刷文化教育教材，我们搞了一台油印机，买了两块印石，又开办了一个印刷发行单位。这个单位负责印刷和发行小学课本冬学课本，之后这个单位命名为新华书店，教育科又委派了一个懂行的周同志担任负责人。这也是我县民主政权的第一个印刷出版兼发行单位。

活跃在寿、阳、朝城乡的民间艺人

一九四七年，在专区民间艺术联合会的培植下，我们开展了民间艺术工作。这年秋天，专区民间艺人联合会举办民间艺人训练班，让我参加了这个班的组织工作，任班主任。在这里集中了寿张、阳谷、朝城三个县的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艺人。这一期是以戏曲艺人为主的训练班，所以，这一期来自四面八方的是曲艺艺人和农村剧团的教师。其目的是提高他们的政治

觉悟，把他们进一步组织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参加了这个训练班的组织领导工作，从而也受到了启发和教育。了解了这些过去生活在底层的人们的身世、处境。他们的悲惨生活是整个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血泪史的一部分。在组织他们忆苦思甜的会上，他们个个声泪俱下地叙述着自己飘零流浪的家史，饱受着人间的歧视、凌侮。他们中间虽然有不少人在艺术上有一定成绩，但每个人都预感到老来难以摆脱孤零、寒酸、惨淡生活的悲惨之路。现在有了共产党，人民政府给他们带来了温暖和幸福，安排了他们的生活，发挥了他们的艺术伎长，他们壮有所用，老有所养。我们把他们的苦诉，写成了几篇记实，曾送到地区办的文艺报上发表过。

在他们控拆旧社会苦后，发动他们签发了一篇《告民间艺人书》。《告民间艺人书》散发后，极大地启发了这几个县的民间艺人的阶级觉悟，推动了这几个县的民间艺术工作的蓬勃发展。

这期训练班结束后，我回到县里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决定成立我县民间文艺工作队，为成立民间的艺术联合会作准备。县里委派我负责这个队的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我们很快和本县的民间艺人建立了联系，组织了联络网。包括戏曲：京剧、梆子、四弦；曲艺：河南坠子、洋琴、鱼鼓、大鼓、莲花落；声乐：喷呐、三弦琴；绘画：庙画、门神画，还有木刻、雕刻、泥塑、魔术、洋片、土电影等方面的民间艺术。总之，台上的，台下的，过去称之为江湖艺人、三教九流中的人们都争先恐后前来建立他关。系们强烈

要求组织起来，对他们加强领导，使他们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中去，运用自己的艺术为人民服务。

那时，县文艺工作队中没有脱产的干部，我是兼职，另外有一个干事，可我们联系的艺人可不少。我们先后组织了说唱小分队、唢呐小分队、魔术小分队、拉洋片小分队等。只发给他们一个三角小红旗，红旗上写上县文艺工作队某某小分队，在他们中间委派一个小分队负责人，他们就起早摸黑，分赴到全县四面八方的农村去演出。他们到那里，由村政府接待他们，供给普通的饭食，给他们安排住处，除此之外，什么报酬也不要。他们每到一个村庄，都要演唱七、八天，然后再转到另一个村。

我们县是洋琴的发祥地，这里曾涌现过优秀的洋琴艺人。他们培养了许多徒弟，北京、天津的洋琴艺人的技术也有许多是这里的老师传授的，可是，洋琴艺术，过去成了供地主阶级娱乐的附属品，洋琴艺人到头来还逃不脱病困潦倒的命运。因此，洋琴艺术几乎陷入绝灭的境地。这时，我们把他们发动起来，继承发扬这种传统的艺术，使之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还有唢呐，也是我县有名的声乐艺术，在附近县份中享有盛名。过去这种声乐艺术多半服务于城乡人们的红白喜事，称为“鼓乐”或吹喇叭。但它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器乐艺术。现在给这种艺术扩大了活动范围，给它增添了新的内容、新的乐章、新的任务，成为更加受群众欢迎的艺术形式了。

这些说唱、器乐等小分队，每活动一两个月后，来队汇

报情况，进行总结整休，整理说唱材料。

除了这些声乐说唱艺术分队之外，我们还组织了木刻、绘画艺人成立一个新年画社。开始刻印毛主席像、年画、门画和新历书。在这方面继承了民间艺术的传统，运用他们传统的画法，创造了许多优美的年画、门画，为建设农村新文化，树立农村新风尚起了积极作用。

当时，在民间艺术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农村剧团。在一九四八年，全县这种农村剧团已发展到近三十个。这是一支占领农村宣传文化阵地的主力军。在这方面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帮助他们发展，指导他们推陈出新，排演新节目，较好地发挥了戏剧的艺术作用。

关于对这些民间艺人的团结、教育、改造和对这些艺术进行“推陈出新”工作，专区民间艺术联合会对几个县的各类民间艺术的艺人骨干都前后分别进行了训练，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在训练期间，组织他们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共产主义的理想，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方针、政策，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请美术工作者张民权主任、戏剧工作者于克非同志作艺术指导，上业务课。在训练期间，还组织他们深入当地的土改斗争中去，亲身体验斗争生活。当时有意识地让他们去朝城一个村子调查了解。这个村子，地主反攻倒算，利用蜕化变质的村干，杀害了妇女会长等几个村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使他们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回班后，围绕这些真人真事、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以各种艺术形式自编自演。在训练班上，还组织他们访问一些典型的英雄模范人物，搜集一些身受深重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翻身事实。我

记得有一期说唱艺人训练班就编了好几个说唱材料，登在边区的《说说唱唱》杂志上，如《邵娇梅翻身》等。这种训练方法是成功的。

当时，各种艺术形式都有推陈出新问题。如戏剧方面，淘汰了那些封建迷信、低级庸俗的不健康的剧目，演出了《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新编小放牛》、《血泪仇》、《打鱼杀家》、《李逵装嫖妇》、《柜中缘》等新改编的剧目。木刻、绘画放弃了那些庙画、门神画，而刻印绘画了毛主席像、冬学课本、新年画、新门画。如在新年画、新门画中有骑马戴大红花의参军图、五谷丰登门画、挑篮送饭的青年妇女、学习文化的妇女儿童、全家福、日历图等，很受群众喜爱。有一年，我们印了几十万张新年画、门画仍供不应求。

那时，县委每逢开大会，都要求演戏。我们文艺工作队，只要发一个通知，我们县农村剧团和邻县的剧团、艺人都立刻赶来参加会演。如清平县、南乐县、内黄县，这三个县是已故的三十年代河南坠子名艺人乔清秀、乔利元的故乡，他们的艺徒很多，艺术高深。他们主动要求到县城里，到城外农村演出，很受欢迎。

戏剧、曲艺、音乐、魔术、木刻、绘画、雕塑等，这些民间艺术来自人民，如今又回到了人民中。

注：本文系作者一九七九年所写，一九八四年九月进行了改写，我们在此基础上予以摘录刊登。

我参加民间艺术宣传工作的情况

张 兴 泉

一、参加训练班学习

一九四七年旧历八月十五前夕。我在同行艺人的发动下，去朝城程庄（现属莘县）参加专署办的民间艺人训练班学习。这个训练班的负责人是张民权，他是二专署民间艺术联合会的主任，是由我们九专署邀请来办训练班的。艺术指导、教员是于克非。班主任是冯之琨，他是阳谷县的文教科长，由九专署派来，率领并主持我们学习的。

全班民间艺人七十余人。都是各种民间艺术的骨干人员，艺术水平较高。按县分，有阳谷、徐翼、寿张、朝城、莘县等各县的，以阳谷来参加学习的最多，占大部分。

在学习期间学习内容：时事政策、艺术理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剧目讲评、艺术实践、排演等。在三个多月的期间，还组织我们忆苦思甜，开倒苦水大会，是很教育人的，加上听讲翻身道理受到深刻的启发，提高了阶级觉悟。除了阶级教育，业务训练外，还组织我们帮助群众劳动（种麦子）。之后，又下到土改后发生反攻倒算的典型村，进行调查访问，通过调查访问，各种艺术进行集体创作，自编自演，推陈出新。当时编了节目，有的被发表在《平原文艺》上，没有登载的也作为宣传材料了。

二、在阳谷县文艺工作队组织领导下的活动

训练结束后，我们回到县里，这年十一月初，阳谷县成立了民间艺术工作队（准备成立民间艺术联合会），队长、指导员均由县文教科长兼任。由于他热爱民间艺术工作，在一个干事的协助下，他一直亲身领导我们开展工作。一九四七年底，就以受过训的学员为骨干组织起各种艺术的宣传队，成员共计有近三百人，队部设在阳谷城东的城角孟。主要的艺术小分队是：

1、曲艺分队（包括坠子、莲花落等曲艺）

①坠子组：张兴泉、谭连成、谭重华、杨怀元、袁素华（女）张新广、乔今义、孙荣金。

②山东琴书组：刘广明、刘广银、秦书春、曹银良、赵景文、王瑞祥、王瑞龙、马纪田、袁明学、吴景义。

2、河北梆子组（各农村剧团的负责人及骨干）：王庆成、徐道一、徐道先、姜体芹、姜体云、姜万寿、解更明、田××、方茂存、方茂千、翟加志、翟清同、朱保柱、贾书祥、袁喜梅（女）、宋喜增。

3、山东梆子组（各剧团的骨干分子）：王金山、王英杰、王英彬、尹在起、吴金中、王五妮、王范银、王保亭、于安庆、马元龄、吴庆生、杨风先、吴永、周××、孙保民、孙××。

4、刻印绘画（阳谷年画画店）：布秀立、于安庆，还有龙虎寨的一个现已忘记了姓名。

5、唢呐小分队：李文亮、张保印、王金泉、金丕联、张寿臣、邢永书、谢元理、耿书良。

6、洋片、魔术组：人员名字记不清了，大约三、四个人。

此外，还有农村剧团，当时比较有基础的有七级镇的、毛庙的等。

除了这些艺术形式的小分队都由县民间艺术工作队领导外，还和朝城、莘县、寿张以及清丰、南乐的民间艺人保持联系，建立了联络网，寿张、朝城的戏剧艺人较多，清丰、南乐的河南坠子艺人较多，而且是青年的女同志。

当时曲艺演出的内容有：《大反攻》、《李二发家》、《晴天传》、《邵姣梅》、《保卫家乡》、《西店子白毛女》、《大生产运动》、《打开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土地法大纲》等等十几个节目，在戏剧方面的剧目有：《兄妹开荒》、《白毛女》、《三打祝家庄》、《打鱼杀家》、《贫女泪》等十几个剧目。刻印绘画（阳谷年画画店）刻印的内容有：《毛主席像》、《五谷丰登图》、《妇女学文化》、《送子参军》等等七、八种新门画、日历画。

其他艺术形式也都在“推陈出新”，服务群众，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方针下，自编自演，创作或改编了新的内容。这些内容新颖、实际、战斗性强，群众很爱听。例如，我们受训期间到胡集调查了假农会杀害真农会干部的事件，到草佛寺调查地主陷害邵姣梅事件，都由我们曲艺艺人编成书演唱，很受群众欢迎。

当时活动方式是除年画社住在队部和农村剧团在当地活动（有时也由队部通知集中演出活动）外，其他多种艺术形式，如曲艺等形式，皆以小分队为单位。打着上书阳谷县民

间艺术工作队×××小分队的三角小红旗，深入到各区乡村进行活动。所到之处，由村政府接待，向群众演唱宣传，有的村住两、三天，有的村住五、六天，各小分队每一、两月回队部汇报整休一次。

那时我们艺人干劲十足，情绪十分高涨，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热情很高。虽然当时生活很苦，走到哪里都是只吃村上供给的玉米窝窝头、小米汤、咸萝卜菜，此外分文不取。而且自带衣服（后来发了防雨油布）、鞋袜。但是没有一个人叫苦。连从南乐邀请来的一些年轻的唱河南坠子的女同志也从未说过苦，讲过什么待遇。那时我们阳谷县委、政府开大会时，只要冯科长发个通知，两天内就把几个县的各种艺术形式的艺人都集中来了，好几个剧团和上百个曲艺艺人，演唱几天，情况是非常热闹的。会后，还在城内、城关演唱，群众非常欢迎。

为了打开局面，扩大宣传，冯科长还亲自率领我们一个区一个区的巡回演唱，并且还由县文教科发出通知，要求各区文教助理员积极协助我们的活动。

三、关于准备成立九专区民间艺术联合会的问题。

据我当时听说，地委曾指示我县文教科冯科长，先选拔我们这批民间艺术艺人的骨干分子、活动分子去受训，再以阳谷为中心组织活动，先成立起民间艺术组织，以后准备以阳谷的工作为基础成立九专署民间艺术联合会。并由训练班发出了《告艺人书》，说明这个精神。以后，由于干部南下，亲自抓这项工作的地委书记李春兰也调天津工作去了，对这项工作有些影响，后来没有组织成。

编后：此文稿经过冯之琨同志审阅，他说：张兴泉同志当时是坠子分队的骨干，他年轻，记忆力特别强，他的回忆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春这段期间，他一方面作教育工作，同时接受地委书记李春兰及阳谷县委、政府的指示，组织领导了民间艺术工作。而且，由于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广大群众的支持，各种民间艺术艺人同志的积极努力，那段工作搞的还是十分活跃，热火朝天的。把这段情况反映出来，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入 校 须 知

编者按：此件系赵儒昌同志（现名赵亮）提供。这是赵儒昌同志一九二六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介绍人张干民同志（现名赵文栋，在吉林省粮食厅工作），当时送给他的印油小册子。在当时，极秘密的形势下，赵儒昌同志考虑这是我党的重要史料，所以一直秘密保存着。后来，赵儒昌同志为找入党介绍人及计算党龄等事，于一九五五年将此件抄写一份留底，原油印小册子邮至中共中央组织部。现将抄件原文登载入下：

同志：

这是你一生最大的纪念日子！

入 校 须 知

这是你走上正路得着一个新的日子。

努力！

同学：我们于欢迎你入校之时，应该告诉你几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很郑重的交给你这本小册子，希望你细细看去，切实记在心里！

(一)

1、什么是CP？CP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他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领导无产阶级为自身利益而奋斗的团体。他的最终目的是在实现将来无阶级、无国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人类真正平等、自由的共产……他是全世界的组织，各国CP统隶属于共产国际（亦即第三国际）之下，科学的共产主义是他的旗帜。

2、什么是CY？CY是信仰共产主义之青年团体，他是领导全世界被压迫的青年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青年群众，为他们自身利益而奋斗的组织，他也是全世界的组织。中国的CY就是少年共产主义的支部。

3、CP与CY的关系如何？CY是CP指导之下做青年运动的一种团体。政治运动及劳动运动CY完全是遵守CP的主张与指导而与之取一致行动。青年的文化教育以及一切经济利益的斗争是CY独立负责的工作。各国的CY都是各所在国CP下面做青年运动的一部。由此我们知道，CP和CY是有很密切关系的，其工作有些是一致、有些CY是独立的。

(二)

1、你经同志二人之介绍、支部会通过，所属上级机关审查、批准加入我们的团体。我们和你双方都是很慎重的。你第一次到支部会时，请你表示你的态度——何以加入本校？

入校后将怎样？

2、我们的章程是：工人农民入校须经过一个月的候补期，学生及职员入校须经三个月之候补期。候补期间，为特别训练及察看时间，遇必要时，可延长或缩短其候补期限，希望在候补期内特别努力，以期取得正式党员之资格。

3、在候补期间，参加支部会议，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但义务与正式党员同。

(三)

本校是革命的团体组织和纪律特别严密——军队的组织、铁的纪律，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要受团体意识的支配，不可稍存小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主义的思想 and 心理，我们不是一个研究的会社，而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所以每一个同志都须积极参加各种实际运动，为本党努力工作。兹再告诉你几件应当注意的事：

1、到会 我们的基本组织为支部，支部至少每星期开会一次，为解释章程及各项议案、研究主义政策、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传达团体消息、接受执行委员会通告命令，通过新同志的会期。你必须每次都到会，因为你如不到会，便不明白团体的状况，更不能讨论研究，定行动便疏忽了。因此革命章程定了：连续无故三次不到会者开除之，但你如有特别重大事故不能到会时，须向书记说明理由请假，书记允许后以请假论，不然也作无故不到论，又非重病及离开所在地者，亦不得连续请假三次。至于一个地方的全体大会，若有信给你，便不可不到。

2、交费 入我们的团体要赞成我们的纲领，遵守章程

和一切决议案及为团体工作，这是很明显的章程规定：党员每月要交费，这是要你每个月对于团体有点儿贡献，即此亦是表示你对团体有关系。若是无故三个月不交党费者，照章也照旧开除之（贫苦及失业者酌减或免收），月费是每月月底交，至下月的第一周交清上月的月费，统统交给支部转交执行委员会。

3、守秘密 我们在这反动万恶的政局之下，没有取得法律上的地位，不能作公开的活动，因此你在外面，无论家人父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都应绝对的守秘密！但是你要注意，我们的组织是绝对秘密的，我们的主义是公开的，你不但可以而且应向你的家人朋友宣传我们的主义的内容，但绝不可说出我们的组织来。章程定了，泄露团体秘密者开除之。

4、为党工作 我们的团体是革命的行动的团体，不是空空的一个研究什么的会社。因此我们的训练，除理论等研究训练外，尤其注意行动的训练，你此后应时时刻刻努力为团体工作，宣传，组织各种团体活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非基督教运动，介绍同志……都是你最少应该为团体作一件工作，才是实行者，才是真正共产主义者，支部之决定或书记的指挥及上级机关之命令，你都要努力的做去。总之：你的一举一动，应该统统是为一团体的、为主义的，这样才是忠实的努力的同志。章程规定了无故连续两月不为团体实际工作者，开除之。

5、读刊物 你要知道本党的一切活动，要懂得共产主义，要明白本党的政策……你须读本党的刊物，如全国大会的决议案、党报……都要详细的读阅，并在支

部会或小组会上提出讨论。章程定了，不读章程、议决案及机关报者，留于以之力密刊这察党要守处，物看严秘，万不可随便放置，团体来的信和通告也要守秘密，但是如中国青年，新青年，劳动青年，向导……便是公开的刊物，你都应该读，而且应介绍给他人看，劝别人订阅。

6、行止报告 你若离开现在的工作或学校时，你务须要报告团体或支部书记转告执行委员会，你如回来了，你要来报到。

7、迁移报告 你到别处去时，你须取得执行委员会的介绍信，然后便和那处的团体接头，你或久住那地时，要编入那地的支部（上两项如不实行时，须受留党察看之处分）。

8、活动报告 你如果要从事业一件比较重大的活动，你不可个人自由的做去，而必须经过团体的决定，经团体讨论后，认为很重要时，团体当帮你的忙，你加入别的团体时，应报告于本党。

9、发表意见 你对团体内有什么意见时，应在支部会提出，不可自由的随便在外宣传。

（四）

不要以为加入共产党是一件可夸耀的事，我们只觉得我们今后的责任更加重大了，所以我们不要自信太过，要过于相信团体，不要自高和自满，要时时存学习的心理，并再告诉你几件事，要你注意：

1、深入群众——我们的团体是代表群众利益的，是一个群众的组织，因为革命是一种群众运动，决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所以要获得群众，因此我们的一切言语、文字、

行为必须能接近群众，要无产阶级化，不要好高骛远、藐视群众。

2、不要对团体怀疑——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太恶劣了，所以团体内有些极关重要的事，是不要全体同志都知道的。这并不是团体不相信同志，因为多一个知道的人就多一点泄漏秘密的可能性，没有知道之必要的同志，当然可以不告诉他。我们要十二分的相信团体，团体告诉我们的就是我知道的，团体不告诉我的，就是我不应该知道的，也就是我没有知道之必要的。

此外，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在各种会议上，少数要绝对服从多数，在正讨论的时候，各人应尽量发表其意见，但既经决议之后，即并全体一律按照决议案执行，不容单独变更，因为我们的行动必须是一致的。

其余许多应注意的事，不能一件一件得说得尽，希望你多和集体接洽，多和同志谈话，常常到会及细读议案、章程、机关报……那末你将成为一个真正共产主义的信徒，你将成为一个共产党中的很忠实、很强健的份子。

同志，我们很热烈的欢迎你入党，很诚恳地希望你努力！

× × × × × ×

各支部书记：

在每个新同志入党之时，我们和他作一次很详尽、很诚恳、很动听的谈话，最能给他一种深刻的印象，差不多字字句句都记在他的脑海里不能忘记（这本小册子就是第一次谈话的资料。就是于第一次深刻的谈话以后不可先交给小册子）。

很郑重的交给他的，内容本来都是决议案、章程上所应有尽有，然这样的释其最关重要的几项和他详谈一次，他所得印象决非自己点点的去看一遍决议案、章程所可同日而语的，这是我们的经验，望努力执行。

忆鲁西北《抗战日报》

——抗战期间华北第一个铅 印日报的始末

翟 向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日寇沿津浦、平汉两线继续南犯，山东岌岌可危，大批平津流亡学生和山东部分爱国青年都汇集到济南。中共山东省委主持着，动员了几百人考入第三路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进行了训练，分配二百四十多人（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到聊城。中共鲁西北特委组织这支力量，与当地党的力量结合起来，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十月下旬和十一月上旬，国民党的军队和官员纷纷南逃，社会动荡不安。鲁西北特委面对这种形势，积极劝说山东第六行政区专员范筑先拒绝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命令，与共产党一起坚持鲁西北抗战。范筑先于十一月十九日在博平向蒋介石和各方发出“恭督是区，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的通电，表示誓留黄河北岸御侮抗日。特委接着向各县增派政治工作干部，建立各县政训处，加强抗战救亡活动的领导，发展党的组织和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久，鲁西北的抗日形势有了蓬勃的发展。

这年年底，鲁西北特委为适应形势的发展，把特委机关设到第六行政区政训处内，以合法的名义公开领导抗日活动。一九三八年五月，将政训处扩大改为政治部后，决定创

办政治干部学校和军事教育团，以培养大批政治、军事干部，同时决定把原政训处的油印《抗战日报》改为公开发行的铅印报纸，发行各县和各个抗日部队，向全区军民宣传党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战的主张，鼓舞人们提高胜利信心，从各方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鲁西北的抗战形势。

当时，确定了申仲铭为报社的社长，齐燕铭为总编辑。参加筹备工作的，除了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创刊的油印《抗战日报》工作的李上钊以外，又由政治部选派了办过报纸的姚第鸿、管大同、高境、吴毅和由武汉来的莫循等人参加。在光岳楼西大街路南，原来有一个承印过《东昌新闻》和中学讲义的新华印刷局，有三间门面，一部大四开平台印刷机，一副铅字比较完整的字架子，十多个工人。《抗战日报》开始由这家印刷局承印。从印刷局的门面往里，有一个小院，有十多间房子，最早的社址就选定在这里。后来，把临清汶卫印刷局的几十个工人调到聊城，还带来一部对开平台、两部四开平台印刷机，以及全部字模，找了肖学礼（堂邑人）任工长，负责印刷报纸的工作。这时，才进一步解决了自己印刷报纸的问题。

社长申仲铭，是山东阳谷县人，曾留学日本东京日本大学，参加过一九二八年一月阳谷县坡里暴动，以后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工作过。总编辑齐燕铭（齐振勋），蒙古族，北京人，一九三〇年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从一九三三年起，就在中国大学任讲师，同时任教大同中学，还在东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兼过课，写过《中国文学史略》、《中国戏剧源流》等

书，编过《文史》、《盍旦》等期刊。“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参加“新学联”，之后，一直积极领导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北平沦陷后，经济南到聊城。他学识渊博，善于为文，擅长书法，还喜爱刻印。在筹办和出版这个报纸的过程中做了很多的工作。

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四开四版的铅印《抗战日报》，作为中共鲁西北特委的机关报，正式同读者见面了。报头是齐燕铭写的，在创刊号上有齐燕铭写的代发刊词，第二天的报上有范筑先的题字“民众喉舌”（木刻），还套红印了“肃清汉奸言论，建立抗战文化”大字，整个报纸充满了抗战动员的强烈气氛。从此开始，每天印刷四千多份，靠各县和三十多个游击支队的政治机关发行到全区，其中一部分，经不同渠道发到鲁西、冀南以及大后方的武汉等地。许多身在敌后的读者，从报上了解到共产党的主张，以及鲁西北和全国的抗战形势，写信给编辑部说象在黑暗中见到一缕阳光，受到很大鼓舞。大后方的一些读者，见到在敌后出版的这张报纸，认为是不曾想到的奇迹，表示十分赞赏和热情支持。

《抗战日报》四个版的安排是：第一版为要闻版，主要刊登中央社发的有关全国抗战形势和各战场战况的新闻以及其他重要新闻；第二版为鲁西北当地新闻，报道聊城领导机关和团体的活动，以及各县各武装部队发动群众、对敌斗争的情况；第三版为副刊和专刊版。最初的副刊名字叫《万花筒》，不久改叫《鲁西北》。专刊有《妇女园地》、《儿童周刊》，九月以后又创办了《自修学校》、《军事周刊》。逢重要纪

念日和有重大事件时，还编发专页；第四版为国际新闻，大都是中央社发的电讯。社论和一些专论，也登在这个版上。

七月份，申仲铭离开报社，去战时经济设计委员会工作，齐燕铭就负责报社全面工作的领导，重点仍是编辑工作。他同时担任政治干部学校的教务长和范筑先的秘书，工作虽然很忙，仍然几乎每天到报社，同大家一起研究报纸的宣传问题，有些时候是同大家一起吃饭，边吃边谈论，顺便安排工作。他不断亲自为报纸写社论和文章，对重要的事件及时阐述鲜明的观点。还常在下午报纸开印时，到印刷车间去检阅报纸。有一次，工人把某支队司令吉占鳌（原来是土匪头子）的名字，误排成“吉占鳌”，校对未能校出，他发现后让立即改正重印，避免了一次大麻烦。他严肃、认真、细致的工作精神，多次使同志们受到深刻的教育。

编辑部的人员，算上编辑、校对、收音员，全部不过十几个人。编一版的是高境、吴弢。高境是诸城人，曾在济南《国民日报》作过编辑。后调军事教育团，由吴弢接替他的工作。吴弢是泰安人，省立三中和山东省立剧院戏剧科的学生，曾在济南《华北新闻》、《民报》和济南通讯社作过编辑、记者。编二版的是管大同、李士钊。管大同是潍县人，在济南省立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政经系，曾是济南高中“反会考”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和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到聊城后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李士钊是聊城人，上海国立专科学校师范科学生，曾任《山东日报》驻沪记者、《蔷薇》文艺月刊主编、《文艺俱乐部》月刊编委兼发行人。三版的《鲁西北》副刊，先是管大同主编，以

后是张凝（鲁西良）主编，以后又由翟咸利（翟向东）主编。

张凝是馆陶人，北平中国大学中文系学生，曾在上海《中流》文学月刊发表过小说《替》、《初选》，因为作品针贬时弊，脍炙人口，成为知名的青年作家。翟咸利是平阴人，济南育英中学的学生，曾在济南、青岛报纸上发表过一些诗和小说，主编过济南《衡报》上的《火芽》诗刊，山东文艺青年协会会员。编四版的是莫循（张昭训），夏津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到聊城前曾任长沙《观察报》记者。编《自修学校》的有政治干部学校教师巩固（原名巩俊杰，山西岢岚人，北平中国大学政经系学生）、任夷（原名任仲夷，山东冠县人，北平中国大学政经系学生）、刘子毅（安邱人，北平师范大学学生）。编《军事周刊》的是军事教育团的教育长袁仲贤（湖南长沙人，黄埔军校一期学生，红军干部。编《妇女园地》的是丁子玉（女，山东清平县人，北平大学女子理学院学生）。做校对工作的有薛润生（阳谷人，山东省立第四职业学校学生）、杜光周（聊城人，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生）、刘金鹿（聊城人，省立二中学生），收音员是靳经之（堂邑人，省立二中学生，政干校第一期学员）。

为了在报上普遍反映鲁西北各县和各部队的情况，也为了团结广大新闻、文化工作者，在筹备创刊的时候，就决定了以《抗战日报》为中心，建立鲁西北通讯网。相邻的冀南这时也正建立抗日根据地，经与冀南新闻界的同志商量，决定成立冀鲁青年记者服务团。由《抗战日报》的几个同志发起，于五月十三日在聊城举行了成立大会，通过了工作纲领和组织章程，选举了李士钊为团长，解树椿、吴弢、莫循等

分任学术、联络、组织部长。会后，在聊城开展了各种活动，如组织保卫徐州的时事讨论会，保卫大武汉的时事讨论会，倡导聊城各界联合组织服务团到濮县战地服务。随后，冠县、莘县、濮县、茌平等二十几个县陆续建立了青年记者团支部。报纸的地方稿件因此有了充足的来源。记者团还于九月一日出版了十六开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综合性的月刊《战地文化》，于十月出版了三十二开本的通俗宣传救亡知识的《战线》旬刊。前者出了三期，每期印两千份，后者出了四期，开始印两千份，后来印三千份。在冀南的南宫，石印《平原日报》的同志进行筹备之后，于十月二十九日在南宫举行了冀鲁青年记者服务团分团成立大会，到十一月初，冀南有十五个县建立了支部，《抗战日报》上随之增加了南宫等县的新闻。

七月底，报社迁至光岳楼南大街路西十一号（原僧格林沁祠，光岳楼小学）大院，与楼西街原社址一墙相隔。编辑部、电台（建制归第六区司令部）、印刷厂都在这个大院办公，发行部在东门大街中华书局旧址。大家团结一致，紧张地工作，编辑也作记者，外出采访。如李士钊曾以随军记者名义，参加了濮县战役，写了《濮县石墓头的伏袭》，吴弢随范筑先去威县与徐向前会晤时，写了《徐向前将军印象记》，翟向东去长清、肥城、平阴交界的大峰山根据地，写了《大峰山巡礼》等等。莫循、李士钊还兼任政干校教员。鲁西良、翟向东一面编报，一面都还写了些文艺作品，分别在副刊或《战地文化》、《战线》上发表。电台除了抄收电讯，还收听苏联伯力电台的华语广播。遇有恶劣天气，抄收都要克服很大困难。有时不

不得登启事，说明“昨日阴雨，天电过大，所收消息无多，敬希读者原谅”。印刷厂的老五号铅字用久了，有些字印出后缺胳膊少腿，工人想法尽量延长铅字的寿命，后来有了铸字机，情况才比较好起来。尽管有许多困难，大家都因为参加了出版这张敌后报纸的工作，感到十分光荣，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

《抗战日报》从创刊开始，就积极宣传党关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坚持抗战的主张。鉴于范筑先掌握着鲁西北政权，富有爱国思想，不满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人也正直，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七七”事变前夕，周恩来同志就派彭雪枫到聊城，指示党组织要看到鲁西北的重要战略地位，倘若中日战争爆发，要争取范筑先同我们党合作抗战。范筑先拒绝韩复榘让南撤的命令后，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亲自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写信，表示了对共产党的崇敬和信赖，同时任命了共产党员到十几个县任县长，还派出一些干部到延安学习。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等不事抗战，反造谣诽谤范筑先和鲁西北根据地，挑拨范筑先与我们党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报纸不断报道了范筑先领导鲁西北军民抗战、深受群众拥护的情况。六月中旬，范筑先到威县同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会晤，受到了徐向前等八路军领导人和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范此行在许多方面深受启发，更加崇信共产党。报上报道了他和徐向前的讲话，并报道了他回聊城时干部群众倾城出动欢迎的盛况。九月二十三日，范又去南宫参加冀鲁联防会议。当时，河北、山东的国民党省主席鹿钟麟和沈鸿烈奉蒋介石的命令，正妄图将八路军挤

出冀南，改编范筑先领导的部队，范筑先在会上站在我党一方，义正辞严地抨击了鹿、沈。他回聊城后，主持召开了军政联席会，通过了第六区抗战行动纲领，旗帜鲜明地要在鲁西北实行共产党的十大救国纲领。报纸对这些，都以显著地位进行了报道。

当时与延安的联系是困难的。鲁西北特委曾于一月间派成润去延安，到西安后带回朱德代表党中央给范筑先的信。三月间，又派张郁光等去武汉，向周恩来同志汇报鲁西北的情况，回聊城后详细传达了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同志对鲁西北工作的指示。当时，凡有从延安来的人，带来党中央领导人的文章，报纸就及时登载。如收到毛主席写的《反对自由主义》后，很快在报上发表。有一次，从延安来的同志谈到抗大、陕公七千同学的联欢大会，毛主席和罗瑞卿都去讲了话。毛主席还带领人们高呼：“最后胜利是我们的，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我们立即在《鲁西北》副刊上作了详细介绍。^{*}十月间，黎玉和张经武过聊城去山东沂蒙地区，带来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我们也及时翻印。总之，当时是尽量把延安的情况，把共产党、毛主席的声音传达给鲁西北人民。

报上还不断揭露敌人，宣传我们的胜利。除了刊登揭露敌人到处烧杀奸掠等残暴行为的新闻之外，还刊登一些通讯，如《今日白山黑水间》、《日寇暴行目击记》、《日寇统治下的济南》（敬萱）、《陷后的平阴》（黄河）等，把敌人在占领区的罪行告诉人们，激发人们对敌人的仇恨。鲁西北一年多的时间内，同敌人进行大小战斗近百次，如梁水镇战斗、南镇战斗、界牌战斗、范县战斗、东阿战斗、七里堂战

斗、濮县战役和济南战役，都分别在油印的和铅印的《抗战日报》上进行了宣传报道。为了保卫大武汉，范筑先曾指挥部队于“八·一三”、“九·一八”两度进袭济南，破坏津浦路。范的次子范树民任青年挺进大队队长，在齐河坡赵庄作战时牺牲，范又命令二十岁的次女范树琨继任大队长，坚持对敌斗争。《抗战日报》报道了这次作战，《战地文化》上发表了张凝的报告文学《东征》。另外，还介绍了敌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如报道了冀东十二县反日大暴动和冀中、冀南、山东根据地的创建。广大群众了解了鲁西北的抗战不是孤立的，抗战意志越来越坚强。

副刊和各个专刊，针对当时的斗争，发表了不少评论，提高人们的认识，鼓舞人们的抗战热情。如《鲁西北》副刊上，发表了《保护民众救亡团体》（冷克）、《反对包而不办》、《要求彻底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劲秋）等驳斥破坏抗战言论的杂文，还有一些具有战斗性的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配合纪念“七一”、“九·一八”、“双十节”和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以及民先冀鲁边区总部的成立，都编发了专页；《自修学校》专刊设了“抗战救亡理论”、“社会科学讲座”、“青年修养”、“每周时评”等专栏，任夷、刘子毅等都写了不少文章；《军事周刊》上，介绍了斯大林论红军的特点、敌军的优点与弱点，以及游击作战的各种常识等等。

七月下旬，我们的朋友、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卡尔逊从延安出发，经晋绥、晋察冀、冀中、冀南到聊城，刘白羽、欧阳山尊等奉毛主席指示一路陪同。我们把《抗战日

报》的合订本送给卡尔逊一套。也送给刘白羽、欧阳山尊他们（当时叫延安文艺工作组）一套，请他们带回延安。欧阳山尊当时认为《抗战日报》设备和人员配备都不错，是华北敌后第一个铅印日报，如能把这份报纸带到延安和国外，都是最好的历史材料。

在长沙出版的范长江主编的《新闻记者》月刊（中国青年记者协会机关刊物），于十一月份专门登了一篇《敌人后方的报纸》。文中说：“忽然接到一份从敌人后方来的、七月三日出版的报纸，山东沦陷已经快要半年多了，居然还有我们的报纸在敌人后方出版，这可以说明那里的报人在配合广大游击队在作战。报的名字叫《抗战日报》。四开版，社址在聊城”，“有收音机收电讯，居然还有一副完整的字架子”，“《鲁西北》副刊多到每天有三、四千字，本来很不容易编，然而也有很踊跃的来稿，一切写作都还在水平以上，这真是难得的事了”，“从报上的启事看到，那些在敌人后方的同业，不单是出版报纸而已，还在作战地服务”，“令人非常惋惜的是，那些同业竟未曾附一封信来，谈谈他们怎样在敌人后方办报，或有什么困难”，“我们佩服这种‘办游击报’的精神，更希望多发现一些。也许将来这些报纸的价值，在伦敦、在巴黎都将以英镑、法郎来交换呢。这是我们伟大斗争的最实在的记录。”

《抗战日报》和《战地文化》，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登过不少重要文章，如在保卫大武汉时，转登过叶剑英的《论目前战局——注意敌人沿江跃进》，和徐向前的《论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等。《抗战日报》为及时引导人们正确

认识形势，发表过不少社论，如《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咆哮了的鲁西北》、《对放弃武汉应有的认识》、《论广州失陷》等等。在了解敌人有回师“扫荡”敌后的动向后，连续发表了《论肃清太平景象》、《再论肃清太平景象》、《论发动拆城》、《再论发动拆城》等社论，一再号召警惕日寇“扫荡”鲁西北，要做好迎击敌人的充分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随后，连续报道了从南宫获悉敌人增加华北兵力，企图“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敌机频繁轰炸南宫，也报道了东阿之敌企图渡黄河北犯，告诉人们局势开始紧张，战斗准备已刻不容缓了。

当聊城的领导机关和各单位正准备转移到冠县、莘县、朝城边界，报社也正准备搬往冠县农村的时候，十一月十三日，日军一一四师团千叶联队平田大队，从东阿渡过黄河，配以飞机，进攻聊城。各机关、团体撤出，范筑先率一部分部队守城，让他的参谋长王金祥出城调动部队配合，但王金祥拥兵不救，范筑先率部与敌人血战竟日，终因寡不敌众，于十五日壮烈殉国。聊城随被日寇占领，整个鲁西北形势因此发生重大变化。

十一月十五日这天，齐燕铭和李士钊、翟向东以及《抗战日报》社其他一部分同志，到达了莘县县城，县长吕世隆（共产党员）表示提供一切条件，支持《抗战日报》在莘县继续出版。没有料到，十六日晚，吕世隆同志竟遭到莘县地方顽固势力的杀害。齐燕铭险些同时遇难，脱险后又同李士钊、翟向东等一起到冠县，找到了从聊城直接到冠县的莫循，按照特委的指示，出了两份油印的《抗战日报》号外，

一是公布了《告全区人民书》，颂扬了范筑先司令为民族解放英勇献身的精神，号召继承范的遗志，坚持团结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一是报道了“莘县事件”，揭露了顽固势力杀害吕世隆的罪行，指出他们做了亲痛仇快的事情，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至此，在华北敌后出版的第一个铅印日报——鲁西北《抗战日报》，作为中共鲁西北特委机关报，在长达七个多月的时间里，共出了二百一十多期，宣传了党的主张，鼓舞和发动了群众，揭露和打击了敌人，推动各方面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在创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到现在，许多当时在鲁西北工作、战斗过的同志，当回忆起抗战初期的战斗岁月时，总是不断谈到《抗战日报》对自己的影响，表露怀念之情。

《山东人》——抗战头年 聊城第一份抗日油印小报

孙 思 白

张维翰同志《忆民族英雄范筑先》一文的第五节头段说了一件事：“一九三七年十月，党首先在聊城办起油印的报纸《山东人》，以后又创办了由齐燕铭主编的《抗战日报》。”（见《光岳春秋》第133页）。《山东人》这份油印小报存在时间不长，在聊城地区工作过的老同志对《抗战日报》都熟悉，对这份小报的印象大半会不深了。但它算那个时代聊城出现的第一份小报，发端甚微，却还值得一记，至少可作张维翰同志那句话的一个注脚。

范司令自齐河班师，我们这批政治服务员于十月二十二日都重回到聊城，住在东门里路北一个大院里等待分派工作。这时邮路阻滞，外边报纸寄不到，专署总政训处（政治部）的工作也还没展开；大家关心时事，但听不到消息：一天忘记是哪位政治干事传达政训处秘书姚第鸿同志的意见，

说“约几个人办份壁报。”他找到我，我约了许法同志等三几个人，接受了这个任务。每天早上我们到长途电话局收听和记录新闻广播，回来以后，把收听的消息，写成大幅壁报，贴在大院里的墙上，供服务员同志们看。这样的壁报办了有十多天（记得最后一张壁报是报导上海我军撤防）。

我们几人商量，觉得如改成一张油印报，岂不更好？第鸿同志当然同意。于是我们弄到一架油印机，并正式组织编辑部。除许法和我以外又有三两人参加，共有五、六人。现在能记得的只有郭鸿俊（后牺牲在鲁南）、莎寨（王溪）两位同志了。第一次编辑会大家对报名想了好几个，如“烽火”、“血花”、“挺进”等等；我提议用“山东人”，大家同意了。为什么采用这样一个报名呢？因为到聊城后刁鸿德（现名邵子言）同志主持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为了易于动员群众可以先从“保卫家乡”提起，再引导到抗日。采取这个名称是从“保卫家乡”的含义引伸出来的。编辑会作了粗略的分工，大家推我当了主编，内容计划有时事、社论、副刊等。为了把油印报散发到街头上供群众看，决定把收听的新闻稿尽可能改成当地通俗的方言来传播。这样决定后，工作就开始了。当时收音机不普遍，照例每早到长途电话局去收听和记录新闻，负责这件事的主要是许法同志，有时去几个人。大家没学过速记，记不完整，由几个人根据各人记录互相补充。几天后，大家自己编制了一套简单符号来代替常出现词语。如“敌军”用“××”；“飞机”用“✕”；“大炮”用“∅”；“投弹”用“↑”；“包围”用“○”；“出击”用“↑”；“撤退”用“↓”；如此等等，提高了记录的速度与准确性。

收听回来就吃早饭了：早饭过后，大家就分头用方言译改；也有的准备副刊稿子，准备其他杂项，总是大家都动手。我负责每天写一篇几百字的社论，有时前一晚上就写好。大家讨论。内容是连续地阐明抗战必胜的道理。刻腊版

的事，又多半是由许法承担，他刻的蜡版又快又好，字迹俊秀工整，我们称他是“我们大众的钢板手”。报头和版面上，还增添上艺术的花边，这些工作准备完，差不多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午饭后并不休息就动手印刷了。开始印两百份，后来三百份、四百份，再多印蜡版就承担不住了。约在下午三时左右，就由其他同志帮着到街上散发去了，于是我们编辑部的同志们，洗洗手，在紧张大半天后，休息一下。天天的生活是这样，大家虽紧张而都很快活。

记得当第一次、第一张小报印出之后，我们自己欣赏着版面，十分高兴，那心情也许可以与产妇乍看到自己生出的婴儿相比。后来，每当报纸拿出去，见到街头的人争着要看《山东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互相流露着会心的微笑。

几天之后，编辑部同志们，觉得晚上的时间，还可干点事。于是晚饭后，大家在油灯下，分头为副刊写点短文，又想到编写点抗战歌曲。我们几个山东人，会哼哼几支山东小调，请懂乐谱的同志，把几支小调的谱子记录下来，我们依谱填词。首先是把《绣花灯》的“十二个月”填完。现在还记得的有“十个月”（简谱附后）如下：

（1）正月里来正月正。“一二八”，鬼子炮打吴淞。十九路军真英勇，奋起抗战杀敌兵，奋起抗战杀敌兵；嗯暖咳哟，蔡廷锴将军远近闻名——闻名。

（2）二月里来龙抬头。日本财阀发了愁，生产过剩无处卖，派出浪人把私走，派出浪人把私走；嗯暖咳哟，侮辱我们关员把税偷——税偷。

（3）四月里来樱花开。傀儡溥仪锣鼓登台。日本鬼子

要得乖，改国号，换年代，改国号、换年代；嗯暖咳哟，堂堂“皇帝”当了奴才——奴才。

（4）五月里来是五三。日本鬼子炮轰济南。杀我军民成千上万，还杀了我国的外交官，还杀了我国的外交官，嗯暖咳哟，国仇不报心不甘——不甘。

（5）六月里来高粱深。关东三省起了义勇军。男女老幼齐心干，高山密林杀敌人，高山密林杀敌人，嗯暖咳哟，日本天皇睡不安神——安神。

（6）七月里来热腾腾。日本鬼要占宛平城，芦沟桥上起了炮火，军民抗战第一声，军民抗战第一声；嗯暖咳哟，赶不走日寇誓不收兵——收兵。

（7）八月里来八一三，长江口上炮火连天。全面抗战开始了，四亿人民齐向前，四亿人民齐向前；嗯暖咳哟，把敌人消灭在黄埔滩——埔滩。

（8）九月里来“九一八”，东北人民亡国又亡家。不抵抗政策教训大，下定决心把敌杀，下定决心把敌杀；嗯暖咳哟，再不要当那样大傻瓜——傻瓜。

（9）十月里来把棉衣穿，八路军大战平型关。游击战术真巧妙，杀死鬼子整三千，杀死鬼子整三千；嗯暖咳哟，从此威名传遍中原——中原。

（10）腊月里来数九隆冬，北平学生大游行。呼吁政府来抗战，不怕大刀和水龙，不怕大刀和水龙；嗯暖咳哟，掀起了救亡的大暴风——暴风。

其简谱如后：

2/4 绣花灯调

5 32 | 5 32 | 12 32 | 3 1. |
十月里来把棉衣穿,

1.2 3 | 2 1 | 21 6 | 5 - |
八路军大战平型关,

1 65 | 1 65 | 1 35 | 6 0 |
游击战术打得妙,

23 21 | 61 5 | 23 21 |
杀死鬼子整三千, 杀死鬼子

61 5 | 1.6. 12 | 12 3 |
整三千. 嗯喂唉哟从此

2 1 | 21 6 | 5 - | 65 0 ||
威名传遍中原! 中原!

这篇小调歌曲一印出，姚第鸿同志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他桌上摆着几天来的《山东人》，和这份专刊的《绣花灯》，连连说“很好，很好”，勉励我们继续干。于是我们又利用晚上时间，继续填写民间小调歌曲。我们续出的有《薄仪坐宫叹》、《老殷训子》（殷汝耕挨他爸爸的责骂）、《张庆余反正》（当时传开的通县反正部队）等等。当时，聊城街头上渐渐听到有人唱起这些小调来了。

随后，我和许法同志被派去寿张县工作（到寿张后，我们另创刊《老乡》小报），留在聊城的莎寨、郭鸿俊等同志继续出这份小报。到什么时候，这份油印小报由铅印的《抗战日报》所代替，我记不清了。估计它存在了约有两个多月左右的时间。

抗日战争前期我区 创办的部分报刊

陈坤林整理

抗日战争暴发之后，为了宣传抗日主张，教育和鼓舞人民奋勇抗日，在党组织的热心关怀和领导下，我区先后创办了许多报刊。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党在聊城创办了三日刊《山东人》。这是政训处的机关报，由孙兴诗（思白）和许法负责主编。十一月，共产党员管大同在寿张主持创办了油印报《响导》。十二月中旬，《抗战日报》创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至一九三八年一月下旬，该报由黄白莹主编。日出一百份（油印）。一九三八年一月下旬到四月底由李士钊任编辑，严树勋负责印刷和发行，日出二百份（油印）。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抗战日报》改为四开铅印版，日出六千份。是中共鲁西北特委机关报。社长申仲铭，总编辑齐燕铭。一九三八年一月，寿张“同学抗敌会”出刊了《同学抗敌会报》和《寿张抗敌日报》。四月五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鲁西北分队部创办机关报《先锋月刊》，编辑人是徐少岩和吴鸿渐，每期发五百份。五月，在濮县战役的前方出版了《行军日报》，是油印日刊。八月该报又在齐河潘店前方政治部出版。由连守亮、杨小泉负责编辑。同时，临清版出了八开铅印日报

《力报》，第十支队出版四开石印《冲锋日报》。七月，政治干部学校印刷部成立。由莫循任主任，齐燕铭为总编辑。曾翻印《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工作手册等三十余种。九月七日，冀鲁青年记者团创办机关刊物《战地文化》半月刊。编辑为丁子玉、管大同、莫循、李士钊、许法、吴韬等，曾登载过叶剑英、徐向前等同志的军事论著。同月，青年记者团还创办了《战线旬刊》，主编是王今然、许法。上述两种刊物都只出了三期。十二月，观城出版油印刊物《战旗》，后因印刷器材困难而停刊。

一九三九年一月博平县委为宣传发动抗日，出版了八开油印小报《出路》，区委负责人李运强写了发刊词。这一不定期刊物，只出版了三、四期，后因条件所迫而停刊。

为了更广泛深入地宣传抗日主张，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其中对报刊工作又作了具体指示：……（二）从中央局起一直到省委、区党委以至比较带有独立性的地委、中心县委止，均应出版报纸。党委与宣传部均应以编辑、出版、发行地方报纸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各中央局、区党委、省委应运用各种方法建立自己的印刷所（区党委与省委力求设立铅字机），以出版地方报纸、翻印中共党报及书籍小册子。在不能设立铅印机时，即石印、油印亦极重要。（三）应设法经过自己的同志与同情者，以很大坚持性争取对于某种公开刊物与出版发行机关的影响。对于同志与同情者领导下或影响下的公开刊物与出版发行机关应给以经常的帮助，但应以力求持久、

不以一时的痛快为基本方针。同时应推动社会上有声望地位的人出版一定的刊物，有我们从旁给以人力和材料的帮助。

.....

在中央这一文件精神指导下，一九三九年七月博平县委出版发行了八开油印小报《前哨》，县委宣传部长王家俊负责编稿刻版，李多强印发。《前哨》为五日刊，主要是宣传抗日，报导各支部的活动情况，发至当时县内的十四个分区委。该刊共办了六十多期。

一九四〇年十月日本反战人士水野三古夫、本桥明治编辑反战小报《战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恶，号召日本士兵反战。

为了响应中共中央创办报刊加强宣传工作的指示，仅一九四一年在鲁西北地区创办的还有《卫河日报》、《卫东日报》、《鲁西北抗敌日报》、《鲁西北日报》等，鲁西北各县也创办一些报刊，如博平县委为加强党员教育，在一九四一年春，创办了地下刊物《慈航普渡》，等等。

上述报刊的创办，广泛地宣传了抗日主张，启发了广大群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在教育党员、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抗日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鲁西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斗

号角——《抗战日报》

——记中共鲁西北地委机

关报《抗战日报》

刘立平 梁毅民 张肇村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聊城失守后，鲁西北各县城相继沦陷，在聊城出版的中共鲁西特委机关报《抗战日报》也随之停刊。我地县各级党政群机关转移到农村，特别是在各县之间的边缘地带活动。鲁西北的抗战形势，出现了敌占城镇，我在农村，敌我斗争犬牙交错的局面。为了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建立鲁西北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党需要有一个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激发群众抗战热情的宣传工具；在紧张艰苦的斗争生活里，广大军民希望有一份交流斗争经验，传播胜利消息的报纸。当时地县两级只有冠县出版了一份油印的《前线日报》，它是中共冠县县委的机关报。不论从报导内容上还是从发行数量上，它都不能适应整个地区的斗争形势，也远远满足不了广大抗日军民的需要。为此中共鲁西北地委于一九三九年秋季决定创办一份报纸，沿用一九三八年聊城时期《抗战日报》的名称和报头题字。

报社筹建情况

聊城时期的《抗战日报》是铅印报纸，它的印刷设备、所有器材不在我们手下，编采干部全都调走；印刷人员早已星散。在人力物力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一份报纸是很不容易的。开始地委决定抽调孙仰周、崔杨、黑若仙、田横等同志负责筹备工作。同时决定合并冠县的《前线日报》，将其工作人员王乃平（现名陈乃东）朱广林（原名朱冠富）张肇村（原名张希春）刘立平（原名刘镇藩）调来《抗战日报》社。没有印刷设备怎么办？经冠县抗日政府动员马孟村的宋虎臣同志，将他战前开设文奎书局时保存下来的石印机、铅字模等设备贡献出来，并由他动员一部分技术工人和写版人员，加上《前线日报》合并时带来的一部交流收音机、一台油印机，这才具有了印刷、收音、缮字等条件。经过紧张的筹备，一九三九年冬报社正式成立，第一张石印的圆开四版《抗战日报》与鲁西北广大军民见面了。在敌后游击环境下，广大军民对全国抗战形势了解很少，耳目闭塞，消息不灵，《抗战日报》一旦与群众见面，就受到热情的欢迎，接到报纸争相传阅，它确实成了鲁西北党的喉舌，宣传抗日救国的战斗武器，鼓舞群众斗志的工具。虽然办报的条件差，困难大，报纸水平不高，但是通过综述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传播各地军民抗击敌人的胜利消息，都发挥了一定的战斗号角作用。在艰苦的平原游击战争环境里，石印的《抗战日报》出版，本身就是一件激动人心的新闻。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党中央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三同志联名发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同年五月刘少奇同志对鲁西

北工作三项指示中，又指出：鲁西北党组织的一个重要实践任务，就是把平原游击战争坚持下来。石印《抗战日报》的出版，不正说明鲁西北平原游击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游击根据地的建立越来越巩固吗？

报社的人员组织是这样的，社长兼总编辑孙仰周，副总编黑若仙，副社长王乃平，编辑崔杨，记者朱广林、张肇村、刘立平、张君英等，出版印刷有宋虎臣，发行兼总务田横。负责写版的有郝敬堂、张希安，从莘县抗日政府调来了梁毅民同志，另外还有刘导生（后投敌当汉奸，被我政府镇压）。印刷队伍是由宋虎臣同志聘请的技术工人和其家乡一带的青年组成，

在游击战争环境里办报，一无稳定的后方作依托，二无城市的物资供应作基础。敌人经常出来“扫荡”奔袭、骚扰。报社一面要对付敌人的封锁“扫荡”，一面要采访、收音、编报、出版印刷，环境恶劣，困难很大。报社经常活动在莘、冠边境和朝北一带，如冠县的小张庄、白佛头，莘县的靖庄，朝北的苗头、尧头等地，敌人“扫荡”白天和敌人周旋，夜晚在油灯下写稿编报。敌人奔袭，便立即转移。不能集体活动，便分散活动；不能公开活动，便隐蔽活动。平时规定有秘密的集合地点，还有敌情大家按预定的时间和地点集中。如果第一集合地点不能使用，便到第二集合地点集中。大家分散集中机动灵活。石印机设备笨重不易转移，开始仍在宋虎臣同志原藉马玉村，该村是接敌区不够安全，也转移到朝北一带，依靠住村党支部和民兵自卫队掩护，挖地下室隐蔽工作，迁到敌人大规模“扫荡”，就埋在地下，报社人员

随地委、军分区机关转移。报纸虽然名为“日报”，在当时环境下，不可能每天定期出版，实际上是五日刊或周刊。

坚持党的领导 依靠人民群众

在那样艰苦环境下，《抗战日报》能够坚持出版，关键在于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和地县各部门的大力支持。

首先是地委、专署领导同志的热情关怀，具体指导，帮助克服困难，专员王笑一同志多次来报社，指示报导方向，提出采访线索，有时还亲自研究修改社论文章。

其次是广大群众高度警惕，热情掩护，千方百计保证安全。报社居住过的各个村庄，党支部、民兵、自卫队和广大基本群众，为报社的安全保守秘密，封锁消息，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昼夜巡逻，费尽心力，使报社始终没有遭受大的破坏。

其三，地、县、区各级党、政、军、民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对报社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关心爱护，帮助采访，提供线索，掩护外勤记者的活动，解决食宿困难，都尽了最大努力，为报纸正常出版创造了有利条件。有些党政领导同志还在百忙中亲自动手为报纸撰稿。如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鲍廷干、冠县县委书记司洛路等同志，都多次热心为报纸写稿。他们的文章联系实际，针对性强，对指导地方的各项工作任务起到了重要作用。

报社的全体工作人员为办好这份报纸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里值得特别提到的首先是社长孙仰周同志。他为创办《抗战日报》做出了很大贡献。仰周同志是临清县卫河西张堤人（现为河北省临西县），北大学生，一九三八年为我党派往范筑先将军民的军第一路政治部任宣传科长，民

军第一路叛变后，他和其他八名共产党员撤回八路军筑先纵队工作。仰周同志在报社既是党政领导人，负责全面工作，又兼总编排版工作。不管白天敌人怎样疯狂“扫荡”，晚上他都要坚持工作到深夜，他常说：“敌人不放松‘扫荡’，我们不放松工作。”他工作积极，艰苦朴素，关心同志，平易近人，受到全体报社人员的尊敬和爱戴。副总编黑若仙同志，是抗战前的老党员，她工作踏实，埋头苦干，积极学习，知识渊博，对青年同志热情帮助，诲人不倦，在报社享有很高的威信。记者朱广林同志博学多闻，善于言辞，知识面广，记忆力强，在领导机关人事关系熟有活动能力，他到领导机关采访，很适合他的特点，能发挥他的特长。

《抗战日报》能够在敌人实行“经济封锁”，我们物资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出版，是与宋虎臣同志的贡献分不开的。他把自己的产业石印机贡献出来，并聘请动员写版人员技术工人。他利用过去开书局的商业交往关系，从敌占区采购石印印刷物资，保证了报纸的正常出版。报社的其他同志，不管是到各县担负采访任务的外勤记者，维修管理收音机抄收记录新闻的同志，夜以继日伏案工作，写版排版的同志，负责后勤供应食宿管理的同志以及负责发行、印刷出版的同志等等，他们都含辛茹苦，积极工作，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为报纸的出版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总之，当时报社的同志们，从领导到群众从编辑到工人，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不怕困难，不避艰险，领导帮助群众，同志互相帮助，同心同德，努力工作，共同为办好《抗战日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宣传群众、动员群众、鼓舞群众斗争的武器。

《抗战日报》是石印四开四版，五至七日不定期出版，每期发行三百至五百份，最多达到一千多份。版面没有严格划分国际版国内版地方新闻及文艺副刊等，因为稿件来源渠道不多，编辑人手有限，只能根据组稿情况临时确定版面安排。地委专署明确报导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宣传党和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方针、政策、法令、施政纲领；报导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消息；综述全国抗战形势；鼓舞根据地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决心等。稿件来源主要有四个渠道：一是转载陕北《解放日报》等中央报刊的文章材料（因由地下交通传送文件，多不及时）；二是由收音机接受抄录一部分全国抗战形势的新闻（当时只有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记录新闻要经过分析整理才能登载）；三是依靠自己记者采访的新闻，包括根据地的建设，当时的工作任务以及反扫荡斗争的消息；四是一部分地县党政群机关的领导同志为报纸撰稿。

1939年汪精卫发表艳电投降日寇，国民党反动派出现了投降暗流，蒋介石派出一批杂牌军到华北敌后制造“磨擦”，不打日寇，专与我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作对。蒋介石还秘密发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破坏抗战，进攻根据地。我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号召。党中央还提出了对待顽固派的严正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抗战日报》及时的宣传了党的上述号召，揭露各地的叛军顽军进攻根据地，破坏抗战的阴谋。连续报导了讨伐石友三的几次战役，同时还报导了其他根据地

反击叛军孙良诚、庞炳勋以及高树勋、鹿钟麟等的破坏阴谋活动。

1940年报纸连续报导我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百团大战”的胜利消息。“百团大战”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人民，在华北各铁路沿线，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百团大战”的胜利震惊全国，不仅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而且遏止了国内存在的妥协投降暗流，狠狠打击了日寇蚕食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

“百团大战”的节节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鲁西北广大军民的抗战斗志，充分显示了我党领导的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实力，从而奠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与决心。

1940年党中央发出了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指示，《抗战日报》连续报导了鲁西北各县、区政权建设的消息，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建地方政权实行“三三”制的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产阶级开明绅士占三分之一）。例如，我们报导了冠县在桑阿镇段庄召开全县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马景汉同志任冠县抗日政府县长，这是鲁西北地区第一个通过民主选举建立的抗日政府。

《抗战日报》还大力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政府的法令政纲以及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主要报导的方面如：发动群众挖“抗日沟”，破袭敌占区的交通线、电话线；开展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发展生产，克服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开展拥军优属活动，抬担架运军粮支援前线，慰问八路军伤病员。在边沿区号召群众抢收抢种，坚壁清野，反资敌，反对

敌人的“三光”（烧光、抢光、杀光）政策，夺取反扫荡斗争的胜利等。

《抗战日报》多次报导我八路军和地方武装的战斗胜利消息，如莘县富余集战斗、魏二庄战斗、耿楼战斗等，1940年筑先纵队解决冠县六、八区封顽地主武装的候二寨、大柳邵战斗，还连续报导驱逐石友三、高树勋、孙良诚等叛军顽军的讨伐战役等。

1941年1月专页报导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华南发生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妄图消灭华南新四军的阴谋。

以上仅是从大的方面宣传报导的主要内容，因游击环境，报纸无法保存，没有文字资料，仅凭回忆记述。

《抗战日报》停刊与《鲁西日报》合并

一九四〇年，中共鲁西区党委机关报《鲁西日报》创刊。一九四一年春区党委决定撤销地方报纸，集中人力物力办好《鲁西日报》。一九四一年三月间，《鲁西日报》社派负责人姚天纵同志来鲁西北接收《抗战日报》社工作，孙仰周同志向全体工作人员作了动员，并经地委批准决定：孙仰周、王乃平、刘立平、崔杨、田横、宋虎臣等同志调《鲁西日报》社。黑若仙、张肇村、朱广林、梁毅民等同志留地方另行分配工作。石印机等设备随人员调走，另行安排用场。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鲁西区党委和冀鲁豫区党委合并。两个区党委的机关报《鲁西日报》和《卫河日报》合并，改称《冀鲁豫日报》。不久，孙仰周同志调

往文化出版社任社长，宋虎臣同志连同石印机调往边区银行，田横、刘立平、王乃平一直在《冀鲁豫日报》社工作。

石印的《抗战日报》从一九三九年冬创刊，到一九四一年春停刊，共出版六十至七十期。在艰苦创建鲁西北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它伴随着英勇抗战的鲁西北军民，渡过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给鲁西北军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岁月易逝，转眼已是四十三年，昔日一手握枪一手拿笔并肩战斗的老同志多已物故。孙仰周同志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日寇对我濮、范、观进行“铁壁合围”时，壮烈牺牲在范县马寇村。黑若仙同志在最艰苦的岁月，最艰苦的地方，坚持工作，因劳致疾，于一九四三年便离开了我们。崔杨同志、田横同志在十年动乱中，死于非命。朱广林同志也因劳致疾，于一九七三年离开了人间。抚今追昔，对他们无限怀念。我们怀着肃穆的心情，附笔致意，以示悼念。

聊城地区抗日战争前的学生运动概况

吕保明整理

聊城地区今辖各县，是由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国民党山东省第四区的高唐、清平县和馆陶、临清县卫运河以东地区；第六区的博平、茌平、阳谷、朝城、莘县、冠县、堂邑、聊城县和寿张、范县、濮县的黄河金堤以北地区；和第一区的东阿、平阴县的黄河以西以北地区组成（上述地区在一九三五年底以前隶属山东省东临道）。东南临黄河，与泰安、荷泽地区为邻，东面北面同德州地区接壤，西靠卫运河，与河北省邯郸、邢台地区相望。全区有七千三百五十八个自然村，新旧县城十七处，面积八千五百九十平方公里。我区是我国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远在周朝以前就已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地势较为平缓，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在抗日战争以前，由于历代封建地主阶级长期压迫、掠夺，各帝国主义侵占、摧残，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剥削，造成政治、经济的落后局面，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贫困，尤其是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不甚发达。当时，全区仅有山东省第二中学（设在聊城）、第十一中学（设在临清）、第三师范（设在聊城）、第八乡村师范（设在寿

张)、第三职业学校(设在阳谷安乐镇)、两处县联立乡师(临清、邱县、馆陶、清平、夏津、冠县六县联立和范县、濮县、朝城三县联立乡师)、十六处师范讲习所,六、七十处高级小学和一处山东省棉业讲习所(设在临清)。各学校师生较少,设备又差。这些学校被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把持着,利用教育阵地,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法西斯专政的反动教育,使教育为其政治服务,成为统治压迫人民的工具。

聊城地区广大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南方革命高潮的影响带动下,一九二五年秋,山东省第二中学、第三师范的学生王寅生、赵以政、孙大安、聂子政等四、五十人,先后奔赴广州进入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技术。王寅生、赵以政等同志在南方学习或工作期间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暑假,山东省第二中学学生赵儒昌(现名赵亮,原临清县赵圈村人)由山东省第一师范学生张干民(原名张存礼,现名赵文栋,原临清县李圈村人)介绍加入共青团次年秋转为共产党员。一九二六年冬,山东省第三师范学生张廷焕(字文蔚,原清平县马张村人)在济南由山东省第一师范学生李思孝介绍加入共产党,次年春初,和同学李成连(字建华,夏津县珠泉屯村人)在三师负责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九二七年秋,在南方工作和在外地读书的王寅生、赵以政、孙大安、聂子政、郭庆江、杨耕心等同志根据党组织指示返回聊城一带工作,首先在山东省第二中学、第三师范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并建立了党团组织。同时,由聂子政在堂邑县北周店、凤凰集一带,郭庆江在博平县

袁楼发展一批党员，建立组织。是年十月中旬，中共山东省委派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张干民来聊城，成立中共鲁西（又称东昌）县委，由张干民任县委书记。从此，聊城地区青年学生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一党专政卖国求荣的学生运动，在聊城地方党组织领导下，有针对性的时高时低，不间断地向反动的统治阶级冲击着。在反侵略、反压迫的学生运动中，在范县三县联立师范、临清六县联立师范、东阿姜楼完小、阳谷安乐镇完小、濮县古云集完小、山东省第十一中学、冠县师范讲习所、馆陶县师范讲习所和县城关完小、先后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开展了学生运动工作。

一、开展辩论，分清革命与反革命， 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在二十年代中后期，山东省第三师范内，既有共产党组织，又有国民党组织。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国民党汪精卫政府公开叛变革命后，两党开始相互攻击。三师共产党组织为了澄清，是共产党破坏了国共合作，还是国民党破坏了国共合作和北伐革命。是年八、九月间，在该校大饭厅，两党进行辩论，共产党员以蒋介石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国民党汪精卫政府与蒋介石合作反共，蒋介石勾结各系军阀对付共产党等事实，揭露了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夭折北伐革命的丑恶嘴脸，经过辩论，多数同学认识到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是反革命的，会后有些同学

主动找学校共产党组织提出加入组织。国民党的邪气被共产党的正气压下去了,直至一九二八年春,三师的国民党组织活动是消极的,是不受人欢迎的。是年底,三师五个年级,级级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成立了校内党团组织,分设若干党团小组,全校约有党团五十人左右(团员略多些)。

二、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政策,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领土的罪行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妥协、卖国政策,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的消息,传到聊城地区各学校后,广大师生无比愤慨,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指责国民党政府卖国,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罪行。是年九月下旬一天上午,山东省第三师范大部分师生主动集合在操场,共产党员刘子蔚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指责国民党卖国政策,纵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的暴行。向校方提出去南京请愿的强烈要求,不答应不上课。会后,除继续派人和校方交涉去南京请愿外,学生们主动组织宣传队到城郊宣传抵制日货,组织抗日义勇军等革命行动。校长周拨夫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阻止,破坏学生去南京请愿,无济于事。最后搬动聊城驻军,强制学生复课。不久,采取提前放寒假,强迫学生立即离校,并通知学生家长“要监督学生,不能有越轨行为”等办法,破坏压制青年学生抗日爱国行动。山东省第十一中学和临清六县联立乡师的师生,组织讲演会撰写文章等形式揭露与声讨国民党政府卖国,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我国领土的罪行，临清六县联立师范进步学生赵健民在该校组织的讲演会上，发表演说，严厉批评国民党争权夺利，贪污腐败，对日本侵略者实行不抵抗政策，指出这个党应进行改造。是年冬，冠县一批进步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主张，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号召群众抵制日货，雪国耻。是年，聊城部分学生到东关商店查日货，禁止出售，以此行动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东北的罪行。

三、反会考，反侮辱，反贪污，要求政治、经济平等

会考是国民党教育当局，限制学生有针对性的选择学习，强制学生坐在教室听读圣贤书接受国民党法西斯教育的重要办法之一。一九三二年春，山东省第二中学数学教师安广居（阳谷县人），教授方法不得当，对学生人格不尊重，引起该校十二级（三个班）同学有月余不上数学课，期中考试时，学生提出不考数学，校方不同意，并宣布不参加考试的开除，引起全校学生公愤，停止上课，拒绝考试，还打了教务主任，公开向校长提出×××教务主任是不受欢迎的人，应立即出校。校长郭锡九软硬做工作无效，向省教育厅提出辞职未准。学潮延续两个月之久。最后，省教育厅委托聊城县长孙桐峰与学校商量处理。孙桐峰、郭锡九事先商妥，由孙桐峰带军警到校开会，宣布开除谢××，田××，周××等十八名同学学籍和提前放暑假的办法，压制破坏了这次学

潮。一九三三年七、八月间，山东省第十一中学在进步同学的组织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校方强制做校服，反对校长张乾一等人多收学费，贪污修缮新校舍经费的学生运动。运动开始前开会数次，做了详细研究，周密部署，认真组织，设立查账、纠察、财务等组。学潮一开始全体学生立即响应，停止上课。运动起来后即选派李子华（又名春荣、揖让）等十二名同学为代表和校方交涉。校长张乾一勾结国民党山东省鲁西北民团总指挥赵仁泉，开进学校一个连的军队对学生进行镇压，以共产党分子领导学潮为名，逮捕了李子华、刘墨卿等十二名同学，对部分同学实行隔离，封锁不准与外界接触。随后，采用提前放假和开除李子华、刘墨卿、王法武、郭少英、姜冠三等七十八名同学学籍。此次镇压，破坏了该校学潮。一九三三年前后，山东省第三师范语文教师佟××，在课堂上授课时侮辱共产党，由进步学生在夜晚把这个教师打昏，博得同学们同情。一九三四年四月，临清六县联立乡师二年级二班语文教员徐子明以作文窥探学生思想倾向和体罚学生，引起该校二年级二班和一年级一班同学反对，罢课三、四天。在同学们强烈要求下，校方不久辞退徐子明离校。一九三五年初和春末，聊城师范党组织负责人申云浦、王连级因开展党的工作活动，被校方先后以“勒令退学名义强迫离校。一九三五年五月，濮县教育局督学、国民党员皮德同，得知濮县第三完小（即古云集）学生成立抗日救国会，于第二天，跑进教室，向学生责备道：“你们不好生念书，在校胡闹，要知道，有没有你们这班学生，第三完小照样开学。”在学生王振声（现名王勇达）、徐鸿扬、王继周等带动下，

该校两个年级（共两个班）同学同时停课回家，罢课八天。后经当地名流、地主豪绅们说合召开“恳亲会”（即学生家长会）后，才复学上课。是年六、七月间，该完小党团组织发现此校元老教师、兼事务员、国民党分子周昆仙，在校内是个实权人物，对学生革命活动不满，对进步学生冷讽热刺，为了今后工作的开展，确定书写张贴周昆仙贪污学生伙食费，殴打学生和不爱国、不抗日救亡等标语。标语传单贴出后打了周昆仙的威风 and 反动气焰。从此以后周在各方面表现老实。一九三四年冬，冠县师范讲习所学生在“同学会”的组织领导下，进行反对该讲习所二班班主任、国民党员肖金善压迫学生罢课斗争。

考入乡师及联立师范的，多是本地、家庭较为贫寒的学生，以学校发放的助学金为学习期间的主要费用来源。而联办师范国民党各县的教育科长，出于阶级本性，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对贫苦学生持不同态度。一九三二年暑假，临清六县联立乡师主办县教育科长联席会议上决定：助学金的发放，按照“济富不济贫”的原则。引起多数同学停课反对，在该校党支部的支持下，选出学生代表到各县教育科长会议上进行说理。校方为了防止学潮继续下去，搬来了国民党临清县长徐子尚亲自出面调解，继而他们搬来国民党驻军一连长，用高压手段平息学生的罢课行动都无济于事。各县教科科长惟恐罢课风潮继续扩大，答应采纳同学的合理要求，改变原发放助学金意见，这些教育科长又确定提前放假，以此克扣学生们的助学金，致使这次学潮不了了之。同年，濮县教

育科确定停止发放在范县三县联立乡师范读书的二十多名学生助学金。由该校党支部领导支持下，濮县籍的同学去濮县教育科进行说理斗争，经过斗争最后濮县教育科照发了这部分同学的助学金。

四、组织读书会，传播知识，交流思想 物色对象，发展党团组织。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聊城地区有共产党组织，或有共产党工作的学校、机关，多是从组织读书会，交换革命读物，传播知识达到接近，然后交流思想，谈对时局看法，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山东省第三师范的共产党组织在二十年代后期遭到敌人破坏后，隐蔽下来，或者后考入的以及新发展的共产党员其活动阵地就在“读书会”。该校八年级二班学生、共产党员孙芳茜，在一九三一年前后，通过介绍谢鑫鹤（博平县人）等同学加入读书会，经过一番考查了解分别发展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一九三三年，中共东阿县姜楼完小支部成立后，为了宣传共产主义，宣传我党方针政策，号召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办起姜楼完小“读书合作社”和流动“大众图书馆”，苏树人任社长。资金来源由“社员”入股，股金五分至五元钱不等。图书包括从看图识字到马列主义著作。一九三三年，临清六县联立乡师“读书会”成立后，在党组织领导下除组织“读书会”会员学习进步书刊、马列主义理论，从外地邮购书刊外，还有计划地部署社员到街上贴反对国民党卖国，打倒国民党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标语口号。一九三五年二月，山东省第十一中

学学生王志浩（冠县人）在冠县由孙锡恩（现名孙洪）介绍加入共产党。王入党后与同学卡其昌在十一中组织建起“读书会”，参加“读书会”的有齐淑兰（现名齐涛，冠县城关人）、李振周等人。同年秋，冠县师范讲习所学生许梦侠由冯干才介绍入党后，当年冬季和该讲习所共产党员何金三（又名何元鑫、冠县人）、钱洪勋（现名钱泊生，冠县人）等一起办起冠县师范讲习所“读书会”，参加“读书会”的有丹立枢（现名丹彤）、沙春喜（现名洪林）等人，以冠县民教馆、师范讲习所为活动场所，学习鲁迅、瞿秋白、邹韬奋、蒋光慈等人著作，和阅读《中流》、《光明》、《新生》等进步刊物。一九三五年暑假前，山东省第八乡村师范党组织，以“同学会”名义，向山东省第十一中、山东省第四乡村师范（设在兖州）、堂邑武训中学等学校的同学发出邀请，利用暑假组织“旅外同学读书会”，以共同学习为名，团结进步学生从中培养、物色发展党员对象。一九三六年，地下党员杨陶天、焦善民，在馆陶县师范讲习所，县城完小组织“读书会”，开展抗日爱国救亡宣传活动。同年，杨陶天介绍满登法、郭冠英等加入共青团，建立团小组。是年十二月，满登法、郭冠英等转为共产党员。

五、为配合党的统一行动，有计划地开展活动

一九三三年夏，为配合中央苏区作战，扰乱敌人的后方，钳制各地敌人兵力，中共山东省委派省委交通员李振山

来聊城，与中共鲁西总支委员会研究如何开展活动。经研究确定开展张贴标语活动，以山东省第三师范党员为主，三人为一组，一人前边侦察，中间一人抹浆糊，最后一人贴标语。一夜之间把“拥护共产党！”“拥护苏维埃！”“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反对蒋介石投降主义！”“拥护苏联！”“中华苏埃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同胞们，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解放而奋斗！”“打倒卖国政府！”

“推翻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等标语口号，张贴在校内布告栏内、校门口、二中校门、城关大街重要路上，连国民党驻聊城的二二〇部队李益智旅部门前也张贴上标语。这一行动，在聊城一带引起很大震动，敌二二〇旅夜间派兵包围三师，增加巡逻、岗哨，检查行人。一九三三年秋范县三县联立师范，在党组织统一部署下，开展了宣传攻势。一夜之间，把县城大街小巷、机关、学校都贴上了标语和传单，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和军警驻地的门前都贴满了标语。在范县一带很快形成舆论中心，群众受到鼓舞，地主豪绅慌了心，震动了敌人。从此，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注意了共产党的活动，夜间实行军警戒严，加强过往人的检查，开始侦察我地下党的组织活动。

六、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在农村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从聊城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及其发展过程看，可以得出这样概念：党的产生与发展是在城镇从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中开始的，然后逐步转向农村。一九三二年春，临清六县联

立师范党组织负责人李恩荣因领导学潮被校方“斥退”，回到清平县李圈家乡，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先后在李圈、王度村、丁马庄、王五营等村发展农民党员三、四十人，建立李圈村党支部，下设三个党小组，组织领导这一带农民抗粮抢秋等革命活动。一九三四年，东阿县姜楼完小应届毕业生、共产党员苏广才（现名苏民，东阿县西程铺人）、刘万明毕业后未升学，回到自己家乡，从事党的组织发展建设工作，当年在西程铺、官庄、柳林屯、归德铺、广粮门等农村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党支部。一九三五年暑假，济南华北中学毕业生、共产党员谭炳岱（现名新斧，东阿县谭庄人）回到东阿家乡，先后在谭庄、韩堂、贾山等农村发展一批党员，建起各村党支部。同时，从外地读书返回东阿县农村的共产党员魏子方、王西成、李明山、姜湘南、包云、颜华、张盛斋等，都在自己村内或附近村中发展了一部分党员，成立党支部。一九三六年二月，成立中共东阿县委时，全县有党支部二十多个，党员一百三十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支部是农村支部，党员多是从农民中发展的。徐洪来（现名徐宾，原濮县徐庄村人，现属莘县古云集公社）在一九三四年七、八月范县三县联立师范毕业时加入共产党，是年冬介绍本村农民徐光简、徐玉峰等七、八人加入共产党，并建起徐庄党支部。一九三六年，鲍廷干（原堂邑县人）在堂邑鲍家海村发展了一批农民党员，后建起党支部。一九三六年夏，山东省第八乡师党组织确定冯子华（莘县人）、路绍禹（现名戈力、东阿县人）去东阿县农村发展党的组织，在雇、佃、贫农中发现培养了一批党员对象。一

一九三三年夏秋，山东省第三师范以党团员为主，吸收部分进步学生，利用星期天和下午课后时间，到西关水井上帮水车工人工作，动员他们组织起来，为增加水费，进行罢工。因水工人来自城市单干贫民，不易组织，加上用水户涉及各阶层，提高水费势必影响全县城人民。经做月余的组织发动工作未成。但党的影响在这部分群众中扩大了，阶级觉悟有一定提高。

七、驱逐国民党CC分子对学校的统治， 继续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卖国政策

一九三三年春，冠县一高学生反对新任校长、国民党员李子西进行反动宣传，压制学生阅读进步书刊运动，学生停课两月之久，后由国民党县政府出面干涉，撤换了李子西的校长。同时，开除了进步学生王志洁、孙锡恩、于树申、郭思方等十七名学生学籍。从一九三三年春至一九三七年初，聊城师范（山东省第三师范于一九三三年暑假开学后改为聊城师范）校长为孙芳时（聊城县人），系无党派，教育事业心较强，对国共两党之事不大过问。一九三七年一月国民党CC派、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为了扩大国民党CC派的势力，控制聊城师范这块阵地，撤销了孙芳时校长职务，换上国民党CC派骨干分子、何思源的嫡系冯光荣担任聊城师范校长。是年二月，冯光荣来聊城先住在东门里旅馆，师范党组织在冯光荣来校任职的那一天，组织进步师生集合在校门，待冯到校门时，校门已关闭，不准冯进入校内。冯在门外呼喊到：“我是奉省政府命令来任校长的”师生代表

汪伯岩（历史教师）在校内高声答：“我们不欢迎你，滚滚蛋！”冯碰了壁，溜回旅馆。驱冯斗争相持数月，直至彭雪枫同志来聊城时，为了团结一切进步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反冯斗争才缓解下来。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反共、卖国，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以后，加强向华北扩张，企图进一步控制河北、察哈尔。继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指示汉奸武宣亭等在香河叛变，殷汝耕组织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后，聊城地区凡有党组织的中等学校，每逢“九·一八”周年，国民党政府出卖国土时，都有反对活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日本帝国主义为适应其“华北政权特殊化”的需要，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大、中学学生，为了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反对华北自治，在伪“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时，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宋哲元军队的血腥镇压。北平大中学生“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消息传到聊城，聊城师范党组织发动进步师生，有计划地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宣传队到街头，深入城郊，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揭露国民党政府卖国罪行和汉奸走狗们为日本帝国主义出力效劳的丑恶行径。学校当局采用“勒令”退学的手段破坏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也无济于事。学潮时高时低，持续到该年寒假。聊城师范继北平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之后，于一九三六年秋冬，在党支部领导下由共产党员耿炜和进步学生盖作军、邵玉琢（现名邵汝群）负责发动，

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聊城师范队部”。“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聊城地区其他中等学校后，都有积极地响应，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临清六县联立乡师，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在学校党组织和进步学生组织领导下，先后对思想反动，压制学生进步活动的国民党员、训育主任玄大庸、赵干堂、王少逸，有计划的进行反对，画漫画讽刺，贴传单谩骂和面对面的斗争。致使这些反动家伙，有的屈服了学生，表现老实，有的灰溜溜地离校了。

一九八四年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①《聊城地区党史资料》第一、三期和本期有关文章、资料；

②《光岳春秋》（一九八一年九月，山东人民出版社）；

③一九八二年九月，《山东党史资料》（增刊）；

④《临清党史资料》第六期；

⑤《阳谷党史资料》第二期；

⑥《冠县党史资料》第八期；

⑦《东阿党史大事记》（初稿，一九八四年九月）；

⑧《访郭锡九笔录》（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⑨《访孙荫棠笔录》（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⑩《学点民国史》（人民日报出版，一九八四年一月

⑪王勇达：《一九三五年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原山东省濮县古云集第三完全小学初期进行革命活动的回忆》（一九八三六年年月）。

阿东地方党组织情况

概述（草稿）

东阿县委党史办公室

前言

“阿东”即东阿县的东北部边沿区。抗战前，这里不仅是肥城（今大李一带）、平阴（今牛角店、旦镇一带）、东阿（今杨柳、高集一带）三县的边沿区（以下简称“肥阴阿边区”），而且和茌平、长清两县的边沿相连接，是几个县广阔的边沿地带。黄河由此蜿蜒而过。河曲地带有关口、湖溪渡、望口山等渡口，联系着黄河两岸的交通，在历史上人民交往、经济生活联系就十分密切。抗战时期，这里曾经是地委、专署、军分区所在地的抗日中心地。阿东人民勤劳善良、勇敢善战。无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保持着优良的传统。

阿东地方党始建于抗战初期的肥阴阿边区，她就象一颗革命的火种，在肥阴阿边区燃起了革命烈火；随着边界区域的调整，于一九四〇年夏天建起了统一的领导机关——中共阿东工作委员会。在工委领导下，阿东地方党组织不断发展，日趋壮大，同时在抗战极为艰苦的时期，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使之更加纯洁和坚强。她领导阿东军民浴血奋战，打垮了日寇的进攻，打败了蒋介石匪帮，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

第一、肥阴阿边区党组织的建立与抗日 根据地的创建

(1 9 3 7 . 7 —— 1 9 4 0 .)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大肆进攻中国，南京政府消极抵抗，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不久，日寇吞进到了鲁西地区，一九三八年农历六月便侵占了平阴县城，大土匪刘绪安投靠日本，带领其自卫团占领了南夏沟（现属平阴）。此间，地处黄河北岸的肥阴阿边区盗匪四起，民不聊生。国民党杂牌军冯二皮、肖建久，地主武装孙兴邦、王玉功、葛敬儒，土匪钱哲臣、王子凡等各霸一方，实行武装割据。他们打着“抗日救国”之旗号，与日本人暗中勾结，助桀为虐、横征暴敛、搜刮民财。每到一处就骚扰百姓、烧杀抢掠、奸污妇女，无恶不作。整个肥阴阿边区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广大边区人民生灵涂炭，人人自危，终年过着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悲惨生活，他们为生计所迫纷纷起来反抗，反侵略，求生存，为民族的解放和自身的生存而斗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肥城、平阴和长清等县的党组织发展到了边区，并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始了边区的建党建政建立地方武装的活动，点燃了抗日的烽火。

一九三九年秋，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盟友队进驻肥阴阿边区创建抗日根据地，把原属肥城、平阴和东阿三县交界处的黄河以北的地区连成一片，组建了“肥阴阿办事处”，但未建立起统一的领导机构。随着边界区域的调整和运东党政

军领导机关的建立，肥阴阿办事处于一九四〇年四月宣布撤销，根据形势需要又建立了阿东办事处，并建立了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共阿东工作委员会。群众自发性的抗日斗争开始转变为在党领导下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

一、肥阴阿边区党组织的建立

一九三八年春末夏初，肥城党组织首先发展到了边区的平阴五区——旦镇区。

年初，曾先后在泰安三中，济南正谊中学读书的石仲美，因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学生活动，被学校当局开除回到了故乡——旦镇区封官屯村。石仲美回家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寻找党的组织。不久，经肥城邱祥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石仲美投入到党的怀抱后，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心，他日夜奔波于旦镇以东的乡村之中，通过亲朋好友等各种关系宣传抗日救国之道理，动员群众起来抗日，并致力于党的发展工作。边区人民在黑暗的统治下，终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对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极为不满。他们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联合一切爱国力量，一致抗日之主张，积极参加党组织。很快就发展了赵克东、刘贤、刘立孔、王欣东等等十儿人。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在封官屯建立了肥阴阿边区第一个共产党的支部。封官屯党支部建立后，直接受肥城县委领导，石仲美任支部书记，主要活动在旦镇以东乡村之中，继续发展党组织；赵克东作农会工作；王欣东作青年工作。并成立了乡公所，以发展农会的名义秘密发展党组织。从此，边区开始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

一九三八年底，平阴县委书记熊善荣到平阴四区——牛

角店区后开展农村工作，在毕庄（今属东阿）发展了张常试（曾化名坦克，后改名为张前名）。次年三月，张常试又在沿黄一带发展了张月皮、赵玉庆、孙泽生等，并建立了毕庄党支部。毕庄党支部的建立象撒在草原上的火种，很快遍布了沿黄一带，大义屯、井绳赵、曹寺张、周家门前、八里王等村党支部（或党小组）相继建立。这些党组织建立后均属平阴县领导，张常试任毕庄党支部书记，并负责上述各支部的联络工作。

一九三九年六、七月份，长清县党组织也发展到了平阴五区田楼一带。胡晓农介绍胡晓民（胡成，又名胡广岭）加入了党组织，接着胡晓民又发展了田绍振、田德室、张剑达、田德山等人，建立了田楼党支部、直属长清县委领导。

肥阴阿边区的旦镇、牛角店两区在封官屯、毕庄和田楼三个党支部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快发展。是年秋，旦镇区已建立起封官屯、田楼、刘干士、潘庄、朱海子、小街子、范庄等十几个党支部。在封官屯、田楼党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旦镇区委，石仲美任区委书记。不久，平阴县委付书记王玉珍到牛角店区检查工作，在赵庄建立了中共牛角店区委。张常试任区委书记、孙泽生任组织委员，赵玉庆任宣传委员，青年干事孟峰（后改名孟月山）。

一九四〇年三月，平阴县委在八里王孟峰家开会，会上决定派孟峰到旦镇区委任付书记兼组织委员。

时隔不久，平阴县委决定：由于受敌人封锁和黄河横断，对地处黄河北岸的旦镇、牛角店两区领导不便，因而将两区党的关系移交东阿县委领导。平阴县委派宣传部长张传文

和五区区委付书记孟峰两人到东阿四区八里堂子与东阿县委书记秦延彬、县长苏民联系，办理了移交手续。但由于 旦镇、牛角店两区远离东阿县委领导亦为不便，东阿县委临时决定，先由这两区委独立活动，县委定期去检查工作。

四月初，东阿县委委派四区动委会主任刘健去旦镇、牛角店两区检查工作。这时，两区党员已发展到二百多人，党组织日益发展壮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即将蓬勃兴起。

至此，肥阴阿边区党组织基本上形成了统一的领导，但尚未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

二、肥阴阿边区各级政权的建立

一九三九年九月四日，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向一一五师发出《指示》指出：肥城山区甚小，我一一五师主力应转移到泗水、费县等地区。肖华所部驻区粮食困难，敌人封锁严密，应转入鲁西。接着，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司令员肖华）第五支队支队长曾国华，当地人民惯称“肖华支队”奉命从冀鲁边区开到了肥阴阿边区，开创抗日根据地。

九月中旬（农历八月十五前后），五支队到达肥阴阿边区。五支队根据党中央建立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首先派出代表与国民党杂牌军肖建久部谈判（肖系国民党专员，杂牌军师长冯二皮的付旅长，驻大吴庄一带）。五支队代表提出实行合作，共同抗日，驱逐敌寇，同保中华。肖建久顽固自守，拒不与我合作，并有意与我五支队为敌，因而谈判未能达成协议。

此间，国民党杂牌军肖建久、刘德超、朱冠年，地主武装葛敬儒、孙兴邦、安镜如等实行武装割据，各霸一方，并不时与五支队闹磨擦，破坏五支队的抗日活动。肖建久等人狂妄地宣称：不出一月，便把八路军赶跑。他们相互串通，企图把五支队从肥阴阿边区挤走。当时的局势是，若不反击这些反动武装，五支队将无立足之地，根据地就无法开辟。

十数日后，五支队在地下党组织的积极配合下，掌握了敌人内部的情况，熟悉了有关地形，便决定先打与我闹磨擦积极的肖建久部。上午五支队派出两名侦察员去大吴庄向肖“辞别”，意思是：我们奉命转移，咱们后会有期。借机侦察了肖部的部署情况。

当天下午三、四点钟，五支队向东北齐河方向开拔，肖派人探我虚实。肖探跟踪几十里路，确见五支队转移了，立即回来向肖建久汇报。肖建久得到汇报，五支队真的走了，洋洋得意地说：“八路终于被我赶跑了！传我命令，今摆盛宴祝贺，……”。晚上，肖建久召集部下官员大摆宴席，猜拳行令直到深夜。

再说五支队行军六十余里，甩掉了密探，行止前进稍作休息，星夜赶回。拂晓时将大吴庄团团包围，四挺机枪堵住了肖建久旅部大门。敌人在睡梦中听到枪响，从里面冲了出来，死伤大半，有的酒兴未消便见了阎王。肖建久知道自己已身陷重围，由两个警卫架着从后面的角门里狼狈逃窜了。敌人失去了指挥，象没有头的苍蝇，被打的四处逃窜。吃顿饭时的功夫就结束了这场战斗。肖建久部的有生力量已被歼灭，致使他不敢再与五支队公开对敌。

肖部被打垮后，在地方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支援和配合下，五支队连续作战，又打跑了刘德超、朱冠年部；解决了孙兴邦、葛敬儒等地主武装；镇压了土匪钱智臣、王子凡等，为边区人民除了几大害，边区人民士气大振，抗日情绪更加高涨，抗日力量日益壮大。致使哪些顽固之敌不敢与我公开对抗，一些中间势力向我靠拢。五支队在肥阴阿边区立地生根，打开了抗日斗争的局面，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肥阴阿边区党组织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支前活动，在各村党员的带领下，为部队杀猪宰羊送粮食，许多村的妇女为部队赶做军鞋、慰问袋，军民关系甚为密切。

五支队击溃了反动武装，扭转了斗争局势，接着就是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地方武装，成立各级人民政权。

九月底，肥阴阿边区成立了“抗日武装工作团”（以下简称工作团）。团长雷茂兴，付团长石坚。工作团成立后，立即在旦镇区雷庄开设了训练班，其任务是，培养干部，训练教员，为部队和地方输送骨干力量。人员主要来源于肥城九区（今东阿大李一带），平阴四、五两区及东阿四区北部边沿地带的党员或积极分子。每期训练一百人。

十月初，五支队进驻旦镇，与石仲美、朱名颐、姜秀令、司志达等有关人士协商成立区政府。两天后，在旦镇西北角的大场上召开了“旦镇区抗日政府成立大会”。动委会主任石大观（即石仲美）、区长朱潇湘（即朱名颐）、区队长姜梦九（即姜秀令）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接着，工作团在牛角店区王楼召集党员张常诚、丛养林、

孟月山以及刘振生、宫介凡等人参加会议。会上协商成立了牛角店抗日政府动委会，主任李健，区长丛养林。随着两个区政府的成立，各乡村政权也相继成立。同时，农会、自卫队、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也随之建立。

年底，五支队由旦镇转移到小街子，协助地方党组织成立了肥阴阿办事处，主任朱潇湘，付主任赵达。下辖肥城九区、平阴四、五两区和东阿四区北部边沿地区。同时，旦镇区区长由田文（即娄梦九）兼主任。

一九四〇年三月泰西地委“肃托”，尹鹏武案件涉及到朱潇湘。泰西地委逮捕了朱潇湘，肥阴阿办事处主任由赵达接任。肥阴阿办事处的成立，统一了边区政权，基本上形成了一块较完整的肥阴阿边区抗日根据地。

三、肥阴阿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形成

从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到一九四〇年春季肥阴阿边区尚无敌人据点，虽有土顽军作乱，但我党仍有发展的余地。从封官屯、毕庄和田楼等支部的建立到两区委的成立，形成了边区人民抗日救国的核心力量，使边区的抗日战争由群众自发性的斗争转变为在党领导下的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革命斗争，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五支队的挺进，打垮了国民党杂牌军肖建久部，赶跑了反动武装刘德超、朱冠年，镇压了葛敬儒等地主武装，打开了边区抗战的局面，为肥阴阿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地方党的领导下，在五支队的协助下，肥阴阿各级抗

日政权的建立，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可靠保证。

一九四〇年春天，在区动委会的领导下，各乡村以农会为核心的各界群众救亡组织已普遍建立。根据党中央抗战救国纲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实行减租减息，和累进税法的合理负担，并向豪门富户摊派救国款，使贫雇农广大基本群众得到切身利益，成为党在农村中可靠的力量。同时，号召各乡村改造乡村政权，成立自卫队，使乡村领导权掌握在党员或进步人士手中。挖掘抗日交通沟，改造地形，创造单元抗日根据地，儿童团手持大刀长矛配合自卫队站岗放哨，盘查来往行人，防止奸细活动；自卫队配合主力部队监视敌人动向，送情报；妇救会，组织妇女做军鞋、慰问袋。整个边区抗日斗争出现了空前高涨的局面，肥阴阿边区抗日根据地已初步形成，与荏南连成了一体，形成了运东抗日根据地。

第二、阿东地方党为坚持抗战而斗争

（一九四〇年四月——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一九四〇年四月五日，鲁西行署四专署（即运东专署）在东阿四区的观音堂（今属东阿）成立。十六日，鲁西军区第四军分区（即运东军分区）在东阿四区的小街子（今仍属东

阿)随之成立。这时以在阿交界为中心的运东抗日根据地已开始形成,肥阴阿办事处的管辖范围有了很大变化。原肥城九区于年初已回归肥城管辖,原来平阴县的四、五两区已将党的关系移交东阿县委。这样,肥阴阿办事处的“肥”和“阴”已不存在,因此,随着运东专署和军分区的成立,肥阴阿办事处宣布撤销,工作团的武装编入主力部队。

五月初,运东地委和专署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委派刘抗东去组建“阿东办事处”。随着阿东办事处的建立,原肥阴阿边区的地方党组织才真正建立起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共阿东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阿东工委)。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接连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对我各抗日根据地加紧围困和封锁,并不断加强对我抗日武装的磨擦活动。从一九四〇年起华北连续三年六旱,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对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妄图配合自然灾害来扼杀抗日力量。这两年是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由上升暂时变为下降。这时期阿东地区抗日斗争亦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阿东地方党组织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领导阿东军民对日、伪、顽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从而战胜了困难,渡过了难关,巩固了人民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

一、中共阿东工委的建立。

一九四〇年五月,运东地委、专署、军分区联合召开“红五月抗日动员大会”,会上有党、政、军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讲了话。这时期,运东地区各个乡村的农会、自卫队、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已普遍建立。自卫队、青抗先传送情

报搞宣传，保卫家乡；妇救会组织妇女做军鞋；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全民性的抗战已初具规模，以茌阿交界为中心的运东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旦镇、牛角店两区地处东阿县东北边沿地带，濒临黄河，是运东党、政、军领导机关活动的中心，系北部各县与地委来往的渠道，又是泰西、运东两地区联系的桥梁，还是华东与太行两大战略区的交通路线。因此，地委、专署加强对这一地区的领导，决定成立阿东办事处。

会后，运东专署夏振秋专员，民政科长王伟一同召见东阿县长苏民和刚从鲁西区党委党校学习分配来的刘抗东。宣布成立阿东办事处，主任由苏民兼任，付主任刘抗东。办事处下辖旦镇、牛角店两区，受运东专署和东阿县抗日政府双重领导。

当天，刘抗东只身一人到了牛角店区政府驻地——河洼，当时，肥阴阿办事处的地方武装有的升级到正规部队，有的拉到外地去活动。只有一架旧油印机，再无其他。几天过后，原办事处成员王仲光、黄冠儒、付秀峰等人闻讯赶来联系工作。阿东办事处先和牛角店区政府一起活动了一段，后又到旦镇的王楼一带活动并与旦镇区政府接上了关系。

五月下旬，运东地委组织部付部长李苏到阿东检查工作，巧逢平阴县委调孙泽生、孟月山等人去平阴县工作。阿东办事处刚刚成立，而阿东地区党的统一领导机构尚未建立。根据这一情况，李苏请示经鲁西区党委书记张霖之批准，将孙、孟等人留下，并建立了中共阿东工作委员会。工

委由五人组成，工委书记石大观、组织部长孙泽生、宣传部长孟月山、民运部长兼动委会主任李健、委员刘抗东。同时，办事处机关建立了武装通讯班，班长张海，主要负责办事处机关的警卫和通讯联络工作。石大观任工委书记后，旦镇区委书记由黄继荣接任。

阿东工委建立后，根据抗日救国纲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在阿东地区实行减租减息，征收田赋，累进税法的合理负担，并向富户摊派救国款，使贫雇农广大基本群众得到切身利益，成为党在农村中依靠的中坚力量。并对那些不积极抗战的乡村政权人员进行了调整和交换。如牛角店区更换了湖溪渡的卢玉贤，夏沟的夏敬德等；旦镇区刘千士村换上了李月修等，使乡村政权掌握在党员和进步人士手中。

五月十五日，宋任穷、程子华统一指挥的鲁西、冀南、冀鲁豫部队在鲁西及冀南地区举行了讨伐叛军石友三 的战役。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第五支队奉命到鲁西濮、范、观一带参加讨逆战役，地方武装也随之升级调走。日寇扫荡频繁，华北伪政权强化治安运动，求其以战养战之目的。六月初，盘据在黄河以南平阴、东阿境内的敌人乘机向阿东地区进犯。东阿城里（即东阿镇，现属平阴县）日伪军占领了陈集（铜城之东北六公里）并准备在此安设据点。当晚被我运河支队五团袭击，又转到了陈店子安上了据点。平阴县城的日伪军及刘绪安伪自卫团进至牛角店安了据点，并设有伪区公所、新民会、宪兵队、特务队，伪军一个大队。八月，敌人又在旦镇安上了据点。我党的活动开始转向隐蔽，

形势日趋恶化。这时，阿东地区的地主、劣绅及被更换的部分旧乡村政权人员，借日本人的势力拉起了红枪会与我对抗。五支队主力调走参加讨叛，但后方仍留在牛角店、旦镇两区。李济武庄的周茂刚发动红枪会暴动，将五支队休养在该村的伤员送往牛角店交给敌人。牛角店区的王楼、围子董红枪会也相继而起，围子董存放的五支队的枪支和大批军用物资亦被敌人抢去。这些反动红枪会，白天伙同敌人搜捕我抗日人员，晚上帮助敌人站岗放哨破坏抗日活动。形势急剧恶化，对我极为不利。军分区刘致远司令员主持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分析了局势，研究了应采取的策略。会议认为：若不及时扑灭红枪会这股反动势力，任其蔓延，势必对抗日工作造成很大威胁，甚而会使抗日根据地被敌人蚕食殆尽。会议决定：必须给红枪会以军事打击，同时袭击旦镇之敌。军分区主力打王楼红枪会，长清独立营（当时属运东军分区领导，营长王月亭）打旦镇据点。阿东工委积极配合作战，派出曹培山为攻打旦镇据点的向导，打王楼红枪会由工委宣传部长孟月山为向导，并带领通讯班担负警戒任务，以防牛角店之敌出援。战斗同时进行，很快就结束了战斗，红枪会被我一举打垮，旦镇据点虽未拔掉，但使其不敢轻易出动支援王楼红枪会。战斗结束后，将逮捕的红枪会头子经教育给予释放。

这次战斗使抗日军民士气大振，敌伪闻风丧胆。但旦镇区的红枪会头子程振洪顽固不化，又带领几个顽固分子投入旦镇伪区公所，经常随伪区队出来烧杀抢掠。旦镇区委与长清八区队联系，于夜间攻入敌人据点中将程振洪掏出，枪决于旦

镇村东头，对伪军震动很大。从此，顽固之敌不敢再轻举妄动，红枪会的活动烟消云散，稳住了阿东地区的局势。

对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蚕食扫荡，阿东工委、办事处根据地委和专署的指示，召开了敌占区乡村长及上层人物会议，宣布政策，对敌人征收粮款及伪政令采取应付者，不以汉奸论处。同时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在坚持“团结进步人士，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之敌”的原则的同时，采取“敌设一个据点，我安一钉子”的办法，派出我们的同志打入敌人据点，在敌人内部以交朋友拜把兄弟的方式进行活动，掌握敌人的动向，及时传送情报，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在此期间，派曹培山到汪平大胡庄三支队据点内当营长，派刘延汉打入牛角店伪区公所当了助理员，派司志达等人打入旦镇据点，同时对被家庭逼迫投敌的司志清（原为中共党员，旦镇镇长，形势恶化时被迫投敌，后为旦镇区伪付区长）进行教育争取工作，和他建立了联系。他们在敌人内部积极开展工作，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为抗日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二、中共阿东县委的建立

一九四〇年秋，阿东工委书记石大观调军分区武装部工作。秋末，运东地委派肖明（即段碱三）来东阿工作，同时宣布：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将阿东四区北部杨柳一带划归阿东领导，阿东办事处独立为直接受地专领导的县级政权。办事处主任刘抗东，付主任张武云，秘书田绍振。办事处机关也已健全，民政科长尹延序、财政科长黄冠儒、文教科长付秀峰、粮食科长朱玉成、公安局长赵忠民、武装科长

暂待任命。并调整了各区名称：一区（杨柳）区长雷明山；二区（牛角店）区长张峰；三区（旦镇）区长田文。同时，阿东工委改称阿东县委（对外仍沿用阿东县工委）。县委书记肖明，组织部长孟月山，付部长陈拍庭，宣传部长孙泽生。下设三个区委：一区区委书记靳云（即张剑达）、二区区委书记高家岭、三区区委书记黄继荣。

阿东县委成立后，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县委认为，主力部队调去讨叛，没有建立地方武装是处于退却被动的主要原因。在武装到牙齿的敌人面前，没有武装就没有一切，于是阿东县委号召全体党员积极开展搞枪参军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冬末，阿东警卫连在阿东三区区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连长田文，兼连指导员关超（即吕连琢，大侯庄战斗中被俘）。

此间，敌我双方的武装力量十分悬殊，抗日武装仅有三个区队和一个警卫连，总共不超过五六十人，而敌人仅阿东境内就有六百多人，况且武器装备也十分悬殊。因此，办事处和县委机关经常同军分区一起活动，常驻在旦镇、解白刘、代井或长清边界地区。

一九四一年年初，阿东办事处机关和警卫连同住在高集西的大侯庄，军分区文工团有时晚上演节目，附近群众争相观看，目标很大，遭到敌人袭击。战斗前夜，办事处机关人员和警卫连都去看节目，演完节目后，刘抗东问军分区参谋李参，军分区是否转移，李参说转到场侯。警卫连返回大侯庄，办事处主任刘抗东带领警卫员王禄山和朱明彦往住在张小庄的三大队去送子弹。刘抗东与大队领导谈了段话，已

至深夜，回大侯庄的路上，朱明彦说：“这里目标很大，咱们应当转移”。因为，盘踞在在平境内的伪三支队夜间不断东来牵牛架户，办事处已通知高集一带村长、自卫队长第二天在大侯庄开会，因此未有转移。返回大侯庄已是夜深人静，为不再打扰房东，刘抗东和两个警卫员便在房东的大门洞里休息。大侯庄村子较长，警卫连住在东头，办事处住在西头。刘抗东正看文件，忽听村东头阵阵枪响，断定是敌人包围了警卫连。刘抗东估计警卫连是新建武装，战斗力不强，为使其不受或少受损失，便决定带领办事处通讯班几支枪从胡同里北撤到赵牛河，侧击敌人，以策应警卫连突围。刚撤到胡同口，敌人已超过他们向西包抄过去，后面的敌人发现了他们，立即卧倒在路沟内向村南射击，北撤的道路已被封锁，刘抗东主任率众折回驻地一个空院里，用木棍顶住门，准备坚决抵抗。通讯员王连生手持“三八”式大枪，登上房顶观察动静，发现敌人很多并有日寇。刘主任从日寇亲自出动这一点分析，判定已不是一般的遭迂战，敌人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对着警卫连来的。固守不成，决心突围，刘主任当机立断，改变主意向南突围，以吸引敌人火力，减轻对警卫连的压力。刘抗东主任带着王禄山、朱明彦冲在最前面，其他成员跟在后面。当冲到大侯庄南路沟时，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于是，办事处机关人员顺路沟边撤边打，撤退中民政科长尹延序发现路沟南有片松树林，准备去树林隐蔽。正赶上从西面包抄过来的敌人，因而被捕。这时，敌人的子弹雨点般地打过来，敌人的兵力被吸引过来了，办事处机关迅速突围，终于冲出敌人的包围圈。但不幸的是

警卫员王禄山在战斗中牺牲了，孙新三等人被捕（后牺牲于平阴）。

当时，警卫连闻枪声后，立即出来迎敌，见村东、村南全是敌人，知道力不胜敌。连长田文带领全连冲向村北，刚出村口正逢旦镇之敌从东北包围过来，警卫连当即转向村西突围而出。

这次战斗，敌人动用了平阴、牛角店、旦镇等据点的日伪军五六百人，妄图将我警卫连全部消灭。但由于办事处机关的策应，警卫连奋勇杀敌，突破重围，除指导员关超离队被捕外，没受其他损失。

“大侯庄战斗”不久，为了整顿队伍，田文率领警卫连驻防蒋庄，不慎走漏了消息。次日拂晓，旦镇伪军纠合牛角店日伪军共四百多人包围了警卫连驻地——蒋庄。警卫连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化整为零，随老百姓一起四散突围，同时由靳××带领一个班向东北方向突围，由连长田文亲自率一个班向西北方向突围，以吸引敌人掩护大部队随众分散突围。敌人骑着洋马，自行车横冲直撞，牵制敌人的警卫连两个班很快被敌人冲散。田文带部分战士突围后撤到董楼张，敌人追到了董楼张，搜捕两个多小时，有没搜捕到警卫连一个士兵。这次战斗，警卫连除丢失了十余支大枪外，基本没受其他损失。但战后战士们情绪低落，有的人退伍逃往东北。

这是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我抗日力量遇到较大的两次战斗，它锻炼了我抗日队伍，纯洁了组织。

三月，县委为了有力地打击敌人，反奸除霸，成立了武工队，队长张杰（即吕连阶）。武工队成立后，配合主力部

队进行作战，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致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

下半年，按军分区统一编制，阿东在警卫连和各区队的基础上成立了阿东独立营（即第六独立营）。营长刘抗东、付营长张强。独立营建制两连：一连连长田文、二连连长张海。

这一年，县委还建立了敌工部，孟月山兼任敌工部长。敌工部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那些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正派人士，争取中间势力，最大限度地孤立了那些顽固之敌。

三、为坚持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而斗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战线的扩大，日本帝国主义深感其兵力不足，财力不济，自一九四二年起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中国变为它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达到“以战养战”之目的，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梦想迅速灭亡中国。它一方面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活动，另一方面更注重的对共产党为主的作战，它集中了日寇侵华兵力70%以上和伪军的全部疯狂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同时蒋介石怀着卑鄙的个人目的与日寇相呼应，加紧了投降反共活动。它一方面调动七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指使纵惠它留在敌后的部队大批投敌协同进攻根据地，一时出现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我阿东抗日根据地，在进入一九四二年以后，也处在了敌伪顽的夹击和天气干旱造成的自然灾害的双重困难的困苦境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加紧推行“以华治华”的方针。

一九四二年初，驻在杨柳、牛角店据点的日军撤走，换上了旧式装备的治安军。不久，敌人在洼里、教场铺、张汉吴、井绳赵、严庄、黄圈、湖溪渡、烧瓜赵、董庄、大辛庄等十几个村上安上了据点。据点与据点之间挖了纵横交错的封锁沟。敌人在阿东一区境内分别在陈店、杨柳以及杨柳北部边沿地带挖了三条五米宽、五米深的封锁沟；在二区挖了从湖溪渡分别到井绳赵和牛角店的两条封锁沟；在三区挖了东起齐河的洪堂，西到旦镇的一条封锁沟。整个阿东地区炮楼林立，封锁沟纵横交织为网，把我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碎块，妄图配合疯狂的扫荡、残酷的清剿和残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消灭我抗日力量。与此同时，阿东地区的国民党土匪势力也加紧了投降日寇的步伐，积极配合日寇向我进攻。早在一九四一年盘踞在茌平境内的顽军齐子修的三支队就向东进犯，与阿东的伪军勾结，对阿东抗日力量实行夹击。这时，三支队的冯太衡在茌阿交界的刘王山、齐子修在小胡庄、小周庄等村安设了据点，对阿东抗日根据地实行蚕食封锁，形成了我与日、伪、顽对立的复杂艰苦的斗争局面，阿东抗日斗争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

一九四二年春，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霖之来运东检查工作，在大白村前树下召开有地专、军分区及附近几个县的负责人参加的民主座谈会。会上与会人员畅所欲言，提出运东领导对基层组织建设（如建立抗联和民兵联防）重视不够。会后，各县对基层组织，尤其对民兵联防的组织建设十分重视，克服了孤立作战的局面。

为了加强阿东地区的对敌斗争，巩固阿东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二年三月，运东专署派齐禹（后改名为齐林山）到阿东一区任区长，受专署和阿东双重领导。齐禹到阿东一区后，很快打开了阿东一区的抗战局面，对巩固阿东抗日根据地起了很大作用。阿东抗日军民在运东地委和阿东县委的领导下，加强军政、军民鱼水般的团结，发扬了不怕流血牺牲、英勇作战的精神，同日、伪、顽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九四二年春节前夕，郝集的敌人到高集抢枪，驻扎在冯海的阿东独立营闻讯向敌人发动突然进攻，击毙日寇一人，缴马一匹，鼓舞了阿东军民的斗志，被动局面开始有所扭转。阿东县委在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还不断加强敌工工作，派党员陈家修打入牛角店伪区部当文教助理员，以策应刘延汉活动；通过安华林派李怀智（又名李敬民）打入刘王山冯太衡部与李怀燕取得联系；让生业礼当牛角店的区长，进行策应和搜集情报工作，派张方恒、郭文可分别到烧瓜赵、毕庄据点当伪军队长。在陈店子、杨柳等据点，经过齐禹区长也派进了人员或争取了伪人员。对决心附敌与我作对的顽固分子进行了坚决的镇庄，也取得了显著成绩。还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瓦解进行各个击破。当时驻扎在旦镇据点的刘绪安伪军中最反动的是丁传兴中队，阿东五大队（即原第六独立营，改为五大队后，王月亭任大队长）就专门袭击它。而对刘传印中队则采取争取工作。一九四二年，五大队在曹庄伏击战中缴获刘传印中队部分枪支弹药，为了争取刘传印中队，阿东办事处主任刘抗东率数人带着缴获的战利品到了旦镇，在司承珏家将枪支弹药当面如数送还给他，并晓以大义，陈述利害，并讲了我党政策，刘传印感激不已，表

示决不与八路军为敌。同时，对最反动的姜传尚则给予坚决的镇压。姜系旦镇伪区公所维持班班长，是伪区长司允刚的爪牙。姜传尚经常下乡催粮逼款，不断敲榨勒索四方百姓，每到一村不是牵牛抢猪，就是抓鸡逮鸭，整个旦镇区的群众无不恨之入骨。一九四二年秋，阿东办事处通讯员王连生面对艰苦的斗争，思想发生动摇，被敌人收买了去。王投降后，敌人如获至宝，封他为特务班班长，妄图借机把阿东抗日领导机关摧垮。可是敌人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不久，王连生失去了敌人的信任，害怕抗日政府不放过他。于是，王连生又托人捎信，想再回到抗日队伍。阿东县委组织部长孟月山指示：回来可以，但要立功赎罪，有贡献才行。王连生得到允许后，借特务班长身份将伪区长司允刚的手枪、大枪、自行车各一件带了回来。司允刚丢了武器十分恼火，暗中收买邵××寻机报复。农历八月十一日，孟月山、高家岭二人到办事处机关去，路过刘千士村时天已大亮，就住在李同修家。将近中午，邵××、尹大成、王连生一块到刘千士村找孟、高二人接关系（实际上，邵××已和姜传尚暗中约好）。孟月山只身一人到乡公所与王连生谈了不足十分钟，姜传尚便带领其维持班十二人全付武装赶到乡公所。孟、王二人均未带武器，束手被捕，邵××被敌人假捆起来，尹大成系两面人物没有被捆。刘千士村党组织的几个同志闻讯赶到，带领群众跟着姜死保孟月山，姜传尚并不了解孟的身份，敲了一千元竹杠将孟放了。王连生当众被枪决，孟月山算是陪了个榜。

第二天，旦镇党支部得到情报，八月十四日姜带维持班

向平阴城送交旦镇区的银子款。阿东敌工部立即派人将姜敲榨的一千元送去，同时说明了孟月山的身份，要他于八月十四日出来向孟赔礼道歉，否则后果自负。姜传尚当即回话，十四日有急事不去。这样就证实了情报的准确性。十四日，王月亭大队长率一个连，在玉米地里埋伏下一个排，先头部队埋伏在桥下，又设了几个便衣侦察流动哨。不大一会，姜传尚便带领他的维持班进入了埋伏圈。尽管他的车子队（每人骑一辆自行车）拉得很长，也没有避开我火力网。不费吹灰之力捕获了姜的车子队，当场击毙了伪县政府的派出人员（主管税务）王玉英和大生庄的生业信。姜传尚被押到某庄油房，指名要找孟月山和李同修见面，意思是当初放了孟月山，眼下也应该放了他，一千元情愿不要，只要活命。姜传尚民愤极大，加之他刚刚枪决了王连生，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于是，召开群众大会，当场枪决了姜传尚。

同时，以张杰为队长的武工队活动于炮楼之间，出没在敌人“心脏”里，使敌人惊恐不安，闻风丧胆。同年秋雨连绵的一天上午，张杰带领两个武工队员在牛角店和湖溪渡之间的公路上，截获日寇汽车一辆，击毙日寇两个，朝鲜人司机一个。是年底，为了开展牛角店据点的敌伪工作，张杰带领武工队员深入虎穴——牛角店据点，打死最顽固的伪军小队长胡玉峰。使伪军震动很大，伪军小队长殷子明主动找敌工部人员联系，经教育争取终于成了我们的内线关系。

在抗战十分艰苦的时期，阿东地方党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之

敌”的策略总方针，对敌采取打拉相结合的办法，分化瓦解敌人取得显著成绩。同时还利用各种形式，通过各种关系在敌军内部散发鲁西军区印制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传单，对表现较好能与我配合的伪军发放《抗日同情证》。经过错综复杂的敌伪工作，瓦解了敌伪阵营，缓和了敌我斗争的尖锐局势，扭转了抗日的被动局面，为全面反攻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年中，阿东地方党还根据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实行了精兵简政，减少非战斗人员，缩小机构，杀掉马匹，丢掉包袱，机动灵活地与敌人周旋。同时，将部队化整为零，化成小部队到敌后活动，打击敌人向我抗日根据地的蚕食进攻。秋末冬初，原专署秘书主任邢凯丰到阿东办事处任主任，刘抗东任副主任。这时，由于一区区域较广，其间又有官路沟所隔断，在领导上不太方便。另外，在平境内已组成了民兵联防，为了与在平的民兵联防连接起来，把联防战线延长，保卫运东中心区。故将阿东一区官路沟以西二十五个村庄划出，新增设为阿东四区，谢鑫鹤专员亲自物色为人正直的原当地大乡长刘继虞任区长。

是年冬，新斧（原名谭炳岱，又名谭波）从东阿调来阿东任五大队付政委。此间，我阿东五大队已从开始的通讯班、警卫排、警卫连逐渐发展成为四个连建制，具有相当战斗力的武装。各区除新设的四区只有民兵组织外，各区都有区队。还有县公安局的武工队，已经形成以县大队为骨干的战斗集体。

为了有力地开展抗日战争，阿东地方党还注重了统战工作的开展。团结在社会上有影响的进步人士如黄晋三、刘香

亭、王兰亭等。尤其黄晋三先生从抗战最艰苦阶段到抗战胜利，一直与我党忠诚合作。他曾作为阿东地区的民主人士代表于一九四一年参加了鲁西行署与冀鲁豫行署的合并大会，同时还团结利用了两面派人物，如高集孙文宗是三番子，开饭铺为业，社会关系复杂，但为人老实，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为抗日做了不少工作。一九四二年夏季，敌人对濮、范、观鲁西中心区进行铁壁合围，区党委把鲁西妇救会主任郭军和万丹如转移到运东，军分区刘致远司令员将郭、万和运东妇救会主任宗伟和王金要、刘抗东在阿东隐蔽安置，要保证绝对安全。孙文宗很好的完成了这一任务。正是在我党的领导下，团结各界人士一致抗战，才使抗日力量逐渐发展壮大，使抗日战争逐渐由防御变成进攻。

第三、阿东地方党为夺取抗战

最后胜利而斗争

(1943.1——1945.9)

一九四三年抗战局势已有明显好转，敌人越战越弱，我军愈战愈强。苏联战场捷报频传，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已逐渐形成。党中央根据国内外战争形势的发展，提出“一年以内打败德国，两年以内打败日本”的口号，极大地鼓舞了战争军民的斗争勇气和争取胜利的信心。阿东境内的敌人已成瓮中之鳖，人民抗日力量日趋壮大，战略反攻已将来临。

一、中共平阿县委的成立

根据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一九四二年十二

月初，一、（太西地委）、四、（运东地委）地委在阿东三区的王楼合并，为冀鲁豫一地委、专署，军分区。为进一步贯彻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加之平阴县委在一次战斗中被敌破坏，损失较为严重，地委决定将阿东县与平阴县委合并建立平阿县委。

一九四三年初，阿东县委与平阴县委在阿东一区解日刘合并，正式建立平阿县委。县委书记谷扩如（即朱明山）兼组织部长；县委付书记肖明兼宣传部长，敌工部长刘抗东，其余人员充实到基层。原阿东县委组织部长孟月山到二区（牛角店区）任区委书记，高家岭任副职；宣传部长孙泽生到三区（旦镇）任区委书记，黄继荣任副职。

是年夏天，阿东办事处与平阴县政府在阿东一区高集合并，建立平阿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邢凯丰，县大队长王月亭，政委新斧。平阿县共七个区，原阿东三个区名称未变：一区区长齐禹，二区区长刘成泗，三区区长田文；原平阴四个区：毛铺一带为四区，孔村孝哲一带为五区，原东阿城关区为六区，夏沟一带为七区。

二、拔除敌伪据点、解放阿东全境

阿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地方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浴血奋战，终于渡过了艰难困苦阶段。一九四三年，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此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抗日武装驰骋黄河南北，开始与敌人主动作战；敌军逐渐感到兵力不足，在我抗日力量的威压下，有的敌人开始投降起义，其顽固之敌自行撤出据点，集中兵力企图固守。县委及时作出决定，拔除敌伪据点，扩大解放区。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晚八点左右，除奸组奉命趁晚间摸入湖溪渡伪据点，将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丁世恭从窝内掏出，击毙在屋门外。丁世恭名义上是牛角店伪区公所助理员，实际上是以其为掩护专门破坏我党抗日活动的国民党平阴县党部书记，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国民党特务。在敌人严密设防的据点里除掉丁世恭，对敌伪震动很大。他们有的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易出来，有的则通过各种关系和我敌工人员联系，表示悔过自新，以求后路。

“一年打败德国，二年打败日本”的胜利曙光已经在望。阿东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备战，一九四三年一年内先后拔除了杨柳、陈店子、井绳赵、黄圈、大辛庄等十几个据点。这些据点有的是我军利用内线争取我外部政治攻势而自动投降起义的，当然也有强攻的。

一九四四年春，敌人已是瓮中之鳖末日将临，但还想作垂死挣扎。平阴县汉奸司令刘绪安下令，自动撤除旦镇伪据点，集中兵力于牛角店据点，企图固守牛角店、湖溪渡两孤立据点，伺机反扑。

五月底（或六月初），冀鲁豫一军分区决定：拔除牛角店、湖溪渡两孤立据点，解放黄河以北地区，扩大解放区。军分区司令部驻在范集，根据刘致远司令员的部署：分区一团开赴黄河南岸茌湾一带担负警戒打援，二团主攻牛角店据点，平阿县委敌工部配合作内线策应；平阿县大队攻打湖溪渡据点，两处战斗同时进行。

攻打牛角店据点准备于夜间十一点进行。首先由敌工部长刘抗东向生业礼（伪区长，当时受我掌握）布置内线工作。

生业礼接到内线联系，晚饭后便将伪军头目请到伪区部吸食鸦片烟。目的是配合外线作战，使敌失去指挥。但因我军推迟了进攻时间，伪军头目返回了各自岗位。

次日凌晨一点，军分区我团进入阵地，敌工部立即用信号与伪区部生业礼联系，此时敌人正在梦中。我军用一个排架着云梯开始登城，准备偷袭敌人。一个个勇士沿梯而上，当战士们将要上去还未上去时，由于负重过大加之云梯太不结实，云梯“喀喳”一声断为两截。敌人从梦中被惊醒，急忙应战，机枪、步枪一齐向据点下射来。偷袭不成，攻击部队立即转入强攻，与敌人展开激战。敌人凭借有利工事，居高临下，一捆捆手榴弹落在我军阵地上。我军队形密集在据点下，伤亡较大，强攻一时受阻。团政委王克寇亲临前沿阵地观察，这时敌人正以密集的火力向我扫射，王克寇团政委不幸中弹牺牲。

偷袭不成，强攻受阻，团指挥所适时改变作战计划，停止强攻，抢修工事，准备围困敌人。六、七月间的天气十分炎热，旦镇之敌聚集于牛角店据点，食宿十分紧张，况且敌人据点内的水缸在我军进攻时被炸毁，连水都喝不上。敌人又闷又热，渴得厉害，信号弹一个劲放，妄想等待湖溪渡和平阴之敌前来增援。此间湖溪渡据点已被我县大队拔除，平阴之敌唯恐被我打援部队消灭于途中，一直不敢出城。我围困部队在加紧围攻同时，展开政治攻势，要他们放下武器，出来投降，否则死路一条。下午三点钟前，牛角店之敌待援无望，在我军攻势的压力下开始动摇，从据点内喊话要找敌工部刘抗东谈话，表示愿意投降。我攻城部队

停止攻击，伪队长王××一行三人到我军分区司令部谈判。军分区司令员刘致远简短地说：“没有什么可谈判的路，有两条：愿打，我们奉陪到底；否则，放下武器。枪支弹药留下可以放你们走，私人的东西我们一概不要，你们可以带走”。

黄昏时分，牛角店之敌放下武器，规规矩矩地从南门出来向我投降。刘司令员向他们讲了国内外形势和我党的政策，伪军队长王××带领其残敌狼狈地逃回到平阴县城。平阴县汉奸司令刘绪安气急败坏，当众枪决了王××。

至此，平阿县河北境内——原阿东全境已全部解放。我抗日武装除去一部分留在河北维护治安，发动群众进行生产外，其余全部开赴河南向平阴、东阿之顽敌进军。

一九四四年夏，平阿县委派肖明、刘抗东、张成功、靳斧、孟月山等人去太行平原分局党校学习，目的是培训干部，迎接抗战胜利，通过学习提高认识。这时国民党抛出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仍然主张建立依附美帝国主义由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统治的中国，我党针锋相对地出版了《评中国之命运》主张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各民主党派联合民主新中国，并引向社会主义。也联系战争与和平问题，力争和平，准备战争，要作两手准备。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倾向，在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思想基础。

一九四五年八月，地委住东阿赵寺一带，在那里召开了各县党政军负责同志联席会议，准备传达日本投降后的方针任务。会议尚未开完，地委宣布日本已投降，要各县负责同

志星夜赶回本县准备接受县城，这时，平阿县抗日军民同全国人民一样，夺取了抗战的最后胜利。一九四六年初，为了适应形势之需要，区划又做调整，平阿县撤销，恢复平阴县，原阿东地区又划归东阿县。一九四七年秋，高集、牛角店、旦镇（即原阿东一、二、三区）地区划归河西县，直至一九四九年八月又将该地区划回东阿。

后 记

《阿东地方党组织情况概述》（草稿），是在一九八三年四月“阿东党史座谈会”的基础上，根据部分老同志座谈整理而成，十分粗浅，详略欠妥，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资料短缺，遗漏错处在所难免，热望了解该地党史的老同志给予批评指正。

一 九 八 四 年

中共阿东地区党组织和政权机构沿革一览表

组织名称	时间	地点	主要领导人	沿革情况
中共封官屯支部	一九三九年三月	封官屯	支部书记：石仲美	一九三八年春，石仲美经肥城县党员邱祥林发展入党。后石仲美又相继发展了赵可东等十几人，并成立了肥阴阿边区第一个党组织——封官屯党支部。
中共毕庄支部	一九三九年春	牛角店区毕庄	支部书记：张常试	一九三九年初，张常试由平阴县委书记熊善荣介绍入党，后张又发展了孙泽生等人，并建立了中共毕庄支部。
中共田楼支部	一九三九年秋	旦镇区田楼		一九三九年六、七月份，长清党组织胡晓农发展了胡晓民入党，后胡又发展了田绍振、赵剑达等人，并建起了田楼党支部。

组织名称	时间	地点	主要领导人	沿革情况
中共旦镇区委员会	一九三九年秋		书记：石大观 付书记：孟峰	一九三九年秋，在封官屯、田楼党支部基础上，建立了旦镇区委，书记石大观（即石仲美）。一九四〇年三月平阿县委派孟峰（即孟月山）任旦镇区委付书记兼组织委员。一九四〇年五月，阿东工委建立后，石大观任工委书记，区委书记由黄继荣担任。一九四三年初区委书记孙泽生。
中共牛角店区委员会	一九三九年秋	赵庄	书记：张常试 组织委员：孙泽生 宣传委员：赵玉庆	一九三九年秋末，平阴县委付书记王玉珍到牛角店区赵庄一带检查工作，建立了牛角店委员会。一九四〇年秋，区委书记高家岭，一九四三年初，区委书记孟月山。
肥区装阴抗日工作团	一九三九年冬		团长：雷茂兴 付团长：石坚	系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五支队帮助建立。

组织名称	时间	地点	主要领导人	沿革情况
旦镇抗日区政府	同上	旦镇	区长：朱明 动委主任：石大观 区队长：姜梦九	一九三九年底，肥阴阿办事处成立后，田文（即姜梦九）任区长。
牛角店抗日区政府	同上	王楼	区长：丛养林 动委主任：李健	一九四〇年秋，阿东办事处建立后，张峰任区长，一九四三年初区长刘承泗。
肥阴阿办事处	一九三九年 底	小街子	主任：朱澹湘 付主任：赵达	一九三九年底，五支队建立肥阴阿办事处，辖肥城九区平阴四、五区及东阿四区北部边沿地区。一九四〇年春，主任由赵达接任。

组织名称	时间	地点	主要领导人	沿革情况
阿东办事处	一九四〇年五月	河洼 王楼	主任：苏民（兼） 付主任：刘抗东	一九四〇年五月，运东专署决定成立阿东办事处，辖牛角店、旦镇两区受东阿县政府和运东专署双重领导。一九四〇年秋，阿东办事处独立为直接受运东专署领导的县级单位，受权范围扩大为三个区：一区是杨柳，二区牛角店，三区旦镇。主任刘抗东，付主任张武云。
中共阿东工作委员会	一九四〇年五月下旬		书记：石大观 组织部长：孙泽生 宣传部长：孟月山 民运部长：李健 委员：刘抗东	一九四〇年秋，石大观调军分区人武部工作，书记肖明；组织部长孟月山，付部长陈伯廷，宣传部长孙泽生。 一九四一年成立敌工部，部长孟月山（兼）。

组织名称	时间	地点	主要领导人	沿革情况
中共平阿县委员会	一九四三年初	解白 刘村	书记：谷扩如 付书记：肖明 组织部长：谷扩如 (兼) 宣传部长：肖明 (兼) 敌工部长：刘抗东	一九四三年初，根据党中央“精兵简政”之指示，阿东与平阴县合并，建立了平阿县委。 一九四六年初，平阿县撤销，恢复平阴县，阿东地区划入东阿县。

后 记

本辑比较集中地辑录了建国前我区文化教育战线上党的活动和学生运动的情况。同时，开设了鲁西北报刊专栏和专题资料专栏，今后将陆续刊载这方面的材料。目录编排以创办时间先后为序的。由于资料水平所限，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深盼原在这一地区工作的老同志和知情者提出补充修改意见。

此外，根据部分老同志的意见，为便于查阅，现将《聊城地区党史资料》期数编排号码，由原来的有总期数又有分年期数，改为只按总顺序号排列，同时，把“期”数改为“辑”数。一九八四年不再按一、二、三……期进行排列，本期列为第九辑，今后以此顺序排列。

一九八四年五月

